中亚简史（外一种）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俄] 维·维·巴尔托里德 [法] 伯希和 等著

耿世民 译

世界汉学论丛

SHIJIE HANXUE LUNCONG

责任编辑：孙文颖
责任美编：刘　丽

ISBN 7-101-03729-1

9 787101 037296 >

定价：18.00元

世界汉学论丛

中亚简史（外一种）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
[法]伯希和 等著

耿世民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亚简史(外一种)/(俄罗斯)巴尔托里德(Bartho ld,V.V.)等著;耿世民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世界汉学论丛)
ISBN 7-101-03729-1

Ⅰ.中… Ⅱ.①巴…②耿… Ⅲ.中亚-历史
Ⅳ.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8529 号

书　　名　中亚简史(外一种)
丛 书 名　世界汉学论丛
著　　者　〔俄〕维·维·巴尔扎托里德　〔法〕伯希和等
译　　者　耿世民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⅝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729-1/K·2132
定　　价　18.00 元

中 亚 简 史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 著
耿世民 译

译者的话

《中亚简史》的作者巴尔托里德(V. V. Barthold,1869—1930年)为俄国沙皇时代和十月革命后苏联著名的中亚史和伊斯兰文化史专家。1896年起在圣彼得堡大学任教,1912年起为俄国科学院院士,生前曾多次到中亚各地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巴尔托里德著作很多(总数超过四百种)。关于中亚历史的主要著作有《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突厥斯坦文化生活史》、《突厥斯坦简史》、《七河史》、《中亚景教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以及关于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等民族的简史多种;关于伊斯兰教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地区的著作有《伊斯兰世界》、《伊朗简史》、《伊朗历史地理》等。作者的许多主要著作曾先后被译成英、德、法和土耳其等文字。

本书原名《突厥斯坦简史》,为作者20世纪20年代初在前塔什干中亚大学的讲义,1922年在塔什干出版。书中简述了中亚各族人民从古代到19世纪的历史,高度概括和总结了作者多年来对中亚历史各个时期的研究。对我们了解中亚各族人民悠久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书中论述的主要是统治阶级和征服者的政治历史,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少提到。书中在一些地方还反映出在资产阶级历史学界曾广泛流行的关于东方"永恒的封建主义"的观点。此外,作者在本书中虽未像苏联政府那样露骨地宣扬沙俄

兼并中亚地区的“伟大进步意义”，但也未对沙皇俄国的殖民侵略活动进行深刻揭露，一些地方只是一笔带过。

此外，由于本书多处涉及我国新疆地区，所以对我们研究新疆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英译者为米诺尔斯基夫妇（V. and T. Minorsky）。维·米诺尔斯基也是英国著名的中亚史专家，著述甚多。本书英译本出版于1956年（1962年再版），收入《中亚史四讲》（*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第一卷中。

1966年出版了此书的日文译本，书名《中央亚细亚史概说》，译者为日本中亚史专家长泽和俊。

中译本根据1956年英译本译出，并根据1963年出版的《巴尔托里德文集》第二卷第一分册俄文原文进行了校订，改名为《中亚简史》。除原书和英译本注释外，又选用了巴氏文集俄文版编者的若干条注释。

此外，为便于了解和研究新疆地区的历史，我还特别从巴尔托里德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一书中摘译出有关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历史的部分，作为附录，供有关方面参考。《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为苏联巴尔托里德氏1926年在土耳其共和国伊斯坦布尔大学的讲学稿。土耳其语译本出版于1927年。1935年由Theodor Menzel氏译为德文，在柏林出版，题作《12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德文译本因经巴氏本人审订过（除最后一讲因作者去世未来得及外），所以在学术界比土耳其语译本具有更大的权威性。1945年出版了法文译本。德译本出版时又由德国东方学家舍德（H. H. Schaeder）补加了一些注释。此书中有关部分，皆据德译本译出。为了查对方便，译文旁边标上原

书(德译本)页数。另外,德文本有时行文过于简略,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补加一些字句,放在圆括号内。因我教学繁忙,《中亚突厥史十二讲》全书的翻译,只好有待于他日了。

耿世民

1976年6月于北京

本书1980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加以修订。

耿世民附记

2005年9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总 目 录

中亚简史 …… (1)

高地亚洲 …… (167)

目　　录

一

古代的中亚 …… (1)
中亚的希腊人 …… (2)
游牧民的移动 …… (4)
唐代时期的当地文化 …… (6)

二

阿拉伯人的征服 …… (13)
突厥人 …… (19)

三

黑汗王朝 …… (24)
哈孜那朝和塞尔柱人 …… (27)
西辽 …… (29)
花剌子模沙 …… (32)

四

蒙古的征服 …… (36)
屈出律 …… (37)

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沙 …… (39)
蒙古对中亚的征服 …… (42)
长春真人的旅行 …… (45)

五

成吉思汗后裔 …… (47)
中亚蒙古的统治 …… (51)
察合台汗国 …… (54)
阿米尔统治者 …… (56)
花剌子模 …… (57)

六

帖木耳 …… (61)
帖木耳后裔 …… (66)

七

乌兹别克汗国 …… (69)
18 世纪 …… (70)
19 世纪 …… (71)

译名对照表 …… (74)

附录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摘译) …… (90)

一

古代的中亚

俄国最南部地区的中亚很早就被卷入古代世界文化交流中。我们关于黑海北岸希腊城市的知识可以追溯到比中亚更早的时期，但这些城市作为外族居留地来说，对当地文化生活并未留下什么深远的影响。在外高加索只有一些边区曾受到亚述文化的影响。外高加索各族中只有阿尔明尼亚人作为波斯诸王的属民曾被提到过。当时他们主要居住在现在俄国版图以外的地区，即今波斯或土耳其境内。关于阿尔巴尼安人[1]和伊比利安人的最早记载仅见于庞培[2]征战时代（公元前1世纪）。

中亚的古代居民（包括定居的[3]和游牧的塞种人）与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君主国的波斯人一样，是属于伊兰人种。伊兰人的原居地仍是个未解决的问题。现存多数材料表明，伊兰人像后来突厥人一样，是由东向西推进并从中亚进入东欧（黑海的斯基泰人）和波斯的。波斯的前伊兰居民的残余在东北部很早就已消失，但在西南部则残留较久。有理由认为，这种前伊兰居民与所谓“雅非特成分”[4]（即前亚的非闪族居民，其现代遗存为格鲁吉亚人

及其他一些高加索族)有亲属关系。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近来确定在坎巨提(兴都库什山南部)(耿按:即今之洪扎地区)存在一种"雅非特"语言[5]。不清楚这些"雅非特成分"是该地区的土著,抑或是从西方迁来的移民。

在波斯西部,伊兰人曾受到有文字和国家组织的民族的影响。他们又把这两种东西传给了其东部的同族人。可把伊兰人进入前亚与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相比。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兰克人在西方熟悉了高卢的国家联合体观念,并把它带到东部日耳曼国来。

在中亚伊兰人独立文化生活的早期阶段,花剌子模人曾起过显著作用。近来证明,后来成为伊兰人民族宗教的拜火教源自花剌子模。从希罗多德书中(Ⅲ,117)也可看到,早在波斯帝国建立之前,花剌子模在中亚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一事实符合一般历史现象,即文明大都首先产生在大河流的下游一带,例如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就是如此。

之后,文化的领先地位从花剌子模转到了大夏。那里有波斯阿赫买尼德朝的总督驻扎,并从那里传播了印度文化的影响。

中亚的希腊人

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帝以前关于中亚的记载是微不足道的。大流士的波斯碑铭在历数被波斯人征服的地区时,关于征服本身和那里发生的事件都语焉不详(安息和大夏例外)。但大流士陵墓上的浮雕像可说是"具有特色的、有价值的民族学博物馆"[6],其中雕有帝国所有民族的代表,也包括中亚各族,都着本民族服装。

花剌子模人和印度人都参加了克塞尔克斯希腊的征战。亚历

山大时代,在花剌子模和印度都存在不受波斯管辖的统治者。这个事实表明,在东方,帝国的版图有所缩小。

我们关于中亚的最早地理知识要归功于亚历山大的征战活动。但也仅限于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沿这两条河流的中游一带地区。即使在稍后时期,希腊人关于这两条河流下游仍持有一种错误观念,他们认为这两条河流是注入里海的。东部伊兰人的文化发展远逊于西部伊兰人。这方面粟特人又低于大夏人[7]。不过粟特人那里也有城市,虽然规模小些。亚历山大曾不得不攻下许多"设防坚固的地方"(erymata),即当地占有土地的贵族城堡。这些城市之一的名称——马拉坎大尚残留在今撒马尔罕一名中。当时有关于大夏产米的记载,但没有关于粟特地区农作物品种的记载。在锡尔河以北似乎既不存在城市,也无农业。许多地理学上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因为不论是亚历山大的征战日记(依其命令是记有的),或是有关其战事的原始材料,都未留传下来。

在亚历山大及其在亚洲的后继者塞流克朝统治下,一些新的城市(如亚历山大里亚城、安提奥赫城、塞流克亚城等)在中亚建立了起来。一个安提奥赫城建在锡尔河的北部。两个安提奥赫城建在木儿哈卜河,后来它们各以下面的名字知名:上谋尔夫(今阿富汗境内的巴拉一木儿哈卜)和下谋尔夫。当安提奥赫·索特尔时代(公元前280—前261年),谋尔夫绿洲周围曾筑有防御游牧民的长垣。这是中亚地区首次筑有这一类型的东西[8]。独立的希腊一大夏王国在中亚建立后(公元前3世纪中期),仍继续修建新城市。当时粟特地区是它的组成部分。尤克拉提德王国(公元前2世纪)被称做"千城之国"。从亚历山大时代起与印度的密切关

系也大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希腊—大夏诸王曾对印度产生过侵略意图。

游牧民的移动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大夏王国的北部和之后的南部诸地为中亚游牧民所征服。他们不久又征服了印度的若干地区,并在希腊文献中以斯基泰这个通名而著称。在同一世纪,开始了中亚与中国的交往。希腊—大夏王国的灭亡是同时见诸远东(中国)和西方(希腊)历史记载的世界史上的首次事件。

我们关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后7世纪之间的中亚所能知道的一切,几乎都取自中国史料。俄国比丘林神父汇编了这些材料(《古代中亚各族史料汇编》,圣彼得堡,1852年)[9]。我们关于大宛(费尔干)、新疆定居区及中亚草原游牧民的最早知识也要归功于中国人。希腊人在粟特地区,中国人在大宛和新疆都曾看到很发达的农业和城市生活。中国人从大宛传入了葡萄和苜蓿的栽培方法。由于地近游牧民之故,大宛的养马业曾很发达。中国人为了得到那里的良种马,甚至曾组织过军事远征。另一方面,大宛居民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打制金银用具和铁制武器的技术。当伊斯兰教传入的最初几个世纪,这些手工艺在费尔干仍很兴盛。

两个游牧民族(伊犁地区的乌孙和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在这之前不久到达中亚,这一点和导致希腊—大夏王国覆灭的民族迁移有关。中国史料没有提到东部与乌孙、南部与月氏接壤的康居在这次迁徙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未谈到康居是当地的原居民抑或是像其邻人一样的新来者。现在已确定[10]月氏就是当地钱币

上和西方史料中 Kush 或 Kushān[11]族一名的汉语发音。该族的一部,即中国史籍上的"小月氏"留在新疆和阗东部一带。大月氏和小月氏又称做吐火罗。显然,Kush 或 Kushan 一词主要含有政治意义,而吐火罗一词主要含有族的意义。吐火罗斯坦地区因吐火罗人而得名。这个地区当伊斯兰教时代在狭义上指巴尔赫和巴达克尚之间阿富汗北部地区,广义上指阿姆河上游左右支流的全部地区。从和阗东部地区(这里吐火罗人曾住过)发现的佛教文献的语言来看,吐火罗人似为亚利安族[12]。乌孙和康居的族源尚不能确定,中国人说他们是游牧民,但又提到似为游牧民征服的农业区的五小王康居领地。这些农业区应位于塔什干附近、花剌子模、扎拉夫尚(卡塔—库尔干和布哈拉附近)及卡什卡河流域(沙赫里萨卜孜附近),撒马尔罕在公元 5 世纪前尚不见于中国史籍。这点符合希腊史料的记载,那里说撒马尔罕曾毁于亚历山大。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果是,撒马尔罕周围地区在几个世纪中失去了以前的重要性,以及扎拉夫尚河谷的文化中心移于卡塔—库尔干附近。这个基于希腊和中国史料上的结论也为某些考古学材料所证明。

中国到前亚的商路开辟于公元前 2 世纪,稍后它成为中国丝绸出口的主要通路。希腊—罗马的玻璃和琉璃也通过同一道路输入中国。在西方的影响下,玻璃工业在中亚发展了。同时在东方的影响下,当地金属工业也获得了发展。波斯先是在安息朝,稍后在萨珊朝时代,曾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他们曾力图阻碍中国与罗马帝国间建立直接关系,藉此来保持其商业居间人的有利地位。在萨珊朝时代,波斯人握有世界贸易的最重要的陆海通道。萨珊朝波斯、中国和印度的影响以及希腊—大夏文化的余波对提高中亚伊兰人,尤其是粟特人的文化水平起过作用。

那个时期中亚的政治生活只限于当地统治者(尤其是在新疆)之间的小规模战争,以及游牧民的入侵和征服。除当地统治者外,中国人有时也进行反对游牧民的斗争。公元5世纪时,中亚的南部为哌哒(Haytal[13],即希腊史料中的Hephtalites)所征服(他们也似为伊兰族),于是"贵霜"一名就转用来称呼他们[14]。粟特人也臣属于哌哒人。哌哒的牙帐设于巴达克尚山区。他们对印度的进军未获成功[15]。根据史料,6世纪中(563和567年间)哌哒王国为突厥人所征服。后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从中国北边到波斯和拜占廷边境的极其广袤的游牧帝国。这一点说明,为什么我们关于这个帝国的史料一方面来自中国,另一方面来自波斯、希腊和阿尔明尼亚。这个时候,游牧的伊兰人最后被赶出中亚。到7世纪时,伊斯兰教徒在那里已碰不到他们了。定居的中亚伊兰人,即粟特人则善于利用突厥帝国的广袤和强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握有丝绸贸易独占权的粟特人的商业利益使得突厥和波斯人的关系破裂,并导致突厥和拜占廷之间使节的往还,与中国的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撒马尔罕的东门被称为"中国门"。粟特人的居留地出现在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通道上——从经和阗和到罗布泊的新疆南部的南路直到经七河地区的最北路[16]。在七河地区及锡尔河东部(这里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只见有游牧民),7世纪著名的旅行家玄奘于629—630年间见有农田和商业城市。

唐代时期的当地文化

唐代(从618年始)中国的政治势力达于顶点。这一时期的中国史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亚物质和精神文化较为详细的材

料。例如提到卡什卡河和扎拉夫尚河河谷中水稻及玉蜀黍、小麦的栽培。在包括费尔干在内的三个邦国中见有公羊式的镀金王座,而在布哈拉王座则为骆驼式的。这些中国史料也为拜占廷使节的报道所证实。他们在突厥可汗的牙帐那里见有由四只金孔雀支撑的镀金王座,和并不劣于拜占廷出品的动物银像。显然,王座和动物像都是被征服的中亚伊兰人的制品,而不是突厥人自己制作的。甚至在伊斯兰统治的10世纪中,木做的动物像——马、牛、骆驼及其他动物——尚见于撒马尔罕的广场上。在库沙尼亚[17](扎拉夫尚河北,今卡塔—库尔干区)城附近有画有壁画的建筑物:北面墙上画的是中国皇帝,东面墙上画的是印度婆罗门和突厥可汗,而西面墙上画的则为波斯王和罗马皇帝。

突厥人使用的文字借自中亚伊兰人。公元567年派到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使节携去了一封写有"斯基泰字"的书信。最古老的突厥字母用于保留到现在的一系列碑铭中。其中最大的为在蒙古鄂尔浑河畔发现的、属于公元732年和735年的两个碑[18]。丹麦学者V. 汤姆森就是靠它们才得以解读出这种字母的。在俄文中两者(指字母和碑铭——汉译者)都因鄂尔浑而得名。其他年代不详的碑铭(从字形来看较为古老,大约属7世纪)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19]。字数不多的鄂尔浑文碑铭也在中亚和塔拉斯河谷即阿乌里亚阿塔[20]以南发现。这种字母来自粟特文,即中亚伊兰人的文字。最古的粟特文样品为在中国敦煌附近长城故垒中发现的商业文书。回鹘(即古代维吾尔)字母来源于粟特字母这一点比较肯定。从年代上说,回鹘文是突厥人使用的第二种文字。它因为为新疆突厥族起源的首批(? ——英译者)定居民[21]使用而得名。粟特文和回鹘文我们可从约属于7世纪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

献中看到。粟特语文献是用一种语言写成,但有方言的差别。不论是其语言抑或是方言都不能确指其地点[22]。粟特语文献都是在新疆发现[23]。那里由于气候异常干燥而使得从各地携来的文献保存得很好。语言特点和某些术语(如月份名称)与11世纪伊斯兰作者贝鲁尼谈到粟特语时所说的正好吻合。希腊人给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区起名叫索格底亚那(Soghdiana),而伊斯兰地理学家只把这一名称用来指扎拉夫尚盆地[24]。至于贝鲁尼提到的粟特语,我们不知道它作为一种书面语言往北和往西传播到多远。

不同宗教的代表使用不同的文字。佛教徒粟特人采用当地的粟特文字,而摩尼教徒和景教徒则用他们自己的文字[25]来书写当地语言。在回鹘突厥人那里,佛教徒有时使用梵文字母[26]。稍后,所有三种宗教的代表文字都转用回鹘字母。一些摩尼教文献以两种文本传至今天,一种用摩尼文字,另一种用回鹘文字。新疆的两种书面语言,即北部(库车附近)和南部(和阗以东)的语言保留到现在的仅为佛教文献[27]。北部的语言被德国人和法国人(耿按:原文如此!)错误地称作"吐火罗语",它属于印欧语系,但既不是伊兰语,也不是印度语。现在尚不能确定它属于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哪一个民族,以及这种人在印欧人迁移中所占有的位置。南部语言则属于伊兰语族,并且似乎把它称做"吐火罗语"较好[28]。

在新疆尚未发现有波斯和中亚西部伊兰人的民族宗教——拜火教的文献。中亚的拜火教有一些不同于萨珊朝波斯拜火教的地方特点。其特点之一为一种骨匣(ossuaries)。这是些绘有画(有时为浮雕)的小黏土匣子,里边装有肉体腐烂后的骨头,因为土地不允许被腐烂的尸体所玷污。这种骨匣只在俄属突厥斯坦发现(即在从扎拉夫尚的卡塔—库尔干到七河的匹施派克一带)[29]。其

上的绘画不论对宗教史家和艺术史家来说都同样有价值,它表明存有希腊艺术传统和萨珊朝波斯艺术的影响。

有一些关于前伊斯兰时代中亚、尤其是其首府撒马尔罕宗教生活的史料。在这些地方,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30]团体一直存在到10世纪。佛教早在前伊斯兰时代在撒马尔罕及其他地区已消失,但在吐火罗斯坦(广义上的)它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一直存在到伊斯兰教征服时代为止。

政治上,中亚分成若干小王国。势力最大的统治者是撒马尔罕王,他像费尔干王一样拥有依赫西德的称号。但即使依赫西德也只不过是占有土地的贵族中的首领而已,并且也像他们一样被称为狄康。狄康们住在设防坚固的堡垒中(其遗址,即所谓的"宅堡"存在于中亚的许多地方),并从那里控制全国。在这方面,公元7世纪的中亚与公元前4世纪的中亚很少有什么区别,尽管有贸易和工业上的进步。城市不大,这一点已为中国和伊斯兰史料以及考古发掘出的遗址所证实。前伊斯兰时代撒马尔罕遗址阿夫拉西亚普(全国的首府)所占面积不超过二平方公里[31]。在信仰佛教的吐火罗斯坦,城市生活则有长足的进步。忒耳迷(其次要城市之一)的面积与撒马尔罕相等。巴尔赫(古代巴克特拉)很可能更大些。这一点也为巴尔赫在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中在中亚和整个伊斯兰世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证明。

公侯们臣属于突厥汗,并且有时也臣属于中国皇帝。只有现在外里海地区到谋尔夫的一部分属于萨珊朝的波斯。萨珊朝形式的钱币在一些地方铸造(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罗马的建筑技术通过萨珊朝波斯的中介表现出其影响。这种影响的一个例证是撒马尔罕用来引水入城的"铅制管道"(jū-yi arzīz)[32]。

注 释

① 在阿尔明尼亚史料中写作阿尔万克(Alvank),指住在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库尔河下游的民族。——英译者

② 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为罗马前三雄之一。——汉译者

③ 即外里海地区的安息人、大夏人(木尔哈卜河沿岸地区也属大夏),阿姆河下游的花剌子模人和扎拉夫尚河流域的粟特人。——英译者

英译本在此书古代部分中把阿姆河、锡尔河分别译成 Oxus (乌浒水)和 Jaxarrtes(药杀水)。为通俗起见,汉译文从俄文原本分别译为阿姆河、锡尔河。——汉译者

④ 此为马尔(1864—1934年)首次提出的用语,已陈旧。——英译者

⑤ 洪扎和那加尔地区的布鲁沙斯基语只能在某些句法结构方面可与诸高加索语作比较。——英译者

⑥ 此为魏斯巴赫在其《大流士墓上的楔形文字碑铭》一书中的用语。关于浮雕像可参看萨尔和赫尔茨菲勒德的《伊朗的浮雕像》一书。

⑦ 近十年来考古工作表明,巴氏低估了古代东伊兰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水平。——俄编者

⑧ 苏联考古家发现了这些长垣的遗址。——俄编者

⑨ 1950—1953年又再版过。——英译者

⑩ 这一问题现并未解决。——英译者

⑪ 即汉文史籍中的贵霜。——汉译者

⑫ 这个问题尚在讨论中。——英译者

近十几年研究表明,公元前2世纪侵占大夏的吐火罗人的语言应属东伊兰语的塞语组。它与其文献在新疆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占有特殊地位)并不接近。——俄编者

⑬ Haytal 为阿拉伯语形式。读作 Habtal 更好些。——英译者

⑭ 这一问题尚未解决。Kushan 一名似残存于兴都库什(Hindukush)这一地理名词中。——英译者

⑮ 在取得巨大的、但不巩固的军事胜利后，北印度一度臣属于呔哒。——俄编者

⑯ 关于粟特人的殖民活动，参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新的研究有伯恩施坦、普莱卜兰克、克里亚施托尔内的论文。——俄编者

⑰ 即汉文史籍中的屈霜你迦、贵霜匿，亦称何国。——汉译者

⑱ 指著名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汉译者

⑲ 近年研究表明，叶尼塞河流域鄂尔浑文碑铭属于10世纪左右。——汉译者

⑳ 即今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江布尔城。关于在今吉尔吉斯塔拉斯河谷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参见最近出版的论文集《吉尔吉斯新发现的碑铭》，伏龙芝，1962年。——俄编者

㉑ 指回鹘人。关于回鹘人是否为新疆第一批突厥族定居民的问题尚未解决。一些人认为公元840年回鹘人西迁新疆以前，吐鲁番盆地已有突骑施、拔悉密等操突厥语的人居住。——汉译者

㉒ 粟特语文献中的方言差别很小。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与佛教文献的差别是因为佛教徒粟特人保留了历史正字法的原则，而摩尼教和基督教文献（分别使用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中的正字法更接近8—9世纪的实际发音。依李夫希茨的意见，粟特书面语的基础（如4世纪初敦煌出土的粟特语"古代书信"和木格山出土的文书所表明的）为撒马尔罕方言。——俄编者

㉓ 现粟特语文献也在粟特当地发现。其中重要的为木格山城堡出土的文书，属8世纪初，见《粟特文集》。——俄编者

㉔ 10—12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所用粟特（Soghd）一语也包括卡什卡河流域。——俄编者

㉕ 指摩尼字母和叙利亚字母。——汉译者

㉖ 应为婆罗米字母中亚变体。——汉译者

㉗ 近来发现有用古代龟兹（库车）语写成的摩尼教文献。——汉译者

㉘ 一般认为它属于伊兰—塞语(Iranian-Saka)。——英译者

现在一般称之为和阗—塞语。属印欧语系伊兰语族东支。而北部的所谓“吐火罗语”则为在印欧语系中占特殊位置的语言。它在印欧语系中的具体位置尚未解决。二次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发现真正的吐火罗语碑文后(使用希腊字母),南疆北部的这种语言称龟兹—焉耆语。——汉译者

㉙ 这种骨匣也在新疆库车发现。——汉译者

㉚ 据俄文本改,英译本此处为佛教。基督教在亚洲的一派我国史籍上称为景教。——汉译者

㉛ 这方面可参看苏联学者在花剌子模、粟特地区和土库曼的重要发掘报告。——英译者

㉜ 即通过石拱和城沟敷设于市集屋顶下的铅制引水管道。

二

阿拉伯人的征服

阿拉伯人是在亚历山大后从西方侵入中亚的第一个民族。他们的征服使中亚的一部分再次附属于前亚。阿拉伯人把阿姆河彼岸的地方——Mawarannhr(逐字译为“河外地”之意[1])合并于萨珊波斯东部地区的呼拉珊。谋尔夫城成为整个呼拉珊地区的首府。撒马尔罕则成为河中地的首府。从军事观点看,屈底波·依宾·穆斯林(705—715年)总督的远征非常重要。他于712年占领撒马尔罕,并且这是我们除阿拉伯史料外,又掌握某些当地报道的[2]关于阿拉伯征战活动的少有情况之一。当地统治者曾经请求突厥可汗和中国皇帝帮助来反对阿拉伯人。8世纪30年代末,在锡尔河上阿拉伯人对突厥人的胜利导致突厥游牧帝国的解体,虽然阿拉伯人并未穷追他们到草原地区。751年在塔拉斯河谷对中国的胜利解决了两种文化——前亚(伊斯兰)或远东(中国)——哪一个应统治中亚的问题。阿拉伯人自己把中亚看作一个从中国皇帝那里夺来的地区。

阿拉伯人在其征战中曾到达过喀什噶尔[3]及锡尔河地区的东部。而其实际征服的地方只到费尔干的东边、乞尔乞克河谷及花

刺子模。概言之,只到农业区与草原接壤的地带。8 世纪曾建有一长垣来保护乞尔乞克河谷免遭游牧民的入侵。类似的长垣曾保护过撒马尔罕地区,即狭义的粟特。这些墙垣遗址以土垄的形式一直保留到今天。呼拉珊地区的总督或阿米尔直接由哈里发或专管哈里发帝国东部地区的最高总督来委任。这些不断更换的总督利用其任职的短暂时期攫取财富,并将其传给后代。当地的王朝虽然完全臣属于呼拉珊阿米尔,但尚继续存在一个长时期。有时阿拉伯阿米尔与当地王一起进行统治。

8 世纪中期,起于呼拉珊的一次运动使得哈里发的白衣大食王朝垮台,代之以黑衣大食王朝。由呼拉珊人,即中亚伊兰人组成的武装队(稍后又加进了突厥人)构成哈里发在东方的主要保卫力量。呼拉珊出身的高官在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尤其在东部地区握有最高职权。在黑衣大食初期,巴尔玛克家族为炙手可热的大臣。9 世纪他们从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统治河中地各省的大权,并从公元 900 年起成为整个呼拉珊的阿米尔。巴尔玛克(巴尔玛克朝的始祖)和萨曼胡达特(萨曼朝的始祖)都是出身于巴勒赫地区(这一点表明该地区的重要性),他们两个在呼拉珊总督阿萨德的统治下都获得了高位[4]。725 年巴尔玛克奉阿萨德之命,重建了当阿拉伯人征服时期被破坏了的巴勒赫城,并把附近阿拉伯人建立的巴鲁坎城的居民迁到那里。这是伊斯兰历史上藉废除伊斯兰教徒建立的城市来恢复一个建于前伊斯兰时代城市的惟一例子。值得注意的是战败者对战胜者在文化上的胜利是发生在伊朗的佛教地区。其他如关于玛德拉萨(一种特殊类型的伊斯兰教神学最高学府)的起源,中亚最早苏非派[5]的故乡,以及波斯语和文学在中亚的复兴的记载,也都与上述伊朗佛教地区有关。另一方面,在伊

斯兰时代,佛教伊朗地区(一般说即中亚伊朗)采用了大家认为由巴尔玛克朝和萨曼朝代表的(西部)伊朗的行政传统。当萨曼朝的建立者伊斯马依勒(892—907年)仅统治河中地的时期,他的官邸是在布哈拉,而不是在首府撒马尔罕。在臣属了阿姆河以南、以西的地区后,萨曼朝仍驻扎布哈拉,于是前呼拉珊总督府的行政中心转到了阿姆河以北。

10世纪萨曼朝时代是阿拉伯地理学达到顶点的时期。这种文献的主要作品已为荷兰东方学家德高叶(De Goeje)所刊布[6]。这些著作详述了当时伊斯兰教世界的所有地区的城镇、河流及灌溉系统,并有关于工业、风俗习惯、宗教甚至方言的材料。关于萨曼朝时代中亚的史料比起以前和以后时代来,都来得特别丰富。

由于阿拉伯地理学家之功,我们得以能够否定那种把中亚气候条件的变化说成是由于干燥化过程所致的理论。关于10世纪中亚的详细记载表明,当时耕地和草原的分布情况大致和现在一样。这一点说明,即使干燥化过程存在,但它进行得如此缓慢,以致于千年之内看不出什么影响来。

同样的史料说明,当伊斯兰时代的最初数世纪中,中亚有了迅速的进步。公元7世纪时中亚差不多和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一样,其文化发展远不能和当时的萨珊朝波斯相比。但到10世纪时,它已和古代文明的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差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城市规模大大扩大了,工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中亚,阿拉伯人并没有像在波斯(设拉子和库木)和外高加索(甘贾[7])那样建立过新的大城市。但在其统治下原有的城市扩大了。把文献记载与现存遗址相比较,很能说明像谋尔夫、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城市逐渐扩大的情况。关于前伊斯兰时代城市的布

局，我们现在已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其组成部分如下：

1. 内城（shahristan）可以谋尔夫的基奥尔—卡拉、撒马尔罕的阿夫拉西亚普遗址及布哈拉的内台部分为代表。

2. 城堡（diz 或 kuhandiz“古城堡”，由此变为 kunduz）它或位于内城中（如谋尔夫和撒马尔罕）或位于其外（如布哈拉）。

3. 外城（rabad）围有外城墙（如谋尔夫的基拉金—乞勒布尔吉围墙、撒马尔罕的都瓦里—基亚马特围墙和布哈拉现在的城墙）。

即使在首府转到布哈拉以后，撒马尔罕仍然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城市，是其商业和工业的中心。从 751 年怛逻斯战役中中国被俘者那里，撒马尔罕人学会了制造褴褛纸。这种新的书写材料逐渐从撒马尔罕传到西方，并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代替了草纸（papyrus）和羊皮纸。另一方面，西方纺织工业的影响先是表现在波斯，从那里又到了中亚。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制造的纺织品按埃及城市或法尔斯地区波斯城市起名字。位于撒马尔罕东北部的小城瓦达尔制成的棉织物也颇享盛名。瓦达尔为阿拉伯移民中心这一事实表明，移居中亚的阿拉伯人不单是作为信仰的战士来到这里的。在城市生活和工业发展中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从波斯来的移民。仅此一点就能说明粟特语从中亚平原上消失的原因[8]。现粟特语仅残留在雅格诺布河谷[9]（有两种方言）。粟特语被与波斯语很少差别的塔吉克语所代替。塔吉克[10]这一原指阿拉伯人的名称，是一个从北阿拉伯塔依（Tayy）部落名称转来的伊兰词。突厥人似把塔吉克[11]一词理解为“伊斯兰教徒”、“属于伊斯兰文化的人”的意义，并用来指称他们所知道的伊斯兰教徒主要群众——伊兰人，而不区分塔吉克人和阿拉伯人。山地居民戛尔查

或戛勒查(来自 ghar“山”一词)在语言、尤其是在风俗习惯方面与平原居民有很大差别。他们居住的地区称做戛尔奇斯坦,10 世纪时,中亚的语言(至少在知识阶层中)和波斯使用的语言间差别很小。这可从中亚出身的诗人,如鲁达几在波斯文坛上所占的显赫地位这一事实中看出。花剌子模居民仍继续使用自己的、为其他伊兰人不懂的语言,并且甚至用来写作[12]。之后,这种语言似乎是为突厥语而不是波斯语所代替。作为花剌子模风俗特征的高帽子残留在北部希瓦人和土库曼人中间。某些只残留在希瓦和土库曼人中与灌溉有关用语(如 arna“大渠”、yab“小渠”)无疑是花剌子模语的残余。

早在 9 世纪,河中地已被认为是一个纯伊斯兰国家。其居民参加了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同一时期左右产生了当地的神学学校,并且伊斯兰教中的哈纳非派取得了优势。死于 832 年的布哈拉学者阿布·哈非孜(像其墓志铭上所写的那样)被称做“河中地学者的导师”。10 世纪,除犹太教团体外(它一直存到现在),在撒马尔罕尚有拜火教和景教团体,以及人数不多的摩尼教团体。撒马尔罕的拜火教徒 Mugh 被委以照管“铅制管道”的任务,这使他们得以免除伊斯兰教国家对非伊斯兰教徒所课的人头税。11 世纪时,仍然提到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拜火教徒。10 世纪在锡尔河以南,在界于农业区与“饥饿草原”(耿按:指中亚北部,今哈萨克斯坦地区)的接壤地区,存在一个景教徒居留地。在撒马尔罕以南乌尔古特附近也有一个景教大教堂。那里最近发现了用叙利亚语写成的景教碑铭。当时景教徒在人数上少于犹太教徒。在伊斯兰教徒本身中间,前时期的某些风俗和信仰仍然残留着。诗人鲁达几在其诗作中表露了关于作为人类父母的天和地的纯粹异端

的观念。源自偶像崇拜的泥像在布哈拉自由买卖直到10世纪中期。二元论信仰的残迹在现在农村仍可见到。在广大群众中什叶派与正统的伊斯兰教同时传播。萨曼朝的阿米尔·纳斯尔(914—943年)保护了一个什叶派运动。他这样做可能是出自对贵族及其同盟者神职人士的憎恶。这一点导致了他的覆灭。

一般说来,建于萨曼朝的新秩序在10世纪时尚未能完全取代旧的。集市所在和工、商业阶层集中的外城区的发展超过了旧的内城区。但后者传统上仍认为是"城市"本身。公侯和占有土地的贵族的独立让位于前亚型的专制制度和官僚集中制。萨曼朝的首府布哈拉有多至十个部(divan)或行政部门设置在内城广场(Registān)的周围。而在像花剌子模的某些地区,前伊斯兰时期王朝的世袭统治者仍然存在,仍残留有一些有影响的狄康。如通卡特(位于塔什干南部安格林河河谷)的强有力的领主虽然被剥夺了政治权力,但仍对居民有很大影响。像黑衣大食王朝哈里发一样,萨曼朝诸王在其身边设有成为其主要军事力量的由突厥奴隶组成的近卫军。但这时军民之间的区别尚不像后来那样严格。居民保有一些勇武好战的习性并继续携有武器。由人民群众组成志愿兵("为信仰而战的战士")队伍,像"自由的哥萨克"那样守卫伊斯兰教边区免遭突厥人的入侵,但同时也对内部秩序构成了威胁。记载中说这种队伍"既是政府所要依靠的,也是政府所恐惧的目标"。作为城市生活主要中心的撒马尔罕居民,也以目无法纪而著名。由于他们的反叛精神,政府只得毁坏了该城外墙的城门。萨曼朝也不能完全信赖他们的突厥近卫军,尤其是在反对突厥可汗的战争中。10世纪末突厥人灭掉萨曼王朝就是由于突厥近卫军首领和狄康的叛变以及普通人民群众抱冷淡态度之故。

他们不喜欢萨曼朝的专制倾向和官僚集中制。因为保持一支近卫军和官僚机关不得不增加赋税。

突厥人

通常在中亚游牧民对文明区进行新的征服之前有一个他们被吸入文明影响范围内的时期。与游牧民进行贸易对农业区居民来说是件有利可图的事。他们从游牧民那里得到畜产品,尤其是肉和马匹,而游牧民对其农业区邻人的产品(如小麦,特别是布匹等)的需求则更要大些。凡在游牧民与定居居民间存在贸易的地方——如在中国、伊斯兰世界以及俄罗斯边区——都是游牧民把其牲畜赶到边界商业点,而不待商人来到他们的草原上。除日用品商品外,另一个吸引游牧民的是沿大河流两岸的长有芦苇丛的地方,这里很适于过冬。游牧民来到冬季住地进行贸易时,可能搞掠夺性的入侵。为对付这一点,修建了为边防自愿兵(即所谓"为信仰而战的战士")居住的设防坚固的住所(即所谓的 rabat,注意不要与 rabad"外城"一词相混)。萨曼朝政府更把沿锡尔河中游一带的土地让给突厥的移民。交换条件是让他们防守边区免遭其异教徒同族人的入侵。此外,来自伊斯兰中亚的商人经过以前粟特人开拓的通道把伊斯兰文明传入辽远的地区。像以前一样,主要大道是那些通向中国的商道,并且从那里又分出通向北方几个游牧汗国牙帐的其他支路:从塔拉斯(今阿乌里亚—阿塔)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乞马克人牙帐要走 81 天;从吐鲁番附近有通向黠戛斯进入叶尼塞河上游流域的大道。依据中国史料,10 世纪上半期伊斯兰教徒、商人甚至曾深入到鄂尔浑地区的东蒙古。从锡尔河下

游也有另外一条通向乞马克人牙帐的道路。该地区位于萨曼朝领域之外,但那里有由来自萨曼朝的移民建立起来的贸易地。这些移民似乎一部分来自沿锡尔河的中游地区,该地区的萨乌兰城是萨曼朝河中地的边站。另一部分则来自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的富庶主要归功于与游牧民的商业贸易。这种贸易在伊斯兰时代似乎有很大发展。当时商业贸易集中在花剌子模的北部——这里有兀龙格赤城(今之老兀龙格赤)。10 世纪时花剌子模的这一部分地区为不受花剌子模沙前伊斯兰王朝管辖的独立邦国。当时花剌子模沙的统治不超出该地区的南部。来自兀龙格赤的商人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带到伏尔加河畔。那里的不里阿耳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哈扎尔国则有一个由花剌子模伊斯兰教徒组成的近卫队。花剌子模人似乎当伊斯兰教在其国内获得最后胜利以前就已在哈扎尔人那里任职,因为 764 年由一个花剌子模人指挥的哈扎尔军曾入侵外高加索的伊斯兰领地。关于萨曼朝和伏尔加河沿岸地区间的紧密联系可由这样的事实看出:依宾·法德兰所描述的 921—922 年的哈里发使节是经布哈拉和花剌子模的迂回道路,而不是走经高加索的近路到达伏尔加河流域的。兀龙格赤的阿米尔们通过与游牧民的贸易变得如此强大,以至 10 世纪末时,他们终于合并了花剌子模的南部地区,并攫取了花剌子米沙的称号。几年后,萨曼朝在与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斗争中覆灭了。

那时候,伊斯兰教徒在商业上的成功并不常常伴以传播伊斯兰教上的成功。不像佛教、景教和摩尼教那样,伊斯兰教宗教人士那时并不进行传教活动。信仰的传播被看成是国家的事情,而不是私人的事情。为商业目的而旅行的伊斯兰教徒并不从事于宗教宣传。8 世纪时,有用汉语写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文献,但没有

伊斯兰教文献,虽然依据史料,来到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数量上并不少于其他前亚宗教的信徒。这样,景教徒和摩尼教徒在其传教活动中从伊斯兰教徒在中亚贸易上的成功所得到的好处要比伊斯兰教徒多得多。景教徒和摩尼教徒在中亚的重要进展是发生在伊斯兰教时代。作为伊斯兰教国家政治和文化影响的必然结果,伊斯兰教主要是在伊斯兰世界的近邻得到传播。与政府政策无关,伊斯兰教藉神秘派托钵僧(darvish)的活动而得到传播。他们几乎是伊斯兰世界内、外部传教运动的惟一代表者。托钵僧派的舍依赫(Shaykhs)[13]在草原常比农业地区获得更大的成效,同时他们的活动也只限于附近的草原地区,并没有从事远方的传教活动。

10 世纪上半期的穆斯林地理学者认为,伊斯兰教在东北方的疆界是与萨曼朝的疆界相一致的。他们把突厥人说成是与伊斯兰教徒对立的,只有锡尔河上的突厥人例外。这一部分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成了萨曼朝的属民。塔拉斯仍是东北边区贸易的中心。这个位于同名河畔的城市于 893 年被萨曼朝征服时,其"主要教堂"被改为礼拜寺。这一事实表明这里的景教传播走在伊斯兰教的前面。但依宾·哈乌卡勒的叙述很难说是正确的,他说伊斯兰教徒未曾深入到比塔拉斯更远的地方,因为过了该城即为游牧人葛逻禄突厥人的领地。穆卡达西——一位 10 世纪下半期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提供了另一幅完全不同的图景:位于塔拉斯东部的居民区有礼拜寺。像在塔拉斯城一样,梅尔克的教堂被改为礼拜寺。在同一居民区附近,一个萨曼朝的领主建筑了设防的士兵住所(拉巴特)。

历史家们在谈到 960 年有人数众多的突厥人(20 万帐)首次皈依伊斯兰教时,没有提到任何圣战。这件事可能与当时卡里马

提(一位来自呼拉珊的伊斯兰学者)来到突厥汗庭有某种关系。关于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和卡里马提旅行的记事大概是指领有楚河河谷上的巴拉萨衮城和喀什噶尔城的突厥王朝。这个突厥王朝从那里在10世纪末对萨曼朝进行了入侵。虽然七河南部和新疆南部西北方之间隔有终年积雪的高大山脉,但这并不妨碍在游牧民统治下属于同一国家或甚至属于同一领地。这是因为新疆南部没有游牧民所需要的草场所致。另一方面,高山峻岭也构成进军的障碍。像其他入侵中亚农业区的游牧人一样,突厥人对萨曼王朝的入侵也是来自东北的七河一带,而不是来自喀什噶尔。在历史上,喀什噶尔常常受到来自费尔干方面的入侵,而不是相反。

注 释

① 汉文一般译为河中地。下同。——汉译者

② 公元712年撒马尔罕王写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

③ 阿拉伯人是否到过喀什噶尔尚是问题。——英译者

④ 此处英译文与俄文原文有出入。仍按英泽文翻译。——汉译者

这里显有脱文。这里不仅应指巴尔玛克家族,也应指萨曼家族。正是萨曼家族在9世纪从哈里发那里获得了统治河中地各省的大权。而从公元900年起,在布哈拉统治者伊斯马依勒战胜了阿米尔·本·莱斯·萨法里德后,萨曼家族就成了整个呼拉珊的阿米尔。——俄编者

⑤ 伊斯兰教中的神秘派。

⑥ 收入《阿拉伯地理文化》,卷一至卷八中(*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 Vols. Ⅰ—Ⅷ)。

⑦ 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基洛夫巴德市。——俄编者

⑧ 巴氏过高估计了波斯移民对波斯—塔吉克语在中亚传布的作用。史料中并未见有这种大量移民的记载。如李夫希茨所指出的,早在阿拉伯人

侵前,波斯语就已从呼拉珊传布到中亚地区。粟特语先在城市中心消失。在农村地区,粟特语似一直使用到蒙古入侵时。——俄编者

⑨ 在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汉译者

⑩ 我国史籍中的大食似即来自此语。——汉译者

⑪ 关于族名“塔吉克”来自阿拉伯语 Tāzī 以及对东伊兰人来说 Tazi(意为“阿拉伯人”)和“塔吉克”二词的关系并未最后解决。——俄编者

⑫ 用花剌子模语写成的文献已为 W. 痕宁和 A. 弗列曼所研究。——英译者

⑬ 为教长之意。——汉译者

三

黑汗王朝[1]

征服萨曼王朝领地的突厥族并没有留下关于他们如何皈依伊斯兰教的可信史料。只有关于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某种传说性的记载。这位汗的坟墓现在还被认为是在喀什噶尔北的一个村子中(耿按:指今阿图什县)。这些突厥人也同样很快忘记了其过去前伊斯兰时代的文化。前伊斯兰时代传下的回鹘字母在一段时间中与阿拉伯字母同时使用。之后这种文字也被遗忘了。只是当蒙古统治时,它才又恢复使用[2]。蒙古人从新疆非伊斯兰教居民那里接受了这种文字。在行政术语中,特别是在汗的称号中还保存了草原传统和伊斯兰时期以前传统的某些残迹。如一些伊斯兰教徒的汗把他们自己称做中国汗(突厥语为Tabghach-khan或Tamghach-khan),虽然他们的领地从未包括中国或与中国接壤的地方。伊斯兰突厥文学主要是在伊斯兰教,尤其是在波斯范例的影响下形成的。突厥人与中国文化、佛教、景教和摩尼教较早的接触并未在这方面留有什么明显痕迹。这一点说明了突厥摹仿作品的枯燥乏味和在普通群众中缺乏影响。这一点可以比较巴拉萨衮人玉素甫在回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为喀什噶尔汗写的劝戒长诗《福乐智慧》(Qutadghu Bilig)[3]和1082

年用波斯语写成的劝戒书《Qābūs-nāma》中看出。后者曾至少三次被译成突厥语,波斯作者生动地叙述了其劝戒主题并用历史事例加以证明,从而增加了这本书的价值。而在《福乐智慧》中,人物都是没有生气的比喻形象:由一统治者代表正义,一位宰相代表幸福,宰相的儿子代表智慧,宰相的兄弟代表知足。目前只发现该书的很少几个抄本[4]。1909 年在乌拉尔河口附近在萨莱乞克村(耿按:为金帐汗国的首府遗址),发现一个写有从这个长诗中改写的诗句的陶瓶,说明它仍有较大的影响。

萨曼王朝是从东北方面被伊斯兰教徒突厥人征服的。最先被占领的地区为伊斯非加普,即现在的奇姆肯特。992 年突厥军队首次进入布哈拉城,但同年被迫退出。依据 996 年的协定,萨曼朝被迫把他们在扎拉夫尚盆地以北的全部领地让给突厥人。999 年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也转入突厥汗手中。末代的萨曼王在几次企图恢复其王朝势力的尝试失败后,死于 1005 年。没有说明这些突厥人的统治在东方达到多远的史料。998 年喀什噶尔汗阿尔斯兰汗阿里在一次圣战中"殉难"。他死去的地方说是在(南疆)英吉沙的东北。这一点似乎表明当时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势力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当去喀什东部不远。

在 10 和 12 世纪中,(西部)天山主脉两边的地方统一在所谓黑汗王朝或伊列克[5]汗的统治下,但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统治者之下。像所有游牧或半游牧的国家一样,黑汗王朝分成为若干封邑,而后者很快就变成为独立的王国。它们的疆界时常变更并经常发生内战。王朝首领最高权力的所有标志(即便是名义上的)早在 11 世纪时已不存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为独立的统治者所统治,都拥有同样的称号。西部中亚的统治者在征服后的初期拥有

伊列克的称号。这显然是次于汗的称号。第一个伊列克——全河中地的统治者住在乌兹干特(费尔干的一个边城),并葬于该地。乌兹干特在萨曼朝时尚是个面积不大的城市(等于奥什[6]的三分之一)。当突厥征服者已牢固确立其权力后,他们把驻地迁到撒马尔罕——该地区的中心城市,在那里他们于11世纪采用了汗的称号。乌兹干特作为费尔干统治者的驻扎地一直继续到13世纪蒙古人建成安集延城时为止(现在乌兹干特是安集延区的一个村子)。保留至今属于乌兹干特这一繁荣时期的建筑物,有63英尺高的伊斯兰教尖塔(minaret)和附近的马扎尔(即陵墓)。这里按照传说葬有第一位伊列克和塞尔柱苏丹桑加尔(死于1157年),虽然事实上后者的坟墓是在谋尔夫。陵墓上的铭文表明它建于较后的12世纪末,但乌兹干特建筑物的意义显然在于它是中亚现存不多的前蒙古时期的古物这点上。费尔干统治者几乎不受撒马尔罕的统辖,虽然撒马尔罕诸汗宣称他们对全河中地拥有统治权,并在12世纪末称自己为"苏丹中的苏丹"。布哈拉(前萨曼朝的首府)在黑汗王朝时已不再是汗的驻地,虽然一些汗在那里建有建筑物,其中最著名的是阿尔斯兰汗建于1127年的伊斯兰教尖塔(170英尺高)。

突厥人的征服和征服者实行的封邑制度并没有中断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萨曼朝统治下可以看到的历史进程在黑汗王朝时仍在继续发展。萨曼朝的覆灭在一个短时期里提高了地主贵族(狄康)的地位。这一点可由伊莱克(Ilag)地方的狄康铸造钱币一事看出,而在萨曼朝时并不享有这种权力。另外也可以由关于黑汗王朝征战记事中看到,那里提到河中地狄康的军队。但不久狄康连在萨曼朝时代他们所保有的地位也丧失了。在关于12和13

世纪政治事件的记载中，已不再提到狄康。在蒙古入侵中亚的时候也未见提到他们的骑兵队。大概是狄康们参与了王室和军事贵族（其主要代表为突厥近卫军的首领）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黑汗王朝时期变得比以前更加激烈。汗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得到普通群众的拥护，而贵族则受到宗教阶层的支持。作为一个典型事件可以援引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声誉的撒马尔罕阿赫买德，1095年按宗教判决被突厥近卫军首领废黜和处死来证明。城市生活和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成了狄康阶层的解体[7]。11 世纪，在黑汗王朝时期完成了从征服时期就已开始的城市生活中心从古老的内城移到市集所在地的外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前的“内城”变为“外城”，而“外城”变为“内城”。城市开始成为现在的样子，主要的街道从城门通向中心，商铺沿街道和坐落在街道交叉口的市场（chārsū）中心的圆顶屋两旁排列，同样的过程也可以在不属于黑汗王朝的中亚其他城市（如谋尔夫）见到。布哈拉形成了特殊的贵族城邦共和国，为首的是萨得尔，即代表商人阶级利益的“布尔汗（Burhān）家族”的宗教高官。13 世纪初，萨得尔的权力被消灭，但不是由汗，而是由一手工业者领导的群众运动所消灭。

哈孜那朝[8]和塞尔柱人

外部的敌人利用了黑汗王朝内部的斗争。为此，黑汗王朝早在 11 世纪已失去其独立性，虽其存在尚持续到 13 世纪初。在萨曼朝覆灭后，其阿姆河以南的地方落入另一王朝的手中。这个王朝以前隶属于萨曼王朝，并因其首府哈孜那（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而得名。哈孜那王朝的主要代表苏丹马赫穆德（998—1030

年)在阿姆河以南地区成功地击退了黑汗王朝的进攻。他把巴尔赫置于他的权力下,并在某种程度上征服了靠近巴尔赫的今布哈拉东部地区。同样,他也征服了萨曼朝以前的属国——花剌子模。

马赫穆德的后继者被另一个以前住在锡尔河下游的突厥族——土库曼人从波斯和北阿富汗逐出。早在10世纪,土库曼人就开始往南移动,并在11世纪渡过阿姆河。土库曼人的文明程度比萨曼朝中亚的征服者要低。在皈依伊斯兰教以前,他们没有文字,并且没有汗室来领导其征服活动。先到波斯的为分散的游牧群,之后才为由伯克们(土库曼首领塞尔柱的后裔)率领的队伍。只是在波斯时,他们才采用了王的称号。称为"沙"(Shah)和"苏丹"(Sultan)。后一称号(最初这一用语不是指个别统治者,而只是泛指国家权力)由他们最早用于正式称号和钱币的铭文中。这一点又为哈孜那朝和黑汗朝所模仿。这些"塞尔柱突厥人"逐渐把他们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伊斯兰亚洲。当其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确立其权力后,就转向东方,征服了花剌子模和早先曾是他们故乡的沿锡尔河下游的地方,并臣属了包括喀什噶尔汗在内的黑汗王朝。

是他们创造了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高世俗统治者的伊斯兰苏丹这一概念。后者与伊斯兰教徒的宗教首领哈里发同时并存,而哈里发的宗教权威是服务于苏丹权力的。

不管其波斯大臣,尤其是著名的尼扎木·阿勒木勒克(1092年被杀)如何努力,塞尔柱苏丹帝国并没能达到行政上的完全统一。苏丹的亲属领有由他们管理、世袭的广大地区,并且常常不服从王朝首脑的权力。"苏丹"称号有时同时为数人拥有。苏丹桑加尔(1118—1157年)当其兄弟巴尔克雅鲁克和穆罕玛德在世时,统治呼拉珊,并驻在东方,大多是在谋尔夫。这种情况在他成为王

朝的首领后也仍然如此。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其他王子也采用苏丹的称号。桑加尔对这些地区的统治权纯粹是名义上的,虽然他曾成功地镇压了公开叛乱的企图。当其侄子苏丹麦斯武德(1133—1152 年)统治巴格达和西部波斯时,桑加尔没有到过列依(德黑兰以东)以西的地方。最后,"伊斯兰苏丹"不得不把对黑汗王朝领地的统治权让给来自远东的新的征服者。自从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以来,这是该地区第一次被置于非伊斯兰教徒民族的统治之下。

西 辽

从 10 世纪开始当唐朝灭亡后,中国北部各省又转入采用中国皇帝称号的外族诸朝统治下。第一个这样的王朝是契丹(Khitay)族的辽代(916—1125 年)。契丹通常认为属通古斯族,但也有认为属蒙古族的。辽代最初的统治者领有满洲、蒙古和华北,在这里他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用契丹一词来指称中国,现在仍留存在蒙古人和俄罗斯人中[9]。伊斯兰教徒和西欧人把 Qitā(Khitā)或 Qatā(Khata)只用来指称中国北部,而对直到蒙古征服时为止仍在汉族王朝统治下的南部中国则保留中国的古名"秦"(Chīn,阿拉伯语为 Sīn)。契丹的统治对蒙古地方居民的构成上影响颇大(突厥成分被从那里排挤出后为蒙古人所占有),并且也影响了游牧民的生活状况。后一点可从用中国的拜南(方向)代替以前的拜东(方向)和游牧民的居处也相应改为南向的事实中看到。

早在 11 世纪,中亚的伊斯兰教徒就已不得不防卫来自东方的非伊斯兰教徒民族的袭击。在这些民族中也曾提到过契丹。较为

重要的契丹西迁活动发生在1125年女真灭辽以后。女真也发源于满洲。契丹的一部分,即伊斯兰教徒称为黑契丹的,在前王室一个成员[10]的统率下离开了他们的国家,迁移到中亚的西部。在一封苏丹桑加尔1133年7月给哈里发宰相的信中,提到喀什噶尔汗在距喀什噶尔东几天路程的地方取得了对"卡菲尔"(异教徒)的胜利,这些异教徒在几年以前来自"中亚的最远处"。异教徒的首领被俘获。

这是指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尔斯兰汗阿赫买德对西辽军的胜利。历史家依宾·阿勒阿提尔记载这次战事发生在1198年(它大概发生在稍后的几年)。这样,西辽经过新疆南部的进军归于失败。获得成功的是他们沿北路经天山以北地区的移动。在离开祖国后,西辽先在塔尔巴哈台站稳了脚跟。在今塔城附近他们建立了叶密里城。当时他们的人数约为4万帐户。第一个和他们打交道的伊斯兰教徒统治者是请其援助来反对敌对突厥首领的巴拉萨衮汗。西辽击败了汗的敌手,但同时也攫取了巴拉萨衮城并褫夺了当地统治者的称号。从那时以后,楚河河谷就成为拥有菊尔汗称号西辽统治者的驻扎地。依伊斯兰作者的说法,菊尔汗有"汗中汗"之意。中国史家把菊尔汗列在中国皇帝之中,并以中国年号来计其"统治年代",称其为"西辽"。这似乎是历史上异族王朝被逐出中国后仍保有中国朝号的惟一例子。14世纪当元朝(中国对蒙古朝代的正式称呼)被逐出中国时,就认为它已灭亡,虽然其末代皇帝的直系后裔在蒙古仍继续统治过一个时期。

菊尔汗从楚河畔逐渐扩展其统治于新疆和西部中亚的黑汗王朝。没有关于他们与喀什噶尔汗作战的记载。但从阿尔斯兰汗阿赫买德的儿子依不拉音汗被称为"殉难者"(shahīd)这点来看,他

可能死在与西辽的战事中。东部天山的非伊斯兰地区也归属于菊尔汗。早在1137年,西辽于霍占德附近击败了撒马尔罕的汗马合木德,但他们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利用这次机会来征服河中地。1141年,菊尔汗像以前在巴拉萨衮一样干涉了河中地的内讧。但这次他袒护了突厥军事贵族,而马合木德汗则请求其叔父苏丹桑加尔援助。1141年9月9日,苏丹的军队败于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宛草原。据说伊斯兰教徒这次死了三万人。撒马尔罕汗与苏丹一起逃到了呼拉珊。代替他的是其兄弟,他成了菊尔汗的附属。

最强大的伊斯兰教徒苏丹在与非伊斯兰教徒的作战中败北的消息,传到了正在叙利亚和北美索不达米亚与伊斯兰教徒作战的十字军那里。于是产生了关于基督教"约翰大主教"的传说。当时人们希望从东方进攻伊斯兰教徒的基督教王到达耶路撒冷,并帮助其同教者来粉碎基督教国的敌人。1145年传出了关于他已抵达底格里斯的消息。事实上西辽并不想做大规模的征服。它已满足于包括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在内的邻近伊斯兰地区的归附。甚至阿姆河右岸上的忒耳迷城仍在塞尔柱苏丹的统治下。

西辽与通常类型的游牧帝国有很大不同。当其尚保有游牧习惯时,西辽比其他游牧征服者早已接受了更多的中国文化。在其国内实行了中国"按户"征税的制度,每户纳税一狄纳尔(dinar,约十先令)。此外,据说第一个菊尔汗也没有分给任何人封邑,他不让任何人统率百人以上的军队,即使后来,在菊尔汗国中,也见不到封邑制度的任何表现,但也没有行政上的统一,以前各处的地方王朝作为菊尔汗的附属仍继续存在。同一时间里可看到三种形式的隶属关系(这种关系我们也在蒙古统治不同时期的俄国看到)。在许多地方有菊尔汗的常驻代表与地方统治者同时存在。在一些

地区(如花剌子模)菊尔汗征税官只是定期地来征收赋税。最后,13 世纪初,像后来莫斯科大公送贡赋到金帐汗国去一样,布哈拉的萨狄尔(宗教首领)亲自送贡赋到菊尔汗驻地。12 世纪中期,在布哈拉驻有菊尔汗的代表,他被训令在其活动中,要听取萨狄尔的意见。

比起苏丹桑加尔时代来,西辽领地的境界在 12 世纪下半期有某些扩大,当时他们把忒耳迷和巴尔赫也包括在其版图内。但一般说来,西辽没有做进一步征服的打算,并且甚至没有采取措施来防止其伊斯兰附属地和邻人间战争的复发[11],后者后来举起了圣战的旗帜。1157 年苏丹桑加尔死后,塞尔柱王朝的权力在东方趋于衰微。这以后,在中亚曾有几个王朝先后要成为"伊斯兰苏丹",来把其同教者从异教徒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开头是西部波斯的塞尔柱苏丹们,其后是崛起于阿富汗的古尔王朝,最后是作为世袭总督服务于塞尔柱人的花剌子模沙。

花剌子模沙

12 世纪末和 13 世纪初是花剌子模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当时该地区已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核心,并且其统治者可望取得伊斯兰亚洲霸主的地位。花剌子模沙塔克什[12](1172—1200 年)战败了他的伊斯兰教徒敌手。西部波斯最后的塞尔柱苏丹托格鲁勒在 1194 年对塔克什的一战中死去。像其先人一样,塔克什也进行过几次反对西辽的圣战,但无多大成绩。甚至在其子和后继人木哈马特(1200—1220 年)统治的初期,在他与古尔王朝进行斗争时,仍继续向西辽纳贡并接受其援助。但后来他宣布自己为

从异教徒统治下解放伊斯兰教徒的解放者,并在1210年在塔拉斯河畔击败了西辽军队。这次胜利虽不是决定性的,但它给苏丹带来了声誉。他采用了“亚历山大第二”和“苏丹桑加尔”的称号。他并计划征服中国,缔造一个世界帝国。但这一野心并未能实现,一则因为外部敌人的敌对,二则因为在其伊斯兰教徒臣民中也得不到响应。那时候,帝国的观念在伊斯兰世界并不流行。在那里尚未见有后来在西欧历史上所见到的政治势力增长和商业文化之间的那种联系。在伊斯兰世界,政治上的不统一并没有削弱各个地区之间文化上的联系,已不存在像以前巴格达那样的统一的政治、文化中心。但一些敌对首府的存在也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好处。各地方王侯竞相拉拢文化和科学人士来给自己的宫廷增光,外部的世界不再是伊斯兰军事远征的对象。但伊斯兰教徒商人和文化人士在没有政府任何协助的情况下深入到比伊斯兰军队所到更远的地方。12世纪时可以同时看到有伊斯兰军界的代表在南俄的波洛维茨(耿按:此为古代俄罗斯人对克普恰克突厥人的称呼)汗和中国北部的满洲统治者那里任职。西辽在征服中亚伊斯兰教徒后并没有接受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文化人士在其统治者宫廷中受到优待。一个伊斯兰教徒商人马合木特拜曾是末代菊尔汗的大臣。伊斯兰教徒商人到达过东部蒙古,甚至蒙古与中国间的商业贸易也转入到他们的手中。贸易是用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的,并似未受到河中地货币制度混乱情况的影响。11和13世纪之间河中地银币狄尔哈木是用铜铸成的,也即实行某种铜币制。在水利灌溉方面,伊斯兰教徒专家的声誉使得蒙古史诗创造了萨尔塔克台(Sartaqtay)——神奇堤坝的建造者这一形象[13]。

苏丹木哈马特并没有得到为他所解放的中亚居民的好感。在

布哈拉他祖护贵族。马拉克桑加尔,人民运动的领导者被从布哈拉谪迁到花剌子模。贵族的首脑萨德尔虽获准返回布哈拉,但以后也被废黜和送到花剌子模。木哈马特对黑汗王朝的的关系更要坏些。撒马尔罕的花剌子模守备队引起了这样的不满,以致于"苏丹之苏丹"奥斯曼在人民的拥护下起来反对其解放者,并恢复了与西辽的关系。

木哈马特以血腥手段镇压了他从前"解放的"人民。在西辽统治下仍然存在的黑汗王朝灭亡了。塔拉斯战役后,七河巴拉萨衮城的居民曾经盼望解放者的到来,并曾关闭城门不让西辽军队入内,但木哈马特使他们的希望落空,城市又被西辽攻下。差不多与此同时,作为13世纪初在蒙古发生的战事的继续,"鞑靼"游牧民的部队出现在七河和新疆南部一带,结果国家统一在以成吉思汗称号为人所熟知的铁木真统治之下。

注 释

① 详见《七河史》中黑汗王朝一节。

② 巴氏这一说法并不正确,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以北的库车、吐鲁番、哈密一带从公元8、9世纪到14、15世纪左右一直主要是使用回鹘文。——汉译者

③ 作者说他的作品是用突厥语写成的第一部书,而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则有许多这样的书。

④ 即维也纳、开罗和费尔抄本(前者为回鹘文抄本,后两个为阿拉伯字母抄本)。这三个抄本现已影印出版(伊斯坦布尔,1942—1943年)。——英译者

⑤ 伊列克(Ilek)当来自古代突厥语Ilig"王"。——汉译者

⑥ 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南部城市。——汉译者

⑦ 此句依俄文原文改正。英译本似有误。——汉译者

⑧ 或译作哥疾宁朝。——汉译者

⑨ 俄文的中国为 Kitay,比较古英语的 Cathay。——英译者

⑩ 指耶律大石。——汉译者

⑪ 原文如北。这里显然指黑汗王朝(西辽的属国)与塞尔柱和花剌子模沙之间的战争。——俄编者

⑫ 可能是土克什(Tükish?)。——英译者

⑬ 蒙古语中为“伊兰人”、“伊斯兰文化代表”之意。

四

蒙古的征服

成吉思汗帝国的形成不仅是一些民族和部落间政治斗争的产物，而且也是草原贵族和平民分子之间阶级斗争的产物。成吉思汗代表贵族，而普通人民群众则统一在他的敌手扎木合的领导下[1]。后者采用了菊尔汗的称号，这可能是模仿西辽所致。扎木合挑动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来反对成吉思汗，但成吉思汗及其拥护者在所有这些斗争中都取得了胜利。按照蒙古人的传说，在成吉思汗取得对蔑尔乞惕人（居住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胜利后（1204—1205 年冬），扎木合成为了阶下囚并被处死。另一方面，伊斯兰历史家朱外尼提到一个强有力的菊尔汗英雄[2]，他从成吉思汗那里逃到伊斯兰教徒那里，并在 1220 年蒙古人攻下布哈拉后被杀死。这一点可能表明扎木合在蒙古失败后曾避难于中亚。

蒙古的事件导致“鞑靼人”进入中亚草原。“鞑靼”一词是当时对蒙古人的通称。之后这一名称为中国人、伊斯兰教徒和欧洲人用来指称蒙古征服者。直到 1208 年当蔑尔乞惕和居住在西蒙古的乃蛮被最后战败时，蒙古地区的斗争方才结束。这两个民族先南迁到回鹘之地，那里有一古代商路通向蒙古。此外乃蛮人曾受到回鹘文化的影响。在乃蛮人那里成吉思汗接触了回鹘文字，

并为其采用。

1209年,回鹘拥有亦都护称号的首领[3]起来反对亡命者并打败了他们。回鹘亦都护并脱离了西辽的统治(它以前曾是西辽的附属),归附了成吉思汗。这以后,乃蛮首领屈出律来到了菊尔汗的直属领地内,大概即七河的南部地区。蔑尔乞惕人走更北的一条道路。稍后于1216年被成吉思汗军队消灭在现在的吐尔盖依[4]地区。1211年蒙古军出现在七河北部一事可能与追击蔑尔乞惕人有关。该地区的伊斯兰教徒统治者阿尔斯兰汗哈剌鲁也仿效回鹘亦都护,脱离西辽归附成吉思汗。蒙古人在西方进一步的行动为成吉思汗和统治中国北部金朝间1211年发生的战事推迟了几年。这给乃蛮屈出律在中亚建立的王国以几年喘息的机会。

屈出律

根据某些记载,屈出律先是和菊尔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者把他认作儿子。另一些史料说他曾同花剌子模沙苏丹木哈马特及伊斯兰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结盟。不过他后来的行动表明,他和菊尔汗和伊斯兰教徒的关系破裂了。菊尔汗成了他的俘虏并实际上被罢黜,虽然一直到死时为止仍继续享有最高统治者的表面荣誉,而屈出律则以他的名义执政。

和苏丹木哈马特的冲突显然与瓜分西辽帝国有关。在锡尔河与新疆南部地区发生了敌对行动。十字军又一次听到从东方攻击伊斯兰教徒的消息。这一次伊斯兰教徒的敌人确实为基督徒。据伊斯兰史料,屈出律及大多数乃蛮人为基督教徒,但又说在西辽帝国屈出律曾尊行偶像崇拜。这大概是指佛教或者中国的国教。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关于约翰大主教的传说要转来指屈出律了。十字军的报道中也包含有完全可信(?)的叙述，说是通过景教的居间介绍，伊斯兰教首领——巴格达哈里发纳赛尔本人曾亲自寻求同屈出律的联盟，这种联盟的基础是他们都反对“伊斯兰苏丹”。后者像其先人一样曾要求哈里发把所有世俗权力(甚至在巴格达那里)让给他。

甚至在其自己的领地内，屈出律也不得不和伊斯兰教徒进行斗争。当他仍认为伊斯兰教徒是其同盟者时，屈出律曾释放了喀什噶尔汗，并把他当作自己的友人。后者显然是当伊斯兰教徒作乱时被菊尔汗囚禁起来的。当喀什噶尔汗抵达喀什噶尔时，被当地贵族所杀。在四年中屈出律为了给他死去的朋友报仇，曾使喀什噶尔地区田园荒芜，并最后迫使居民臣服。

那时以后他就成为伊斯兰教徒的公开敌人。从伊斯兰教传入中亚以来，这是该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受到迫害。伊斯兰教徒被禁止行公开的宗教仪式，他们被强迫接受或者成为基督教徒或偶像教徒，或者至少要改穿中国服装。并用在某一些人家里驻军的办法进行惩罚。这是一种类似法国路易十四对新教徒进行的“宗教迫害”。史料上曾特别提到过一次伊斯兰教僧侣被处死的事件：和阗的舍依赫阿拉阿丁·摩诃末被钉死在他自己建立的伊斯兰教神学校的门上。

当末代菊尔汗统治的混乱时期，一个新的伊斯兰公国崛起在当时伊斯兰世界的最东北端。它为布扎尔(以前为盗寇首领)建立在现在的伊宁地区，其主要城市为阿里马(位于现伊宁市的西北)。布扎尔也是反对屈出律的。他像喀什噶尔汗一样也宣布归附成吉思汗。屈出律在一次行猎中俘获并杀死了布扎尔。但由布

扎尔的妻子防守的阿里马城在成吉思汗所派援军到达以前，曾成功地进行了抵抗。

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苏丹木哈马特不能实行他的任何野心计划，屈出律也谈不到对苏丹的进攻。木哈马特被迫把黑汗王朝以前的一些领地割让给屈出律，如费尔干及其以北、以东地区，包括沿乞尔乞克河和阿里斯河的农耕地带在内。伊斯兰史家曾谈到苏丹木哈马特破坏了这些地区，以免它们给屈出律带来什么好处。但1221年到过这些地区的长春真人在谈到其所经过的城市时，并未谈到任何破坏的痕迹。木哈马特领地的边界则为沿锡尔河两岸，从霍占德到河口一带。其领地也包括不论是萨曼朝或黑汗王朝都未曾统治过的萨乌朗以下的锡尔河流域以及以色格那克（现在苏那克—库尔干）为中心的地区，那里在12世纪下半期尚属于非伊斯兰教徒的克普恰克人所有。沿锡尔河上、下游一带地区，早在11世纪初伊斯兰教已占优势。苏丹木哈马特曾数次到达过锡尔河的下游一带，并从那里北征。在一次这种进军中，1216年夏天在吐尔盖地区，他的军队曾与追击蔑尔乞惕的术赤（成吉思汗的长子）的军队遭遇过，但在与苏丹打了一仗后，蒙古人在夜间就撤退了。

成吉思汗与花剌子模沙

双方似乎都认为这次遭遇战是出于偶然误会，并未因此妨害两国间以前已经开始的和平关系。1215年成吉思汗在大都（今北京）接见了苏丹的使节（这年蒙古人占领了大都），或者这次接见是在成吉思汗返回蒙古的1216年初。史料只提到这次出使的一

个目的:曾企图征服中国的苏丹现在知道他已被人抢先,使节的任务是核实这一消息。使节或许还负有其他政治和经济的任务。苏丹可能希望和成吉思汗结盟反对屈出律。当时由于与屈出律的敌对状态,通常经过新疆南部通向中国内地的商路已不通。而成吉思汗已达七河北部的征服活动使得建立一条新商路成为可能。实际上一个伴同使节或紧随其后的商队已被派到成吉思汗那里。

我们不知道使节和商队所走的路线,也不知道成吉思汗在何处接见了商队。从成吉思汗1219年征战的路线来推想,我们可以认为使节和商队是穿过七河的北部,并从那里到额尔齐斯河的。这也应是1218年春到达苏丹那里的蒙古使节和商队所走的路线,这次应认为是成吉思汗对苏丹主动行为的答礼。

这次使节由服务于成吉思汗的三个伊斯兰教徒率领。使节们的任务是向苏丹通好并确保商业关系。苏丹的回书是和善的,虽然他对成吉思汗把他称为"儿子"——即多少是个属国——这点有所不满。在这次使节回去不久,一个由四百五十个商人(全是伊斯兰教徒)组成的商队带着五百头满载商品的骆驼到达讹答剌城[5]。这些商人被当作谍探扣留起来并杀掉,其商货也被没收。只有一个牵骆驼的人逃回到了蒙古,史料对这次事件发生的情况,以及苏丹和讹答剌总督各自所负的责任问题互相矛盾。但是不论怎样,苏丹应对他下令杀死一个或所有三个(据另一史料)成吉思汗派来要求赔偿和交出凶手的使节(这次使节不是伊斯兰教徒)承担完全责任。把这些事实合起来看,说明蒙古对中亚的远征是直接由苏丹的行为挑起的。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下面一个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的说法,即是哈里发召请蒙古人来反对苏丹的。比较可信的是前面已提到的关于哈里发与屈出律——苏丹的近邻和成吉

思汗的敌人——的关系。

1218年,显然是在讹答剌事件后,成吉思汗派其大将哲别诺颜征屈出律。尽管屈出律敌视伊斯兰教,另一伊斯兰教的敌人回鹘亦都护也率领一支三百人的小队伍参加了这次远征。另一方面,蒙古将军宣称他是宗教自由的保护者,他允许每个人可以信仰其祖先的宗教。因此,实际上这次对七河南部、费尔干和新疆南部的占领是兵不血刃的。屈出律的伊斯兰教徒臣民和附属,其中包括费尔干的统治者(巴拉萨衮出身)投到蒙古人方面去了,居民杀死了驻在他们家中的屈出律军的人。朱外尼后来听喀什噶尔人说,蒙古人的到来对他们来说是神的恩赐。屈出律从喀什噶尔逃到萨里科勒[6]后被捕杀。与屈出律统治下的情况相反,西辽(可能也有乃蛮人)的残余人员混入伊斯兰教徒中,并改穿伊斯兰教徒服装。把伊斯兰教徒从异教徒压迫下解救出来的任务由一个异教徒将军成功地完成了。而这一工作对伊斯兰苏丹来说曾是力不胜任的。

这些都使得苏丹木哈马特很难以防止异教徒入侵为借口来号召军民。早些时候,苏丹曾因其对哈里发的敌对行为招致僧侣阶层的不满。1217年他派去征讨巴格达的军队在库尔德斯坦山中被消灭。这一来是由于大雪,二来是由于遭到库尔德人的袭击。这次失败被说成是对亵渎神灵的惩罚。另外,苏丹也和他母亲吐尔干可敦[7]周围的突厥军贵族不和。她当时统有花剌子模。1216年苏丹曾下令处死吐尔干可敦的亲信、著名的巴格达人舍依赫马吉德·阿丁。后者是舍依赫纳吉姆阿丁(今日尚存在的库卜拉维托钵派的创始人)的学生。最后,伊斯兰教徒商人在讹答剌的被杀事件(成吉思汗把自己说成是他们的复仇人)消除了伊斯兰苏丹和伊斯兰世界商业代表之间最后谅解的可能性。把13世纪这

次事件和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做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与现代欧洲政治中所看到的相反,伊斯兰中世纪历史表明,当时伊斯兰商业贸易的成功和商人所属国家的政治势力之间的联系是多么薄弱。

蒙古对中亚的征服

伊斯兰教徒商人伴同成吉思汗出征苏丹并成为他信任的顾问。成吉思汗对地理情况的熟悉(这一点可从其征战计划中看到)也应归功于这些商人。成吉思汗在额尔齐斯河畔度过了1219年的夏天。秋天在七河北部有两个伊斯兰教徒统治者,即阿尔斯兰汗哈剌鲁和阿里马的苏格纳克特勤率军加入了他的行列。回鹘亦都护巴尔术也率军到达。这以前成吉思汗曾通知苏丹说,他承认其为西方的统治者,而他自己则为东方的统治者。他对敌手军力的充分估计也表现在对军事准备上。这一次也像1211年对中国的战事一样,成吉思汗和其诸子都参加了。

苏丹知道敌人已迫近,但无力采取有效措施迎战。由于和其生母的关系不好,王国缺乏统一。当时甚至连官僚中央集权制也已不存在。作为官僚机构首脑的大臣一职也被由六人组成的会议所代替。人民从这种改革中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认为,满足一个人的要求总要比六个人的要容易些。为了给战争提供经费,提前征收了三年的捐税。但这笔款子并没有按其用项使用。苏丹原决定围着撒马尔罕及其外城筑一长城。但这一计划也未来得及实现。苏丹及其王朝在人民群众和军队中没有丝毫威信,这妨碍了组织任何坚强的防御。苏丹知道,要是他把其庞大的军事力量

集中在某个地方，例如沿锡尔河一线的话，一旦当这支军队打败外来的入侵者，就会马上掉转枪口来打他。结果，军队被分散在不同城市和地区。这一点说明，为什么蒙古人在征服中亚时，并没有像以前的游牧民入侵一样要在开阔地带打仗。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攻陷城市，而这一点甚至用少量部队也可成功解决。这样，从讹答剌派到锡尔河上游的军力不过五千人。

除这支军队外，1219 年末当成吉思汗抵达讹答剌时，他从其主力军中又分出两支队伍：一支在其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的率领下留下围攻讹答剌，另一支在其长子术赤的率领下沿锡尔河而下。1220 年 4 月左右，这两支部队都完成了他们的任务。成吉思汗同其主力军从讹答剌越过克兹尔苦木沙漠到达奴尔阿塔，并从那里向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军。1220 年 2 月攻占布哈拉。这表明，越过沙漠和一年的季节有关。没有根据认为，这次穿过沙漠的进军表明从那时以来该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发生了变化。成吉思汗在 1220 年 3 月抵达撒马尔罕，在这里和他两个儿子会合，他们当时已占领讹答剌。撒马尔罕陷落后，一部分军队被派去攻打霍占德，在那里蒙古人遇到了该地守将铁木耳马立克的顽强抵抗。二万五百[8]蒙古兵和五万俘虏参加了围城战。这个数目是说明蒙古人喜欢采用的作战方法的典型例子。当围城时，他们把从当地虏来的农民赶到前面充当挡箭牌，并强迫他们为蒙古军扫清道路。有时把这些俘虏编成军列，让他们打着旗子，使被围城的人相信蒙古军人数众多。铁木耳马立克被迫放弃了城市，坐船沿锡尔河而下，从已占领河岸的蒙古军中杀出一条路后，驰向花剌子模。

成吉思汗在卡尔希过夏后，秋天占领忒耳迷。1221 年春渡过阿姆河占领巴尔赫。直到 1221 年 10 月他没再过河。1221 年，术

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的军队攻下花剌子模。同年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占领并破坏了呼拉珊诸城,其中包括谋尔夫。一支分遣队于1223年渡过阿姆河追击苏丹木哈马特,深入到更西的地方。1223年他们在迦勒迦打败了俄罗斯人,并在里海北越过草原回到成吉思汗那里。这支军队中的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伏尔加河不里阿耳人的一次伏击战中。

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教徒曾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有的并暂时击退了蒙古人。1220年铁木耳马立克从花剌子模越过咸海东岸的草原进行了一次袭击,并把术赤部队从锡尔河口附近的沙尔坎特(现在占坎特遗址)城逐出。1222年他并从曾暂时摆脱了蒙古人统治的谋尔夫成功地进行过一次对布哈拉的进击。直到1223年,其抵抗才被最终消灭。那时成吉思汗同其诸子在现在锡尔河省东部的库兰巴西草原,正在缓缓班师回乡途中。

苏丹木哈马特及王朝的其他成员在所有这些事件中的作用微不足道。1220年初,苏丹同其军队是在卡里夫(该城直到18世纪是位于阿姆河的左岸,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位于右岸),并显然企图防守阿姆河一线。但撒马尔罕陷落后,他甚至在蒙古人未到以前就已离开阿姆河岸。在无目的地流浪波斯后,他躲在里海东南角的一个岛上,并于同年(1220年)死在那里。儿子逃走的消息迫使吐尔干可敦离开了花剌子模,虽然成吉思汗(他知道他们母子不和)曾试图争取她并对她保证说,他只不过为讹答剌被杀商人向苏丹报仇,并不打算触犯她的领地。在离开花剌子模后,吐尔干可敦同所有随员退守马赞达兰的两个城堡中。这两个城堡于1220年夏被攻占。王朝的男性成员被处死。女王和公主们被俘,并于战事结束后带去蒙古。苏丹木哈马特的三个成年儿子同他一起住

在岛上。在他死后,他们回到了花剌子模。长子扎兰丁宣布为苏丹,但军心的不稳迫使他稍后和其兄弟都离开那个地区。王朝成员的离去结束了所有内讧。吐尔干可敦的一个亲戚被宣布为苏丹。首府兀龙格赤只是在经过顽强抵抗后才为蒙古人攻占。为此守城军和所有居民都被屠杀,只有匠人和年青妇女及小孩例外,他们被俘虏而去。1221 年间,苏丹扎兰丁在阿富汗与蒙古人打了一仗,但只是在印度河畔他才决定和成吉思汗的主力进行决战(11 月 24 日)。他同残余败军设法逃到了印度。稍后他又返回,并在波斯和外高加索(到 1231 年)起过一些政治作用,但他从没有再在中亚和花剌子模出现过。在蒙古人的记忆中扎兰丁胜过于他的父亲。他们认为苏丹干的每一件事,甚至连讹答剌商队被杀一事都与扎兰丁有关。

长春真人的旅行

成吉思汗召请到西方去的中国长春真人是蒙古入侵不久后中亚情况的目击者。长春真人在撒马尔罕度过了 1221 年的冬天,并在 1222 年春天去阿富汗谒见成吉思汗。夏天他又在撒马尔罕度过一段时间,秋天再次去阿富汗,并于同年 10 月同成吉思汗一起渡过阿姆河。藉为他们服务的工匠的帮助,蒙古人修复了道路。当时这些道路比现在还要好些。在赛里木湖附近塔尔奇隘道[9]修有四十八座木桥。那里的道路要多次跨过河流。长春经过一座木桥渡过楚河,经过一座石桥渡过塔拉斯河。阿姆河上有一座浮桥,桥梁的修建是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功劳。中亚大部分被划作他的封地,甚至当其父在世时他在这一地区已行有某种程度的最高

权力。察合台斡耳朵(Ordu)设在伊犁地区,在伊犁河的南岸。伊犁的重要性说明,为什么阿里马除当地王外尚同时驻有蒙古总督。伊斯兰教城市中只有撒马尔罕不是由伊斯兰教徒,而是由一西辽出身的总督治理。对撒马尔罕伊斯兰教居民采取了某些类似屈出律的措施,虽然并不是基于宗教的原因。伊斯兰教徒只能和西辽人、中国人和唐古特人共同占有不动产。许多中国匠人似乎是和蒙古人一起来到撒马尔罕的。该城仍保有其伊斯兰教的性质。礼拜五,男女忙着去礼拜寺,当时妇女尚可以参加公开的宗教仪式。不去参加的人要受惩罚,这说明低级军警仍操在伊斯兰教徒手中,有人告诉长春说,蒙古入侵前该城有十万多户人家,蒙古入侵后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生活仍像过去一样,市集上货物很多。长春认为那里的果园甚至比中国的还要好,但有许多饥饿的人。当回到撒马尔罕时,他曾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家破人亡的农民集结为盗,活动在四乡,从城中常可望到火光四起。

注 释

① 这个提法有问题。——英译者

② 另一写法为 Gök-Khan。——英译者

③ 指巴尔术阿尔忒的斤。——汉译者

④ 咸海东部。

⑤ 位于锡尔河东岸木哈马特境内的边城。

⑥ 据朱外尼,是逃到巴达克尚。——英译者

⑦ 可敦,古代突厥语"皇后"之意。——汉译者

⑧ 英译本为二万。——汉译者

⑨ 即现在去伊犁必经之路果子沟。——汉译者

五

成吉思汗后裔

长春真人的报告表明，军事行动结束后蒙古人马上就着手于被征服地区的恢复工作。那种说蒙古人不懂得文化以及如有可能他们将把所有耕地变为牧场的说法是与事实不符合的。蒙古统治者懂得他们从城市居民和土地占有者那里所能得到的税收要比游牧民的多些。同样明显的是，把农业区的管理交给蒙古人或游牧人就不能不在税收方面给国库带来损失。国库被看作是汗室的共同财产。氏族所有权的观念被从私有法的领域搬到国有法的领域。帝国属于整个家族所有。每一个王子和公主都对这种税收享有一份权利，并且帝国的管理是他们共同的事业，虽然管理的方法要依情况而有所变化。成吉思汗生前，他作为这个家族首脑的权威是为所有成员承认的，并且由他一人决定一切。在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1229—1241 年）时代，这种个人统治被一个由汗室各支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所代替。窝阔台既没有其父亲的天才，也没有他那样坚强的意志，但其个人的气质使他很适合作为这个王朝和帝国所需要的统一中心的角色。

一个以大汗名义行事的单一全国机构通行整个帝国，虽然在成吉思汗生前就已把各个封地分给了他的儿子们。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依据私有法的原则:当父亲在世时就分给长子应有的一份,幼子则继承父亲的原有个人财产。这样,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承继了蒙古本土及蒙古正规军的主力。封地的远近是和儿子们的年龄相适应的:随同帝国边疆的开拓,长子术赤的封地也越来越移向西方。成吉思汗和术赤都死于1227年。儿子略早于父亲。那时术赤的封地包括从额尔齐斯河到"蒙古马蹄所到的"最远边区。中亚农业区中,沿锡尔河下游地区和花剌子模北部及其首府也属术赤。在蒙古屠杀以后不久,古尔干吉或如蒙古人所说的兀龙格赤,在旧城附近的新址上重建了起来,并再次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察合台封地与术赤的封地在阿姆河[1]、锡尔河和七河方面接界。窝阔台的封地为包括塔尔巴哈台在内的西蒙古。虽然帝国辽阔,但三个儿子的斡耳朵都位于相距不远的地方。术赤的斡耳朵在额尔齐斯河,窝阔台的在塔城附近,而察合台的在伊犁。窝阔台被宣布为大汗后,他就离开其封地(窝阔台死后,其遗体仍运回到他原来的封地埋葬),住到鄂尔浑河上他父亲的原住地那里。这里,在哈拉和林城(其遗址位于今额尔德尼昭附近)在他和其后继人在位时,由伊斯兰教徒和中国建筑师在西欧和俄国工匠的参与下建筑了宫殿。看来由各不同文化代表所修建的该城(它们在不大一块地方在短时间内建成)[2]应给中亚等文化史的研究提供许多宝贵的材料。但1912年进行的初次发掘并没有满足这种愿望,之后再未进行过。

自然,在蒙古宫殿中伊斯兰文化的代表大多来自河中地各城市,当窝阔台在位时,河中地为一花剌子模人马合木德·牙剌洼赤统治,他是由大汗任命的,驻在霍占德。在牙剌洼赤统治时,1238年在布哈拉爆发了一次农民起义。当时布哈拉已从1220年的破

坏中恢复了起来。起义是反对蒙古人和当地贵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由于马合木德的干预才使该城免于残酷的报复。不清楚马哈木德和察合台的伊斯兰教徒大臣哈别失阿迷德之间的关系。后者据一些史料说是讹答剌人,而据另一些史料则说是卡尔迷纳人。他像马哈木德一样,出身于富商阶级,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察合台被认为是蒙古习惯法的坚决维护者和伊斯兰教的敌人,当然不会从狂热的伊斯兰教徒中挑选顾问。在赛福阿丁·巴哈尔则——一个有影响的布哈拉舍依赫——给哈别失阿迷德的信中,曾指责他对伊斯兰教保护不力。几个神职人员——尤素甫·萨卡吉和马尔噶朗人巴哈阿丁——的处死也被归罪于他。据说1260年他死后葬于他自己修建的哈那哈[3]中,这说明他也是个宗教建筑物的修建者。

1238年后不久,马合木德·牙剌洼赤因和察合台不和不得不离开河中地。窝阔台容忍了这次对他任命官员的冒犯,并接受了他兄弟请求原谅的信。马合木德后被任为大都总督并于1254年死在那里。尚在窝阔台在位时,马合木德的儿子马思忽惕别克就被委任为从维吾尔地区到花剌子模整个中亚农业区的总督。他担任此职直到1289年死时为止。尽管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许多动乱,他这一职位又为窝阔台的儿子贵由(1246—1248年)所确认。贵由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敌人。甚至在1251年事变后,当帝国的大权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的长子蒙哥(1251—1259年)手中时,马思忽惕别克仍担任原职。这时察合台和窝阔台两族因阴谋反对蒙哥(他这时已即位为大汗)而遭打击。这时察合台封地名义上由其孙媳斡尔吉纳[4]统治。帝国的权力实际由拖雷和术赤的后裔瓜分。拔都(术赤之子)和蒙哥势力范围的交接线在塔拉斯稍东的

地方。河中地由拔都治理,他死后由其弟别尔哥治理。别尔哥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受到伊斯兰教僧侣阶层的支持。斡尔吉纳也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有时甚至说她是伊斯兰教徒。马思忽惕别克作为农业区总督的权力被帝国的这两部分所承认。1251 年他在维吾尔地方,1255 年在撒马尔罕。在撒马尔罕他迎接了统领大军去征略前亚的蒙哥的兄弟旭烈兀。大约在这个时候,马思忽惕在布哈拉(显然是在内城的广场上)修建了一所巨大的以他名字命名的马思忽惕亚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他在喀什噶尔也建有马思忽惕亚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更引人注意的是蒙哥和旭烈兀信仰景教的母亲为在布哈拉修建另一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所捐的布施。这两所学校都各有近千名学生。中亚在蒙古入侵前似乎没有这样大的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布哈拉的马思忽惕亚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于 1273 年当该城为波斯蒙古人攻占时被破坏(详见下文),但稍后被修复,这因为它的修建者 1289 年可能葬在那里。

当察合台的孙子阿勒灰 13 世纪 60 年代利用拖雷诸子间的不和来恢复其家族在中亚的权力时,也得到了马思忽惕别克的支持。对伊斯兰教徒,尤其是对舍依赫们来说,遗憾的是别尔哥的总督们被从河中地诸城逐出。舍依赫赛福阿丁·巴哈尔则的儿子被杀,而哈别失阿迷德的儿子则归附了阿勒灰。阿勒灰从别尔哥手中夺到的最末一个城市讹答剌,当时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讹答剌的攻取曾得到马思忽惕别克财政方面的援助。1266 年继阿勒灰即位的是斡尔吉纳的伊斯兰教徒儿子木巴剌克沙。他的即位不是在伊犁的传统斡耳朵,而是在靠近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安哥兰。这一事实说明,当时中亚的蒙古人已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下一个汗八剌[5]也是个伊斯兰教徒,并任用过马思忽惕。但 1271

年他死时是按照异教徒仪式埋葬的。八剌不得不承认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最高统治权,后者建立了独立的中亚蒙古汗国。1269 年在塔拉斯召开了大会来讨论这个汗国的组织事宜。会上规定王子应远离农业区而住在山里或草原上。农业区的管理和王室税收的征集被委任给由国家任命的专门官员,海都这次又看上了马思忽惕别克。马思忽惕死后,其职位相继由其三个儿子继任。其中前两个当海都(死于 1301 年)在位时,第三个(住在喀什噶尔)是在海都的儿子和后继者察八儿在位时。

中亚蒙古的统治

成吉思汗帝国国家结构的主要特点在中亚要比其他被蒙古人征服的地区保持得久。13 世纪中期,帝国仍被看作一个整体。尽管实际上已分为两部分。当时甚至在拔都和别尔哥的领地内钱币仍一律以蒙哥汗的名字铸造。在蒙哥汗时代以前,蒙古汗的名字很少出现在钱币上。这种钱币大量出现可能由于这样的事实所致,即蒙古人这时已用货币税来代替窝阔台时流行的实物税。

作为 13 世纪 60 年代事件的结果,是蒙古汗成了中国的皇帝。并把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大都。与此同时组成了三个独立的蒙古国家:俄罗斯的金帐汗国、波斯的伊尔汗国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前两个不久建有某种行政上的统一,这一点可由带有当地汗名的钱币上看到。在中亚,蒙古汗在一个长时期内仍为一游牧首领,没有直接参加农业区的管理,也未创建任何行政机构,甚至也没有铸造钱币。除了由汗委任的农业区的最高长官外,在不同城市仍保有世袭的统治者(蔑力克)[6],他们铸有自己的钱币。历史文献、碑

铭和钱币都提到布哈拉、讹答剌、沙什(塔什干)、霍占德、费尔干(首府为乌孜干)、塔拉斯有蔑力克,并且甚至在伊犁汗斡耳朵近处的阿里马也有蔑力克。喀什噶尔似乎没有蔑力克,那里市政由萨德尔管理。被阿里马城蔑力克逐出的该城萨德尔也避难于喀什噶尔。分别由萨德尔和蔑力克代表的贵族与民主分子间的斗争在蒙古人统治下继续存在[7]。那时布哈拉一个时期由一中国人赵将太傅(?)治理。这说明为什么在布哈拉的铜币上铸有两种语言——汉语和阿拉伯语的铭文。这是中亚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情况。

在中亚,调和游牧民与定居民的利益要比其他蒙古国家困难得多。蒙古人的征服不是民族的迁移也不是因要寻求新的领土而引起的[8]。成吉思汗的征略对蒙古族的分布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绝大多数蒙古人仍留居蒙古。成古思汗自己也回到了那里并且其后继人也仍继续住在那里。从全部十二万九千人的正规蒙古军中,幼子拖雷得到了十万四千人。成吉思汗其他三子各得四千人。剩下的一万三千人则分给王室的其他成员。不过蒙古人的远征也引起了游牧民族从东到西的某种变动,并且一般说来造成了中亚游牧民成分的增加。在察合台死去(1242 年)和海都继位(1269 年)间的年代里,中亚没有强有力的汗,而其地又接近拥有军事实力的游牧民,这对农业区,尤其是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要比蒙古人入侵时的破坏为大。根据传教士鲁布鲁克的记述,未曾受到兵燹破坏的伊犁河以北的七河地区在 1253 年左右许多城市消灭了,并被用作牧地。1259 年中国旅行家常德在楚河谷也见到许多废墟。

这些记述似乎是指较小的城市。较重要的城市中心曾在一个

长时期里成功地抵抗了草原的压力。鲁布鲁克曾经过名叫 Kinchat(Kanjak)的“萨拉森”(即伊斯兰教徒)城,它位于塔拉斯城北的塔拉斯河岸上。伊犁河北有一“良好的城市”,这里有“操波斯语的萨拉森人”。再往北有一“大城”海押立,在这里鲁布鲁克第一次见有佛教徒,在这个一度是阿尔斯兰汗哈剌鲁首府的伊斯兰城中并有三座寺院。在距海押立城不远的地方有一村庄,那里的居民全为景教徒,并有一个引起“很长时间未看到教堂”的旅行家注意的教堂。这表明鲁布鲁克在越过楚河谷时错过了下面景教徒的居留地,属于他们的墓地和墓志铭在匹失培克[9]和托克马克附近发现。而在他提到有景教徒村庄的地方至今尚未发现有这种景教徒的遗留物。

那个时期欧洲人尚没有利用经过中亚的商路。这些地区欧洲商业的先遣者是威尼斯人马可罗波罗和马非奥波罗兄弟[10],他们于 1262 年从金帐汗国抵达布哈拉,并在 1265 年从那里去中国。

13 世纪 70 年代是布哈拉整个历史上灾难深重的年代。1273 年它受到波斯蒙古军人侵的破坏。三年后又因地方上的骚乱遭到很大损失,之后有七年之久处于荒废状态。马思忽惕别克受海都之命进行了它的重建工作。在海都治下,建立了新的安集延城,该城直到 18 世纪初为止是费尔干区的重镇。这证明它的城址选择得很成功。安集延是中亚史上统治者不为一己私利而建筑的少有城市(海都和其后继者都不住在那里),它是专为商业贸易目的而修建的。

蒙古帝国暂时曾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地区结合成一个国家。在西方,这个政治体包括了像花剌子模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地区,这两个地区间从前只存在过某种文化和经济的联系。这种统一本应

有利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但13世纪60年代开始的汗室内部纷争妨碍了商业的发展。但这些事件并没有影响中国与波斯间的海上贸易。这两个国家都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并彼此结有紧密的同盟关系。因战乱受损失最厉害的是中亚的蒙古国家,它的繁荣依赖于陆路的商队贸易。为此,1304年海都死后不久,这个中亚汗国就向所有蒙古统治者建议在当时惟一可行的形式——联邦——下恢复帝国的统一(名义上承认中国皇帝的最高统治权),来建立各国间的贸易自由。这种条约是订了,但没有付诸实现。因为早在1305年中亚蒙古人之间已开始了内讧,统治权又再次从窝阔台系转到察合台系手中。

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一词就确立于上述那个时期。"察合台"是组成汗国军力的游牧人用的名字,并且甚至在没有察合台系汗以后,他们仍叫这个名字。形成在这一时期的中亚文学语言也叫做"察合台语"。没有任何其他与蒙古征服有关的名字能获有如此大的名声。在金帐汗国,用作民族名称的既不是术赤也不是拔都,而是他们的后裔乌孜别克(1312—1340年),他在位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首次取得了巩固的地位。

在察合台汗国,对采取传统伊斯兰文化和国体(如果不是接受伊斯兰教的话)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发生在怯伯(1318—1326年)在位的时候。怯伯是木八剌沙和八剌后第一个住在河中地的汗。这次,汗选中卡施卡河谷中纳赫沙普附近的一个地方。在距纳赫沙普两法尔萨赫(12—15公里)的地方,为怯伯汗修建了宫廷。卡

尔希城就是因该宫而得名的(卡尔希在蒙古语里为“宫殿”之意)。蜀鲁克塔帕遗迹相当于该城前蒙古时代的城址,而枣哈吉麻兰遗址(靠近铁路站)相当于14和15世纪的城址。怯伯在察合台汗国铸造了通行全国的钱币,并采用了波斯和金帐汗国的货币制度。他铸造了狄尔哈木和狄纳尔。狄纳尔不是像以前指金币,而是指大的银币。狄尔哈木是小的银币,重二分之一索洛特尼克[11],一狄纳尔等于六个狄尔哈木,在中亚这种钱后来因怯伯的名字而称做怯伯钱[12]。中亚铜狄尔哈木的消失和银币的恢复使用可追溯到13世纪下半期。把全国按波斯例子分成小的行政和纳税区——土曼[13]也似乎是怯伯所为。在费尔干和新疆南部地区用鄂尔琴(Orchin)一词来代替土曼。

怯伯并不是伊斯兰教徒(但是这不妨碍之后在其葬地建有伊斯兰式的陵墓)。他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统治者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他的兄弟答儿麻失里(1326—1334年)[14]也住在卡尔希附近,并皈依了伊斯兰教。据同时代人说,这一点非常有利于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另一方面,帝国的统一也因汗迁入城市和脱离以游牧生活为基础的蒙古习惯法而受到损害。根据中国史料,当答儿麻失里在位时,其兄弟笃来铁木儿统治东部地区。中国人把笃来铁木儿[15]看作是整个汗国的统治者。笃来铁木儿的儿子不赞领导了反对答儿麻失里的运动。答儿麻失里被废黜和杀掉。随之而起的骚乱延续了十年之久,并给七河地区的城市生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当时的一位作者根据旅行者的报道对破坏地区作了生动的描述:“从远处你可以看到绿树成荫、建筑良好的村镇,当你走近想见到村民时才发现十室九空。所有居民都以游牧为生,不务农业。”14世纪下半期在楚河河谷已不存在城市。只在塔拉斯

尚有养夷城(Yanï,yangi,为“新的”之意)。帖木耳曾在那里设有总督。15 世纪时连这里的城市生活也告结束。到 16 世纪时已不能确定楚河和塔拉斯河流域的哪些废墟相当于哪些城市了。

阿米尔统治者

当这些骚乱的年代里,河中地一个时候又再次归属于住在东方的汗的治下。住在河中地的汗也征略过东部地区。最后,14 世纪 40 年代当合赞汗治下,河中地本身爆发了汗与突厥氏族贵族间的斗争。合赞汗也住在卡尔希附近,他的赞吉尔萨莱宫,在卡尔希西方有两天的路程。不仅是汗,而且主要的游牧氏族在河中地和邻近的阿富汗也占有一定的领地。有四个这种氏族,它们为成吉思汗分给察合台的四个千户:即霍占德附近的扎剌依儿,卡什卡河上的巴尔拉斯,阿姆河上游地区的高琴和阿富汗北部的阿尔拉特。这样,以前把封地分给汗室成员的封邑[16]制度现在改为给强大氏族的首领。合赞汗要在河中地恢复强大汗权的企图导致了他的垮台(1346 年)。这以后大权转入到主要氏族的“阿米尔”手中。阿米尔为表示突厥语伯克和蒙古语诺颜的波斯—阿拉伯称号。成为国家首领的阿米尔称为乌鲁斯阿米尔(ulus 为“部落、人民、国家”之意)。因为只有成吉思汗的后裔才有权拥有汗的称号,所以就从他们之中来挑选傀儡汗。类似的制度也在前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建立,那里的主要氏族为杜格拉特,他们统治西部喀什噶里亚和直到热海的七河南部地区。汗国这两部分的以后发展有所不同。在河中地的阿米尔中产生了像帖木耳那样的统治者。他的后裔袭其权力后,连傀儡汗也没有了。另一方面,在喀什噶里亚地区

汗比阿米尔要有才干。汗的权力被重建过,杜格拉特阿米尔的权力逐渐被摒除,并重新恢复了以前的封邑制度,封邑首领为汗室成员。但蒙古国家组织的传统在西部地区残留较久,而东部地区的游牧民则更多留恋蒙古的氏族传统。河中地的游牧民称自己为"察合台"并把东部地区的邻人看作"剽劫者"(扎答)。在察合台汗国,"察合台"和"扎答"用作两个对立的术语,这和金帐汗国使用乌兹别克(汗的军队)和哈萨克(脱离其合法汗的自由民)的情况一样。同时喀什噶里亚和七河的游牧民称自己为莫古勒(Moghol,阿富汗北部的蒙古人仍是这样称呼。他们是仍保有其语言的蒙古征服者的最后后裔),而称其西部邻人为哈拉乌纳斯(qarau-nas),即杂种或混血种之意。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沙里阿特)是和蒙古的国家与民族传统格格不入的。甚至当他们接受伊斯兰教后,蒙古王室也曾多次企图利用伊斯兰教法为其本身的利益服务。虽然更常见的是伊斯兰教法被用作反对蒙古人的武器。和波斯及金帐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一样,察合台人和"莫古勒人"都是伊斯兰教徒。但在游牧民的国家和民族生活里,宗教原则只居于次要的地位。为此,蒙古国家的覆亡可认为是宗教(伊斯兰教)的胜利。

花剌子模

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地方的伊斯兰王朝开始崛起于不同的省地。在其钱币上宗教的信条往往代替统治者的名字。一个"王国属于真主"的铭文表明了神权原则和对与宗教无关的国家制度所持的否定态度。带有类似铭文的钱币也在花剌子模铸造。这个

地区14世纪60年代在察合台汗国分裂和贾尼别克汗死(1357年)后以及金帐汗国的动乱之后,重又联合成一独立的国家。花剌子模的统治者属于突厥化的蒙古宏吉拉特氏族。当帖木耳治下强大起来的察合台汗国力图收回南部花剌子模时,花剌子模统治者胡赛因苏非这样回答了帖木耳的使臣:"你的王国是一战争地区(即异教徒国家),而伊斯兰教徒的义务就是向你们宣战。"为此,花剌子模人不认为察合台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正像察合台人把俘虏来的莫古勒人卖为奴隶不认为他们是伊斯兰教徒一样。

蒙古治下商队贸易的发展对花剌子模及其首府兀龙格赤特别有利。该地区的农业的发展比不上前蒙古时期或现在。阿拉伯旅行家伊宾·巴图塔在其1333年从兀龙格赤到布哈拉的路上,除柯提(今之舍依赫阿拔斯—瓦里)[17]外没有见到一个村子,但兀龙格赤被描写成突厥地方"最大、最重要和最漂亮的"城市。市集上人多得无法通过。欧洲旅行家也提到兀龙格赤,说它是所有商品都有行销的大商城。该城在蒙古人破坏后恢复得如此迅速,以致前蒙古时期的文化传统未曾中断。12世纪初在花剌子模建立的唯理神学派别Mu'tazilites一直存在到14世纪末。在花剌子模和沿锡尔河下游一带,早在12世纪就已存在伊斯兰突厥语文学。当其组成为金帐汗国的一部分时,14世纪这些地区对突厥文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一地区的作家在时间上要早于察合台汗国作家,虽然后来突厥文学语言被称做"察合台语"[18]。花剌子模罗致了一批后来对发展帖木耳汗国科学和艺术上起过影响的学者和艺术家。残存于兀龙格赤废墟中的14世纪上半期的宏伟建筑物应影响过帖木耳及金帐汗国的城市建筑(如布勒卡尔城,在伏尔加河畔)。只有仔细研究这些花剌子模遗迹,尤其是其中著名的土拉伯克哈

尼姆陵墓后，我们才能确定这一影响的细节。

下面这一点是肯定的，即阿姆河在蒙古人侵后又再次开辟了通向萨里卡迷失低地的道路，并从那里沿乌兹波依[19]河床通向里海，应影响与伏尔加河流域及高加索的商业联系。我们知道位于里海河口村庄的名字，船只可从那里溯流而上，但高达二十八英尺的乌兹波依瀑布使得不能建立从老兀龙格赤到里海的航道。据说15世纪初期锡尔河不是流入咸海而是流入阿姆河。证明这点的是14世纪尚存在于锡尔河下游的诸城遗址。据我们所知，这些地方既未受到帖木耳征略的破坏，也未受到其他军事事件的破坏。

注 释

① 依俄文本补。——汉译者

② 旅行家鲁布鲁克曾把哈拉和林同 Faubourg St. Germain 城作过比较。哈拉和林1260年以后已不再是首都。

③ 即托钵僧寺院。——汉译者

④ 应为 Orqina。巴氏写为 Ergene(?)。——英译者

⑤ 写作 Baraq 较好。——英译者

⑥ 蔑力克为"王"之意。——汉译者

⑦ 把蔑力克说成是民主的代表恐无根据，也不知何所指。——俄编者

⑧ 巴氏此处只指蒙古本土及蒙古人本身而言，而未考虑诸操蒙古语的部落(如里扎列和开塔克部)迁移的事实，并把蒙古人同突厥人分开。实际上有许多蒙古—突厥氏族部落体(巴氏多用通名"游牧民"、"游牧成分"等表示之)融合了。他们在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征服中进行了广大范围的迁移，同时并攫取耕地和牧场。——俄编者

⑨ 今伏龙芝，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府。——英译者

⑩ 即著名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汉译者

⑪ 此处依俄文原文改。索洛特尼克为旧俄重量单位，等于4.266克。——汉译者

⑫ 俄国的戈比，据说即来自此字(kebek)。——汉译者

⑬ 土曼(tüman)为“一万”之意。——汉译者

⑭ 这个名字显然来源于梵文(佛教徒名字)：Dharma Śrī。——英译者

⑮ 是否应为笃哇铁木儿(Duva Tīmur)。——英译者

⑯ 巴氏使用中古俄语的术语udyel。——英译者

⑰ 今哈拉卡勒帕克自治共和国的贝鲁尼区中心。——俄编者

⑱ 现在一般把这一时期花剌子模作家如花剌子米、库特布等作品的语言称做花剌子模突厥语或早期察合台语。——汉译者

⑲ 由于最近在当地进行了详细研究，这一说法已成问题。——英译者

六

帖木耳

帖木耳属于巴尔拉斯氏族并生于沙赫里萨卜孜城附近。他初露头角是在1360年。当时他投到曾短期占有河中地的莫古勒汗秃黑鲁帖木耳汗的麾下。结果,帖木耳成为巴尔拉斯的封王,在随后的年代里,他有时同莫古勒人结成联盟,有时则同其他察合台阿米尔一起来反对他们。1365年,包括帖木耳在内的察合台阿米尔把国家放弃给莫古勒人,于是撒马尔罕政权转入一个群众运动[①]的领导人手中。后者曾成功地击退了入侵者的进攻。但翌年,他们成了阿米尔背信弃义的牺牲品。开始阿米尔们花言巧语感谢他们胜利地保卫城市之功,从而麻痹了他们的警惕性。在其内部倾轧中阿米尔使用了同样的办法。帖木耳也用同样办法取得了胜利。反对乌鲁斯阿米尔暴动的主因和以前反对汗的运动一样,即因为最高统治者想转移驻地,特别是想把其财库放在设防坚固的城市中,在那里他们可以不受同部落成员的影响。帖木耳的前任阿米尔胡赛因就是想这样做的人,他挑上了巴尔赫城。帖木耳曾极力劝阻他这样做,他援引其叔父阿不都拉的例子说明,当他(指阿不都拉)想把撒马尔罕作为首府时,曾引起察合台人的骚乱。胡赛因未采纳这一建议。帖木耳的预言应验了。但这次不满分子

的首领是帖木耳自己。结果胡赛因被推翻并被杀死。1370 年政权转入帖木耳手中,他一即位就做了在其前任时他曾加以反对的事情。在这之前,他已在沙赫里萨卜孜和卡尔希建有城堡。现在他就把撒马尔罕变为一个设防坚固的首府,又在那里修建了一个专门存放其财宝的堡垒。

杀害被推翻的胡赛因被赋与合法的性质,它实际上是由阿米尔开胡斯饶按照可兰经所允许的血亲复仇方式干的。开胡斯饶的兄弟十年前曾死于胡赛因之手。但两年后情况发生变化。血亲复仇的法律用来对付开胡斯饶本人。他被控背叛帖木耳。死刑的执行交给有权为胡赛因报仇的人。

帖木耳及其追随者力图用同样的方式来使其进一步的行为合法化。像其前任一样,帖木耳把成吉思汗系的傀儡汗扶植到王位上,藉他们的名义来给自己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实际上,这些汗连作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的荣誉也没有。并且杜撰出一个传说来为帖木耳有权承继权位辩护。那里说,依据一项协定,帖木耳的祖先[②]当成吉思汗的后继人统治时曾任握有大权的阿米尔。这个协定曾数次续订过,后来在骚乱中被忘掉。由于帖木耳娶了合赞汗之女、阿米尔胡赛因的寡妻,这样就和汗的家族结成了亲戚关系,并取得了古尔汗(gūrkhān"驸马")[③]的称号。这一点使他凌驾于其他阿米尔之上。直到死,帖木耳力图利用蒙古帝国,尤其是察合台的观念和传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察合台人构成他的主要军力。外表上,这支军队与其说像伊斯兰教徒不如说像蒙古人(都留有辫子)。帖木耳与其亲信的关系决定于军事习惯和传统。在察合台人中他的主要支柱是巴尔拉斯部。他的宿敌扎拉依尔人1376 年按照帖木耳的命令,遭到相当于现在军队被遣散的命运:

宣布废除扎拉依尔乌鲁斯,其残留人员分配在各个阿米尔分队中。

比起蒙古的军事统治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传统对帖木耳来说只居次要地位,虽然他曾巧妙地利用它们来为其行为辩护和抬高其汗国的身价。在中亚,帖木耳的拥护者主要是以撒马尔罕的伊斯兰舍依赫(Shaykhal-islam)[4]和忒耳迷城的赛依德(Sayyids-)[5]为首的伊斯兰教上层。1371 年一个忒耳迷城的赛依德叛变,并投到帖木耳敌人方面去。这纯为偶然事件,并且不论对帖木耳和对其他赛依德来说都不起什么作用。属于该阶层的有来自麦加的移居者赛依德巴拉卡。帖木耳曾把阿富汗的俺都怀城赐给他作封地,死后并葬在帖木耳的近处。按照传统,帖木耳曾把几个与普通群众有较密切联系的苦行派舍依赫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保护人。其中有他的启蒙教师沙赫里萨卜孜城人舍依赫沙姆斯丁·库拉勒和呼拉珊人舍依赫扎因丁·塔亚巴狄。不过前者死于帖木耳统治的初年,而后者在帖木耳历史上只在 1381 年提到过一次,因而他们对帖木耳活动的影响是不大的。值得注意的是,完全没有关于帖木耳和布哈拉托钵僧之间某种亲密关系的记载,虽然纳克施班狄派[6](它至今尚有很大影响)的创建人,布哈拉最有影响的舍依赫之一巴哈乌丁·纳克施班德是帖木耳的同时代人。那些与游牧民民族传统有关的对伊斯兰教圣人的崇拜,对帖木耳来说应具有特殊意义。引人注意的是,帖木耳在其故乡沙赫里萨卜孜和首府撒马尔罕以外所修建的惟一大建筑物,是在雅萨城(又名土耳其斯坦城)12 世纪舍依赫阿赫买德·雅萨维葬地修建的陵墓,雅萨维曾在突厥人中积极布过教。

在国内,宗教的狂热只被帖木耳用作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在叙利亚,他以受虐待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的复仇人的姿态出

现,为此被认为是一个狂热的什叶派教徒。但在什叶派的麻咱答兰那里,他又变为在纪念先知伙伴时受到什叶派凌辱的人的复仇者。帖木耳常用的另一口实是,波斯(是他力图征服的主要对象)在由于政治上的分裂而引起的混乱后必须重新恢复和平和秩序。事实上,他进行征战的真正动机是他的征服狂。据说,他曾说过下面一句似乎反应其内心思想的话:"世界整个有人居住的空间没有大到可以有两个国王的程度。"这种带有几分病态的狂语说明,他想以巨大规模的行动(破坏和建设的)来恐吓世界。他通过这些行动与其说要获得长远的结果,不如说是要造成一种外部的强烈印象。帖木耳的征略包括了一个广袤的地区,从俄罗斯的叶莱茨到德里,从斯米尔纳到大裕勒都司(新疆库车北)。但除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外(在那里帖木耳给其儿孙开拓了封邑),他的征略不过是破坏性的掠夺而已。帖木耳把所有战利品都运到撒马尔罕,其中包括用来给世界征服者的首都增添光彩的作家和学者。但是那种认为除撒马尔罕外,帖木耳所到各处的活动都是破坏性的意见,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他在远离撒马尔罕的喀布尔河谷和木干草原地区修建了巨大[7]的灌溉工程。按照帖木耳的计划,撒马尔罕要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他的想法可由撒马尔罕周围建有一系列冠以伊斯兰世界主要城市名字的村庄看出:巴格达、大马士革、密斯尔(开罗)、设拉子和苏丹尼亚。

帖木耳整个青年时期是在军事活动中度过的。他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识字。但他对其宫廷的文化生活并不陌生。除突厥语外,他能说波斯语,并从和学者们的交谈中获有各种学科的某种知识。他曾以其历史方面的知识使历史学家依宾·哈勒东感到惊讶。他同当时最优秀的棋手下棋。他的建筑师们在工程中要接受

他的艺术构思的指导。他所修建的一些建筑物与一定的征战有关,沙赫里萨卜孜的白宫(Aq-Saray)是1380年由他1379年在花剌子模俘获的工匠修建的;现在撒马尔罕以比比哈尼姆之名知名的伊斯兰教大寺院,是在帖木耳从印度回来后在1399年动工修建的。后者可以看作帖木耳建筑活动的典型例子:从艺术构思方面看,这座建筑虽然雄伟壮丽,但技术上建筑得如此草率,甚至在帖木耳生前,顶上的石头就已开始掉落,危及做礼拜人的生命安全。

在所有文化地区中,花剌子模因帖木耳的征战活动受害最大。该地人民曾数次起来反抗入侵者。1388年花剌子模首府兀龙格赤被夷为平地,只有礼拜寺和礼拜寺的尖塔得以幸免。该城所有居民被迁移到撒马尔罕。1391年帖木耳允许重建该城,但只准有原城的四分之一大。帖木耳曾数次出征过河中地北部、西部的邻人,但这只是对这些草原游牧民前此的掠夺给予惩罚或者防止未来的入寇而已。只有通过垦殖活动才能保障草原的持久和平,但帖木耳治下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当其统治的末年,当他计划远征中国时,他才修建了一列前进哨所。在阿史不来(今锡尔河省和七河省的界河)河上建了一个堡塞,并采取措施来恢复该地区的农业。在热海建筑了另一堡塞。1404年大军齐集在从沙赫鲁黑亚[8]到萨乌兰的锡尔河一线上,准备远征中国。但就在出发在即的时候,1405年回历8月18日帖木耳死于讹答剌。同年放弃了热海和阿史不来河上的堡塞,并与莫古勒人订立了协定。据协定,莫古勒人收回前此被帖木耳夺去的地区。数年后当由于帖木耳之死而引起的骚乱被平息后,国家的最高权力为其子沙赫鲁黑取得,而乌鲁格别克[9]则作为他在撒马尔罕的代表。这时阿史不来又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东北边界。1425年循其祖父之例,乌鲁格别克进行了深入莫古勒斯坦腹地的远

征。他到过帖木耳建在热海畔的堡塞,并从伊犁河谷上游携回两大块翡翠石放在帖木耳墓上。关于乌鲁格别克此次征战的另一纪念物,为立于撒马尔罕和吉扎克间吉兰乌提峡谷中的碑文。但乌鲁格别克的征略未产生深远的影响,既没有获致草原上的和平,也没有恢复先前的农业和城市生活。

帖木耳后裔

当乌鲁格别克在位时(1409—1449 年,1447 年以前是以其父沙赫鲁黑的名义),撒马尔罕保有其作为首都的全部豪华,虽然王朝的首脑沙赫鲁黑住在赫拉特城。乌鲁格别克[10]罗致了一批学者和艺术家在其宫廷中,修建了壮丽的建筑物,其中包括撒马尔罕广场前的伊斯兰教大学;在城市北部修建了天文台,他自己进行了天象观测,并写有天文学方面的著作。当时人说他是皇位上的学者,并把他与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相比。不像沙赫鲁黑治下的赫拉特,那里伊斯兰教气氛占统治地位(沙赫鲁黑完全摒弃了成吉思汗的律令,并且只愿成为一个伊斯兰教苏丹和哈里发),而在乌鲁格别克治下的撒马尔罕则继续存在活跃的文化生活。伊斯兰舍依赫参与了这种生活,但一般群众或者他们的精神指导人——托钵僧们则不能参加。比起对其祖父帖木耳来,托钵僧们更不喜欢乌鲁格别克,但也不像怕其祖父那样怕他。在乌鲁格别克生前,从托钵僧阶层中产生了一个政治领导者,他就是纳克施班狄教派的和卓阿赫拉尔[11]。他的名字是和宗教反对战胜中亚的高度世俗文明生活和城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乌鲁格别克在其统治的后半期所遭的不幸,他的不善于处理

沙赫鲁黑死后所产生的混乱政局,以及其幼子阿不都阿泽孜的轻举妄动,使他丧失了所有的威信。大权转到他另一个儿子阿不都拉蒂甫的手中,后者不惜干出弑父杀弟的勾当。阿不都拉蒂甫统治时开始的宗教反动,1450 年曾中止过一个短时期。当时阿不都拉蒂甫在一次军事阴谋中被杀,乌鲁格别克的侄子阿不都拉即位,并恢复了其叔父的传统。但 1451 年阿不都拉在一次与阿不赛依德(帖木耳的另一个后裔,和卓阿赫拉的傀儡)的战斗中被杀。阿不赛依德的成功要归功于乌兹别克游牧人的帮助。那时乌兹别克人在其汗阿不哈依尔的统率下已在锡尔河下游立定了脚跟。像伊斯兰世界其他几次情况一样(例如在西班牙的例子),宗教的反动在其反对世俗文化的斗争中又一次在蛮族中找到了同盟军。

15 世纪下半期,与沙赫鲁黑和乌鲁格别克时期相反,学者、诗人和艺术家在赫拉特比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能得到较好的待遇。赫拉特在苏丹胡赛因(1469—1506 年)治下(其领地包括有外里海省[12]和花剌子模)成了文化活动的中心。尽管在赫拉特居民中缺乏突厥成分,但就是在这里,中亚突厥语诗歌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它的主要代表作家米尔·阿里·希尔[13]是苏丹胡赛因的宰相。米尔·阿里·希尔力图通过其作品证明,用突厥语可以创作出不次于"萨尔特"语[14]的文学作品来。萨尔特(Sart)一词源自印度语,突厥人原用它表示"商人"之意。在蒙古人中,萨尔塔克台(Sartaqtay)和萨尔塔乌勒(Sartaul)用来指一般伊斯兰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是指伊兰人,与表示伊兰人的塔吉克(Tājik)一名同义。在乌兹别克人那里,随着中亚伊兰人的突厥化,萨尔特这一名称则用来指中亚突厥语的定居民[15],以别于操伊兰语的塔吉克人。如"塔吉克"一词起初只用来称阿拉伯人,后来用来兼指阿拉伯人和

波斯人,最后只用来指波斯人一样,“萨尔特”一词起初只指波斯人,后来用来指波斯人和突厥人,最后只用来指(定居的)突厥人。

注 释

① 这里指称为 Sarbadār(敢死队之意)的人民群众运动。——汉译者

② 据 A. Z. 托干教授的意见,成吉思汗和帖木耳都属于共同的祖先——卜赞恰尔(Buzanchar)。

③ 正确的写法应为 Küräkän,和菊尔汗(Gurkhan)完全不同。——英译者

④ 为中亚伊斯兰教首领。——汉译者

⑤ 为对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汉译者

⑥ 中亚最有影响的托钵僧派。——汉译者

⑦ 这个修饰语很难令人同意。——英译者

⑧ 以帖木耳之于沙赫鲁黑名字命名,今其遗址沙拉黑亚在锡尔河和安格林河汇合处附近。

⑨ 沙赫鲁黑之子,著名的天文学家。——汉译者

⑩ 关于乌鲁格别克,参见巴氏的另一专著《乌鲁格别克及其时代》。——英译者

⑪ 在译文中使用这一称号的中亚形式(Khoja),波斯文形式为 Khwāja。——英译者

和卓一词原指四哈里发之一的后裔,在中亚也用来指穆罕默德的后裔。——汉译者

⑫ 今土库曼共和国。——英译者

⑬ 即那瓦依(Nawāyī)。关于那瓦依可参见巴氏的专著《米尔·阿里·希尔》。——汉译者

⑭ 指波斯—塔吉克语。——汉译者

⑮ 对游牧的突厥人而言。——汉译者

七

乌兹别克汗国[1]

苏丹胡赛因和其合作者[2]似乎曾成功地进行活动而未引起宗教界反对。但他死后，又照例发生了动乱，并且文化的进步也为外族的征服所打断。16 世纪初期，乌兹别克汗阿布哈依尔的孙子舍班尼征服了中亚和呼拉珊的所有帖木耳后裔的领地，其中包括苏丹胡赛因的前王国。舍班尼死于一次与新波斯国的建立者伊斯马依勒沙发生在谋尔夫的战役中。有一个短时期，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再次转入帖木耳的后裔苏丹巴布尔[3]的手中。但 1512 年舍班尼的侄子兀巴依都拉击败了巴布尔，恢复和巩固了乌兹别克人在中亚的统治。差不多与此同时，其他乌兹别克汗也把波斯人从花剌子模逐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王朝。苏丹巴布尔退到印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有名的伊斯兰教王国之一[4]。这个王朝依传统也被认为是“察合台的”，虽然在那里并没有任何察合台后裔。

兀巴依都拉（死于 1539 年）被认为是伊斯兰精神的理想统治者。在他和其后继人的统治下，政治上的优势逐渐从帖木耳及其后继人的首府撒马尔罕转移到布哈拉。兀巴依都拉和舍班尼朝的主要代表人物阿不都拉汗（1559—1598 年），以及 17 世纪出身于阿施塔尔哈尼朝（或称占尼朝）诸汗的活动都与布哈拉有密切关

系。阿不都拉征服了呼拉珊和花剌子模,并曾率军深入到草原的腹地。他也像乌鲁格别克一样,在吉兰乌提峡谷中留下了关于这次远征的碑文。像帖木耳一样,阿不都拉主要是作为一个建设者而留在人民群众的记忆中。除了他们实际建造的以外,又把许多别的建筑也说成是他们修建的,如撒马尔罕附近扎拉夫尚河上的拱形桥,而实际上它建于舍班尼时代。

乌兹别克人的征服并没有导致文化活动的完全停止。但花剌子模(这里14世纪时曾达到高度的文化水平)乌兹别克汗国的生活水准则是十分低的。曾在波斯住过十年并因而比他的同胞受到较好教育的阿布勒哈孜(1643—1663年),曾想编写一部关于其王朝的历史,但因找不到胜任这一工作的人,结果不得不自己动手[5]。另一方面,只是在乌兹别克人统治时才首次在扎拉夫尚盆地写出了丰富的历史著作。而帖木耳及其后继人的历史家不论出生地和工作地点完全都在波斯。那个时期修建的一些建筑物,如撒马尔罕建于1619年的希尔达尔伊斯兰教高等经学校并不逊于帖木耳或乌鲁格别克时建造的。包括巴尔赫在内的阿富汗北部也属于乌兹别克汗国的版图。由于地理上靠近兴都库什山那边著名的印度大莫卧儿王国(巴布尔的后裔),巴尔赫城成为世俗文化生活的中心。17世纪40年代被从巴尔赫召到布哈拉来的纳狄尔·穆哈买德汗由于把巴尔赫的风尚带到严肃、虔诚的布哈拉而引起臣民对他的不满。

18世纪

对整个伊斯兰亚洲来说,18世纪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衰

退的时期。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这点尚远没有充分研究过),似乎是 15 世纪开始的、由欧洲人独占的海路贸易的发展和陆路商队贸易的衰落。在中亚,乌兹别克汗国政治上频繁的动乱,早在 16 世纪就为其草原上的邻人利用过,即西部的土库曼人和东部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就是 15 世纪从其民族主体分出来的一部分乌兹别克人,他们没有参加对帖木耳王国的征服活动[6]。18 世纪的动乱特别影响了撒马尔罕和希瓦。17 世纪当阿姆河改道注入咸海后,花剌子模的首府从兀龙格赤迁到希瓦。这事发生在新兀龙格赤城(距希瓦不远)建成以前。新兀龙格赤城取代了旧兀龙格赤城在商业上的地位。有一个时期,撒马尔罕和希瓦完全荒废了。到 18 世纪末,当新的王朝建立时(布哈拉的芒吉特朝和希瓦的洪吉拉特朝)才得到某种程度的恢复。早些时候,在费尔干建立了孟朝(Ming)[7]。那里的伯克们于 19 世纪采取了汗的称号。这样,除以前已存在的布哈拉和希瓦两个乌兹别克汗国以外,又添上了第三个汗国——浩罕汗国。它的名字来自新王朝建立的新城市浩罕城。

19 世纪

19 世纪当欧洲最终确立其文化的领导地位时,中亚作为伊斯兰亚洲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在文化发展上又低于其他伊斯兰国家。在俄罗斯人来到这里以前,中亚没有印刷业,不论是石印或是活字印刷。而那时土耳其和波斯早就有了印刷业。在土耳其和波斯的国家、社会生活中,早在 18 世纪时已见有欧洲的影响,而中亚在这方面仍完全处于中世纪的状态中。只有蒙古人侵后首次复工

的金币铸造厂表明,通过波斯的中介,它和欧洲曾发生过某种经济上的联系。

但是如果认为俄国征服者在中亚碰到的只是野蛮愚昧和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文化活动的话,那是错误的。在俄国征服时,中亚大部分的经济状况比起1世纪前,已有很大发展。希瓦和撒马尔罕又再次成为重要城市。比起16和17世纪来,在19世纪希瓦和浩罕汗国在文化(尤其是历史学)和建筑方面呈现出一幅比布哈拉更为生气勃勃的局面。费尔干首次成为一个大国的中心,它几乎包括有整个锡尔河流域。浩罕汗成功地把锡尔河省东部和七河省西部的一部分游牧民置于其统治之下。在中断了数世纪之后,又恢复了对草原地带的垦殖活动,并在浩罕汗国新建堡塞的保护下,恢复了农业生产。在费尔干本地,俄罗斯人见到完全为浩罕汗修建的浩罕、安集延和纳曼干[8]城市。浩罕汗国实施了利用卡拉河和纳林河河水的庞大灌溉计划。这是中亚过去历史上甚至在其文化发展达到顶点时费尔干地区也未曾有过的事。费尔干地区首次在中亚取得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并在俄国统治下一直保有这种地位,乌兹别克诸汗国时代的另一遗产是塔什干城的兴起。塔什干现在是中亚的首要城市[9]。它在阿不都拉汗时代对中亚的文化生活只具有次要意义,所占面积也比现在小得多。

像别的地区一样,中亚的未来决定于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地区[10],中亚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完全有赖于铁路的发展(它恢复了与海路贸易有同等重要性的陆路贸易)。中亚大概将不再起它以前起过的那种与远东贸易上的作用,并且也似乎不可能在西伯利亚铁路外又修建一条贯穿中亚到中国的铁路[11]。不管怎样,未来修筑欧洲—印度铁路的问题仍是

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知道在这一规划中中亚将起什么作用。

为此,俄属中亚地区不但有其过去,同时也有其未来。

注 释

① 关于16—19世纪中亚史的主要参考书见伊凡诺夫《中亚史概论》一书,第234—246页。——俄编者

② 指那瓦依。——汉译者

③ 他的回忆录是突厥语散文的典范。——汉译者

④ 即莫卧儿王朝。——汉译者

⑤ 指著名的《突厥世系》一书。——汉译者

⑥ 后来哈萨克人被误称为吉尔吉斯人。——英译者

这里巴氏指苏联十月革命前的情况。当时哈萨克人被称为吉尔吉斯人,而真正的吉尔吉斯人则被称做哈拉吉尔吉斯人(即黑吉尔吉斯)。——汉译者

⑦ 约从1700年到1876年。——英译者

⑧ 纳曼干为一新城市,它在17世纪时尚是一个村庄。

⑨ 现在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府。——英译者

⑩ 此书写于1920年。——英译者

⑪ 除连结突厥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土西"铁路外,1955年又拟动工修建从兰州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铁路。——英译者

关于中亚考古和历史的主要著作可参阅V. I. 马赛勒斯基的《突厥斯坦边区》,1913年(《Turkcstansky kray》,此书作为《俄罗斯——祖国通史》(Rossiya, Polnoye opisaniye nashego otechestva)第19卷出版;同上书,页273以下为中亚(突厥斯坦)简史。关于此书的书评载ZVO,1913,XXII,页198—206。最近的著作有:V. 巴尔托里德的《中亚灌溉史》(Barthold : K istorii orosheniya Turkestana,1914)及《乌鲁伯及其时代》(Ulugh-bey i yego vremia, 1918)等。

译名对照表

A

阿不都拉	Abdullah
阿不都阿泽孜	Abd al-Aziz
阿不都拉提甫	Abdal-Latib
阿不赛依德	Abu sa'id
阿不勒哈依尔	Abul-khayr
阿布勒哈孜	Abul-Ghāzi
阿布·哈非斯	Abū-Hafis
阿尔巴尼安人	Albanians
阿尔万克	Alvank
阿尔斯兰汗阿里	Arslan khan Alī
阿尔斯兰汗阿赫买德	Arslan Khan Ahmad
阿尔斯兰汗哈喇鲁	Arslan Khan Qarluq
阿尔拉特	Arlat
阿夫拉西亚普	Afrāsiyāb
阿赫买尼德朝	Achaemenid
阿赫买德·雅萨维	Ahmad Yasavī
阿拉乌丁·摩诃末	Alā al-din Muhammad
阿里马	Almaliq

阿里斯	Aris
阿勒灰	Alghuy
阿米·纳斯尔	Amir Nasr
阿米尔	Amir
阿姆河	Amu-Darya
阿萨德	Asad
阿史不来	Ashpara
阿施塔尔哈尼朝	Ashtarkhanid
阿乌里亚—阿塔	Aulie-Ata
俺都怀	Andkhoy
安格林	Angren
安集延	Andijan
安息人	Parthian
安息朝	Arsacids
安提奥赫	Antioch
安提奥赫斯·索特尔	Antiochus Soter
奥什	Osh
奥斯曼	Othman

B

巴达克尚	Badakhshān
巴尔楚克	Barchuq
巴尔马克朝	Barmakid
巴尔克雅鲁克	Bärk-yaruq
巴尔拉斯	Barlas

巴哈阿丁·纳克施班德	Bahā al-Din Naqshband
巴哈阿丁	Bahā al-Din
巴拉—木儿哈卜	Bālā-Murghab
巴尔赫	Balkh
巴鲁坎	Barūqān
巴拉萨衮	Balasagun
八剌	Baraq(Boraq)
拔都	Batu
拜火教	Zoroastrianism
白衣大食	Omayyad
伯希和	P. Pelliot
伯恩斯坦	Bernshtam
贝鲁尼	Biruni
别尔哥	Berke
比比哈尼姆	Bibi-khanim
比丘林	Bichurin
部（政府部门）	divan
布札尔	Buzar
布里阿耳	Bulghar
布哈拉	Bukhara
布鲁沙斯基	Burushaski
卜赞恰尔	Buzanchar

C

察合台	Chaghatay

察八儿	Chapar
成吉思汗	Jenghiz Khan
楚河	Chu

D

大流士	Darius
大夏	Bactria
答儿麻失里	Tarmā-shīrin
德高叶	De Goeje
狄纳尔	dinar
狄尔哈木	dirham
狄康	dehqan
杜格拉特	Dughlat
笃哇铁木儿	Duva Timur
笃来铁木儿	Durra Timur
都瓦里·乞亚玛特	Duvār-i Qiyamat

E

讹答剌	Otrar
鄂尔琴	Orchin
鄂尔浑	Orkhon
额尔德尼昭	Erdeni—tsu
额尔齐斯	Irtis

F

法兰克人	Franks
法尔萨赫	Farsakh
法尔斯	Fars
弗列曼	A. Freiman
费尔干	Fergana

G

迦勒迦	Kalka
戛尔查	Charcha(Ghalcha)
戛尔奇斯坦	Gharchistan
甘加	Ganja
高卢	Gaul
高琴	Qauchin
葛逻禄	Qarluq
屈出律	Küchlük
古尔王朝	Ghūrid
古儿干吉	Gurganj
贵由	Güyük
贵霜	Kushān

H

哈拉卡勒帕克	Qaraqalpaq
哈拉乌纳斯	qaraunas

哈那哈	khānaqā
哈纳非	Hanefite
哈萨克	Qazaq
哈孜那朝	Ghaznavid
哈札尔	Khazar
喀什噶尔	Kashghar
喀什噶里亚	Kashgharia
海押立	Qayaliq
浩罕	Khoqand
合赞汗	Qazan-khan
河中地	Mawarnnahr
赫拉特	Herat
赫尔茨菲勒德	Herzfeld
黑契丹	Qara-khitay
黑汗王朝	Qarakhanid
黑衣大食	Abbasid
黑扎列	Hezarey
痕宁	W. Henning
胡赛因苏菲	Husain Sufī
呼拉珊	Khorasan
花剌子模沙	Khwarazm Shah
花剌子模	Khwarazm(Choramia)
花剌子米	Khwarazmī
霍占德	Khojand
和卓阿赫拉尔	Khoja Ahrar

洪吉拉特	Qungrat
洪扎	Hunza

J

贾尼别克	Janibek
基奥尔—卡拉	Giaur-qala
基拉金—乞勒布尔吉	Gilakin-Chil-burj
吉兰乌提	Jilan-uti
吉札克	Jizak
菊尔汗	Gurkhan
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K

喀布尔	Kabul
卡尔希	Qarshi
卡尔迷纳	Karmina
卡里马提	Kalimati
卡什卡河	Qashka-Darya
卡塔—库尔干	Katta-Qurghan
卡特宛	Qatvan
柯提	Kāt
海都	Khaydu
开胡斯饶	Kaykhusrau
开塔克	Kaytak
坎巨提	Kanjut

克里亚施拖尔内	Klyashtorniy
克赛尔克斯	Xerxes
克兹尔古木	Qizil Qum
克普恰克	Qipchaq
可敦	khatun
库卜拉维	Kubravī
库尔	Kur
库尔德斯坦	Kurdistan
库兰巴西	Qulan-bashi
库木	Qum
屈底波·依本·穆斯林	Qutayba ibn Muslim
库特布	Qutb

L

老兀龙格赤	Kuna-Urganch
列依	Rayy
鲁布鲁克	Rubruquis
鲁达几	Rūdakī
路易十四	Louis XIV

M

马尔噶朗	Marghinan
马非奥波罗	Maffeo Polo
马可波罗	Marko Polo
马哈木德	Mahmud
马合木德·牙剌洼赤	Mahmūd Yalavach

马吉德阿丁	Majd al-Din
马里克桑加尔	Malik Sanjar
马拉坎大	Maracanda
马尔	Marr
马思忽惕别克	Mas'ud-bek
马赞达兰	Mazandaran
麻扎尔	mazar
芒吉特	Mangit
麦斯武德	Mas'ud
梅尔基	Merki
谋尔夫	Merv
莫古勒	Moghol
莫古勒斯坦	Moghulstan
摩尼教	Manichaeism
蒙哥	Mönke
孟朝	Ming
蔑尔乞惕	Mergit
米尔·阿里·希尔·纳瓦依	Mir Alishir Nawayī
木巴剌克沙	Mubārak Shah
木哈马特	Muhammad
木干	Mughan
木尔哈卜	Murghab
穆罕默德	Muhammad
穆卡达西	Mugaddasi

N

那加尔	Nagar
纳狄尔·穆哈买德	Nādir Muhammad
纳吉姆阿丁	Najim al-Din
纳赫沙普	Nakhshab
纳林河	Narin-Darya
纳曼干	Namagan
乃蛮	Nayman
尼可罗波罗	Nikolo Polo
尼扎木·阿勒木勒克	Nizam al-Mulk
奴尔—阿塔	Nūr-Ata

P

庞培	Pompey
波洛维茨	Polovtsian
匹失培克	Pishpek
普莱卜兰克	Pulleyblank

Q

契丹	Khitay
乞尔乞克	Chirchik
乞马克人	Kimaks
七河	Semirechye
奇木肯特	Chimkant
旭烈兀	Hulagu

怯伯	Kebek

R

热海(伊塞克湖)	Issik-kul

S

萨得尔	Sadrs
萨尔	Sarre
萨尔卡迷失	Sarikamish
萨尔特	Sart
萨里科勒	Sarikol
萨莱乞克	Saraychik
撒马尔罕	Samarkand
萨尔塔克台	Sartaqtay
萨曼朝	Samanid
萨曼胡答特	Sāmān Khudēt
萨珊朝	Sasanid
萨土克布格拉	Satuq Boghra khan
萨乌兰	Sauran
塞尔柱	Seljuk
塞流克朝	Seleucids
塞流克亚城	Seleucia
塞人	Saka
赛福丁·巴哈尔则	Sayf al-din Bākharzi
赛依德·巴拉卡	Sayyid Baraka

赛依德	Sayyid
赛里木湖	Sayram-Nor
色格那克	Sighnaq
斯米尔纳	Smyrna
斯基泰人	Scythian
苏丹马赫穆德	Sultan Mahmūd
苏丹桑加尔	Sultan Sanjar
苏丹巴布尔	Sultan Babur
苏丹尼亚	Sultania
苏菲派	Sufis
苏那克—库尔干	Sunaq-Qurghan
沙	Shah
沙尔坎特	Sharkand
沙赫鲁黑亚	Shahrukhiya
沙赫里萨布孜	Shahrisabz
沙拉基亚	Sharakiya
沙姆斯丁·库拉勒	Shams al-Din Kulāl
舍班尼	Shibani
舍依赫	Shaykh
舍依赫阿拔斯—瓦里	Shaykh Abbās-Valī
设拉子	Shiraz
什叶派教徒	Shi'it
蜀鲁克塔帕	Shulluk-Täpä

T

塔克什	Täkish
塔吉克	Tajik
怛逻斯(塔拉斯)	Talas
塔尔奇	Talqi
汤姆逊	V. Thomsen
忒耳迷	Tirmidh
帖木耳	Timur
铁木真	Temüchin
铁木尔马立克	Timur-Malik
突厥斯坦	Turkestan
土拉伯克哈尼姆	Türäbek Khanim
土曼	Tümän
吐尔干	Turkan(Türkän)
吐尔盖	Turghay
吐克什	Tükish
吐火罗	Tokhar
吐火罗斯坦	Tokharistan
秃黑鲁帖木尔	Tughluq Timur
突厥	Turks
托钵僧	darvish
托干	A. Z. Togan
托格鲁勒	Toghrul
托克马克	Toqmaq

拖雷	Tului
通卡特	Tunkat

W

瓦达尔	Vadhār
魏斯巴赫	F. N. Weissbach
斡尔吉纳	Orqina
斡耳朵	Ordu
窝阔台	Ögedey
乌尔古特	Urgut
乌浒水	Oxus
乌鲁斯阿米尔	Ulus amir
乌鲁格别克	Ulughbek
乌兹别克	Uzbek
乌孜干特	Uzgand
乌兹波依	Uzboy
兀龙格赤	Urganch
兀巴依都拉	Ubaydullah

X

锡尔河	Syr-Darya
希尔达尔	Shīrdār
希罗多德	Herodutus
希瓦	Khiva
新教徒	Huguenots

兴都库什	Hindu-kush
粟特	Soghd
粟特人	Soghdian
索格底亚那	Soghdiana

Y

哌哒	Haphtal
雅非特成分	Japhetid
亚历山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亚述	Assyrian
雅萨	Yasa
养夷	Yangi
叶尼塞	Yenisey
叶莱茨	Yelets
英吉沙	Yangi-Hissar
亦都护	Iduqut
伊比利安	Iberian
依不拉音汗	Ibrahim Khan
依宾·阿勒阿提尔	Ibn al-Athir
依宾·法德兰	Ibn Fadlān
依宾·巴图塔	Ibn Battuta
依宾叫合勒东	Ibn Khaldun
伊赫西德	Ikhshīd
伊兰人	Iranian

伊列克汗	Ilek-khan
伊宁	Qulja
依斯马依勒	Ismayil
伊斯兰法	Shari'at
伊斯非加普	Isfijab
尤素甫·萨卡吉	Yūsuf Sakkāki
尤克拉提德	Eucratides
裕勒都司	Yulduz
玉素甫	Yūsuf
约翰大主教	Prester John
药杀水	Jaxertes

Z

赞吉尔—萨莱	Zanjir-Saray
枣哈吉麻兰	Zohahak-i Mārān
扎拉夫尚	Zarafshan
扎剌依尔	Jalayir
扎兰丁	Jalal al-din
扎木哈	Jamukha
哲别诺颜	Jebe-noyan
占坎特	Jankent
占尼朝	Janid
赵将太傅	Cho-jang Taifu(?)
术赤	Juchi
朱外尼	Juvani

附　录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摘译)

[俄]维·维·巴尔托里德　著
耿世民*　译

第一讲:关于突厥碑文,特别是鄂尔浑碑文(8世纪)及其研究成果

第二讲:突厥与邻近民族及其相互间之亲属关系和语言关系

第三讲:新疆之突厥化。745年乌古斯(突厥)汗国及840年回鹘汗国之崩溃。摩尼教、佛教和景教(基督教)以及东伊兰文化,特别是粟特文化的传入

第四讲:伊斯兰教在突厥中的传播——突厥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伊斯兰教作为全民族宗教到处胜过景教和佛教

第五讲: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11世纪)及其关于乌古斯部和其他西突厥部之材料。从伏尔加河到中国突厥文化的共同性

第六讲:突厥向西方、西南方的迁移及其进入伊朗文明世界

第七讲:蒙古人侵前突厥对西方和东方的文化关系

第八讲:马赫穆德·喀什噶里以后时期花剌子模的繁荣。成吉思汗的崛起

第九讲:蒙古统治下的突厥斯坦。蒙古系诸汗国之形成(金帐汗国)

第十讲:中亚突厥和突厥化了的蒙古诸汗国的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诸汗国及其文化之衰落

第十一讲:突厥斯坦之内乱和文化上的衰落。帖木耳时代。帖木耳的为人及其汗国的组织

第十二讲:近代以前中亚突厥的科学和文化生活

第一讲

9 鄂尔浑文碑铭[1]中尚有一些地方研究得不够。如描写阙特勤(Kül-Tigin)武功的一段,提到敌人向他发射了一百多箭,射中了他的 yaryqynda yalmasynda。汤姆森释为"射中了他的甲胄和(半)月形宝石装饰物"[2]。这里汤氏把 yalmasynda 释为两个词,即 ay almasynda"(半)月形宝石"(见舍德译自丹麦文的汤氏生前最后的译文:《蒙古古代突厥碑文译文和导论》)。

13 许多突厥官号并不是突厥语。shad"杀"(由汗室成员担任某一部之首领的称号)应来自伊兰语,它与波斯语中的 shah"沙"同源。

伯希和(P. Pelliot) 1925 年秋在列宁格勒做报告,认为以 t 结尾的(突厥)称号(耿按:如 tigin"特勤"的复数 tigit 等)为突厥采自在其以前的 Avar 人(即汉文之柔然, 又称蠕蠕)。伯氏并认为柔然为蒙古语系的民族。他又认为突厥人的国家制度也来自柔然。

14 芬兰学者多耐尔(Donner,参见《北亚突厥字母来源考》, 载《芬兰—乌古里学报》,XIV,赫尔辛基,1896 年)发现鄂尔浑文与安息(Arsakidisch)钱币上的铭文很相似(安息王朝于纪元前 3 世纪到纪元后 3 世纪之间统治伊朗)。法国伊兰学家勾求(Gauthiot)则认为叶尼塞—鄂尔浑字母可能源自粟特文的一种更古的形式。

17 摩尼教是一种试图把祆教(即拜火教)思想同基督教、佛教融合在一起的宗教。

第二讲

欧洲学者认为汉文史籍中的“奚”等于鄂尔浑突厥文献中 24
Tataby。因为汉文文献中常一起提到契丹与奚,而鄂尔浑文献则常一起提到契丹与 Tataby。

伯希和在列宁格勒所做的一次报告中,谈到汉文文献中存有 25
一部鲜卑语字典。据此书,鲜卑语应为突厥语(舍德氏注:伯氏最近谈到这一问题时是这样说的:“我不相信鲜卑是通古斯人,但我也不能肯定其为突厥人或蒙古人”,见《亚洲学报》,1934[224],35 A. 3)。

蠕蠕一名不见于鄂尔浑文献。有人认为鄂尔浑文献中在叙述 26
过去历史时只出现一次的 Par-purum 或 Apar-apurum,即指此族。汤姆森氏在其生前最后译文中把这个词译为两个民族名,并在后面分别加上问号(舍德注:Purum 指罗马,已为伯希和在 1914 年解决)(耿按:即汉文中之“拂林”)。

表示“萨满”(Shaman)意义之词(Qam)不见于鄂尔浑文献中 27
(在叶尼塞文献中除见有 Tengri“上天”一词外,尚见有 bel 一词,用来表示萨满崇信之神)。

阿拉伯地理学家指出,突厥语各方言之间(从南俄草原的彼 29
切涅克 Peicheneg 到中国)都很近似,只有伏尔加河中游的布勒加尔人(Bulgar)和哈扎尔人(Hazar)的语言特殊,其他突厥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的语言也不同于芬人的语言。现代楚瓦施(Chuwash)语即为这样,它属突厥语,但不论是突厥人抑或芬人都听不懂这种语言。伏尔加河在布勒加尔人和哈扎尔人那里都称做 Etil。这个词在楚瓦施语中为“河流”之意。为此,突厥学家一般

30 认为楚瓦施语为中古布勒加尔人和哈扎尔人语言的残留。
31

关于楚瓦施语之性质曾有过长期的争论。拉德洛夫曾认为它为突厥成分与芬语成分混合的产物。之后,其他学者认为楚瓦施语保留了其他突厥方言早已失去的古代发展阶段的残余。鲍朴(N. Poppe)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认为楚瓦施语虽像突厥语和蒙古语一样属于同一语系(阿尔泰语系),但既不属于突厥语族,也不属于蒙古语族,而是属于该语系中独立的第三支语言(《苏联科学院通报》,1925,页 233 和页 405 以下)。经过讨论,鲍氏同意下述意见:楚瓦施语是一种突厥语,但它是作为这样一个古代语言发展时期的残余,即当时蒙古语已从突厥语中分离出去,而现代我们所知道的诸突厥书面语和方言的主要特点尚未形成。

如果这个语言学的结论能成立,那么这对历史学具有重大意义。布勒加尔人和哈扎尔人虽未在 6 世纪以前被提到,但无疑他们在 6 世纪突厥汗国建立前某个时期,就已到达伏尔加河流域。还有一点也是无疑的:他们在这一地区引起了与匈奴人名字有关的民族大迁徙运动。早在公元 2 世纪,即当(希腊)地理学家普拖雷米(Ptolemäus)时代,匈奴已出现在离伏尔加河不远的地方。Etil 一名(即楚瓦施语及一般突厥语对伏尔加河的称呼)那时尚未出现,但 Yayyq 河(耿按:即乌拉尔河)那时就已经叫这个突厥名称了,不过它在普拖雷米著作中写成 Daix。词首的 d 在当地语言中变 y 显然是后来的事,即普拖雷米时代以后的事。6 世纪拜占廷人提到突厥人的葬礼写作 dochia,它在鄂尔浑文献中写作 Yogh。但这一点不合现代楚瓦施语的语音规律,楚语也像(东西伯利亚)雅库特语一样,其他突厥语词首的 y 用 s-表示之(耿按:Daix,dochia 二古词对研究哈萨克语词首的 j 的历史来源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早在鄂尔浑文解读之前(耿按:鄂文在 1893 年 12 月 15 日为 34
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氏首先解读),拉德洛夫就认为 6—8 世纪之突厥属于乌古斯(Oghuz)部(参见拉氏刊布的《福乐智慧 Kudatku-Bilik》,导言,页 LXXV Ⅱ)。后来碑文解读后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乌古斯或突厥分为几个部分:突利斯(Tolis)和达头(Tardush)[3]以及西部的突骑施(Türgesh)。除乌古斯外,还有其他突厥人(即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词的含义):葛逻禄(Qarluk),回鹘(Uighur)及黠戛斯 (Qirghiz)。但不能证明后面这些族也自称突厥。Türk 这个词用作整个突厥人的总称(即现在的含义),似见于伊斯兰著作。阿拉伯人注意到,7、8 世纪他们与之打交道的许多突厥族都说同样一种语言,并称他们为"突厥"(Turk)。随着皈依伊斯兰教,突厥族人也开始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到现在也不是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族都这样称呼自己和其语言。在伊斯兰教范围外,突厥这个词很少使用。例外的情况为(突厥)佛教文献,那里称其语言为 Türk-Uighur 语(türk-uighur tili,拉德洛夫刊印本回鹘文《金光明经》,Ⅰ—Ⅱ,圣彼得堡,1913,页 V)。

除汉文史料外,11 世纪波斯史家戛尔狄泽(Gardīzī)根据我们 35
不知道的一个没有流传下来的史料,也说柯尔克孜人为赤发皙肤。

有些现在说突厥语的民族原来并不是突厥人。其中包括鄂尔 37
浑文献中提到的 Az (阿热)族。这个族常和黠戛斯人一起被提到。从前人们怀疑它应为族名。我一开始就持这一观点。汤姆森氏现在也同意这一意见。他在他的(鄂尔浑碑)最后译文中注为"不明来源之一族"。在叶尼塞河下游,在吐鲁汗(Turuhan)县有俄人误称为 Yenissei-Ostyak 人的残余。而实际上他们与居住在鄂

毕河(Ob)的 Ostyak 人(属芬人一支)无关。一般说,他们也属于乌拉尔—阿尔泰系。他们称自己为 Kott 或 Assin(关于其语言 1845 年 Castrén 曾研究过。之后 Anuchin 也研究过)。Yenissei-Ostyak 人可能如 Samoyed 人一样,一度曾占有广大地区。鄂尔浑文献中的 Az 也可能属于这一部族。

38 黠戛斯人当时(指鄂尔浑突厥时代)已具有政治意义。他们有自己的可汗。回鹘(古代维吾尔)在鄂尔浑碑文中只在个别地方提到过。但无疑当时这个族已存在。回鹘首领称 Eltebir(颉利发),而不是如黠戛斯人那样称可汗。当时有所谓 Elte-birlik budun 与 Qaghanlik budun(耿按:即拥有颉利发的百姓和拥有可汗的百姓)之分。葛逻禄(Qarluk)人中也没有可汗。

粟特语借词早在鄂尔浑碑文中已使用,并且以后为突厥人及蒙古人广泛使用,例如"可敦"(Qatun)等词。碑文中在一个地方提到粟特人(Soghd)的同时,提到 Bercheker Bo- karaqulus 人(读法可能有问题)。马夸特(Marquart)译为"粟特之伊兰人和布哈拉人"(见该氏《古代突厥碑文年代考》一文,页 32 以下)。ulus 一词用作"人民"之义不见于碑文(虽然它用于古代宗教文献中)。Pārsī(波斯)一词变为 Bercheker 在语言学上讲不通。但马氏的这种解释(虽然后面加有问号)已为人们所接受。

39 东西突厥斯坦原来都不是突厥人的住地,两地都是逐渐突厥化的。当地居民的突厥化过程是和突厥人(从游牧转向)定居化联系在一起的。两地(这个过程)都是从东向西发展,结果也一样。新疆先是在九姓乌古斯(Tokuz Oghuz)汗国(耿按:指突厥汗国),之后在回鹘汗国崩溃后,接受了大批的突厥人。balyk(城市)一词和 Beshbalyq(别失八里)早在鄂尔浑碑中已有。11 世纪马·

喀什噶里所著《突厥语大词典》(耿按:下面简写为《词典》)中 balyq 一词释为"黏土"。城市一词来源于其建筑材料。这正如阿拉伯人管牧民为 ahl al-wabar(皮毛之人)、管定居民为 ahl al-madar(泥土之人)一样。当时住在别失八里的突厥人为拔悉密(Basmyl)人。是他们首先转入定居,并与当地原居民融合了。所以喀什噶里说拔悉密人不能算作纯的突厥人。

第三讲

以突厥—乌古斯(Turk—Oghuz)可汗名义写成的鄂尔浑碑文 41
中说,可汗的统治是巩固的,不受任何威胁。但可汗死后十年(745 年),就为回鹘人取而代之。在此早几年,乌古斯人的西支(西突厥)也在与阿拉伯人的斗争中失去其政治上的统一和可汗。

从汉文史料中知道西突厥分为十姓,五姓在伊犁河北,五姓在伊犁河南。鄂碑文称为 OnOq"十箭"。其中长时期以突骑施最强。西突厥最末几个可汗就出自此部。阿拉伯人当时主要是防止突厥人侵入文明区,没有深入草原进行征战。当时(西)突厥可汗的牙帐在楚河。西突厥可汗在与阿拉伯人斗争中的失败和死亡(在锡尔河),导致其汗国之灭亡。纷乱持续了一个时期。766 年另一突厥部——葛逻禄取代突厥—乌古斯人在楚河两岸的地位。

阿拉伯人征服中亚是在 705—715 年间。当时屈底波·依 48
本·穆斯林(Kutaiba ibn Muslim)是呼拉珊的总督。从鄂尔浑碑文 |
中知道,东突厥(汗国)一个短时期曾占有突骑施汗国,并用兵直 49
到铁门(Temir kapugh),即到达 Buzghala 关。当时这儿是粟特和吐火罗斯坦的分界线。

只是根据汉文史料我们知道,745 年在蒙古的突厥—乌古斯

汗国为回鹘所代替。回鹘可汗的驻地也在鄂尔浑河,即在后来蒙古人建立哈拉和林(Kara korum)城的地方。在回鹘可汗的驻地建筑了如其遗址所表明的、比蒙古时期规模还大的城市。回鹘汗国存在了近百年。840 年为黠戛斯人所败,他们迁居新疆并转入定居的城市生活。在新疆的东部尽管民族变换了,但第一批突厥定居民拔悉密人中形成的传统被保持了下来。鄂尔浑文献中提到拔悉密王的称号为亦都护(Idukut"圣福、神圣的陛下"之意。突厥语中 Kut 一词用于统治者时,表示欧洲 Majestät(陛下)之意。之后,13 世纪该地区的回鹘王以 Idikut 的形式仍保有这一称号。

迁移到新疆去的一部分蒙古草原的突厥—乌古斯人,在汉文史籍中称为沙陀,即草原居民之意。这部分突厥人在 9 世纪初尚占有别失八里一带。之后可能是在其西部同族人的压力下,东移到中国内地。在那里他们于 9 世纪下半期积极参与了中国的内乱,并保持了中国皇帝的王位,10 世纪下半期领有中国西北部的诸小王朝中,也有出自沙陀的王朝(关于三个沙陀朝代可参见沙畹《西突厥史料》)。

9 世纪下半期,回鹘人被黠戛斯人从蒙古草原逐出后,来到别失八里,并在那里住下。这是发生在 860 年左右的事。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回鹘王国,直到蒙古时代——14 世纪。另一部分回鹘人到了甘州。在此之前不久,中国与藏人争夺该地。11 世纪时,藏人的一部——西夏(Tangut)从回鹘手中夺得该地,并建立了西夏国,后为蒙古所灭。那里的回鹘人虽从此失去政治上的重要性,但一直到现在仍留有其后裔(耿按:即裕固族),并保存了自己的语言(一种古代突厥语)。只有在这部分甘州回鹘人中保存了鄂尔浑文献及回鹘文献中的古代计数法。

回鹘人也如突厥—乌古斯人一样,留有一些历史碑铭,但保存 50
得最好、最有价值的仅为其汉文部分(耿按:指《九姓回鹘可汗碑》)。那里证明了汉文史籍中所说的,回鹘人不像突厥—乌古斯人那样仍信仰萨满教,也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而是接受了一种来自西方的宗教——摩尼教。也像在此之前的佛教和景教一样,摩尼教先在粟特人中传播,之后该教利用这个民族在商业上的活跃来传播其宗教。与汉文长篇碑文一起(那里谈到了回鹘人皈依摩尼教的情况),还发现该碑的粟特语部分(可惜很残破)。从该碑文中我们知道,回鹘人是通过粟特传教士接受了摩尼教的。汉文史料告诉我们,粟特摩尼教僧不是直接从粟特地方来到游牧的回鹘人那里,而是当762年回鹘可汗(耿按:指牟羽可汗)率军到中国内地助平叛乱时才与他们相遇。这说明对西方民族来说,与中国之贸易同与游牧民贸易同等重要。只是在中国内地及通向那里的商路上建立了贸易居留地后,粟特人才能对突厥游牧民起巨大影响。就粟特人在宗教上对突厥人的影响来说,他们比新疆原印欧居民的影响大。在库车和和田地区发现的两种古代印欧语中[④],只有佛教文献(耿按:后来也发现有古代库车语的摩尼教文献)。而在粟特语文献中(这种语言使用的地理界限尚不能确定。似乎在喀什及其附近城镇也讲这种语言),除佛教的外,尚有摩尼教的和景教的。在新疆发现的古代突厥语文献中也见有这三种宗教的东西(翻译作品和原著)。

回鹘接受摩尼教在其历史上具有巨大意义。回鹘人首次从萨 51
满教转入这一根据伦理原则建立的宗教。萨满教认为甚至杀人也能给人们的来世带来利益。摩尼教则认为不仅杀人是不允许的,就是杀生和食肉也是不允许的。新旧宗教的教义区别也为回鹘人

所认识。如碑文中说:“从前食肉的民族现成为食粟的民族,从前杀人的国家现在成为积善的国家”(耿按:汉文原文为: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用粟特文、汉文及残存字数不多的用突厥语鄂尔浑文写成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的发现(属9世纪上半期),说明一种新文字即回鹘文在回鹘人中的传播(耿按:这点尚待研究)。摩尼教徒从巴比伦(现伊拉克)带来了他们的文字(耿按:即摩尼文),但同时也使用粟特民族的文字。

52
|
53

回鹘文来源于粟特文是无疑问的。这一点也为伊斯兰作者所提到。关于这一点,13世纪初伊斯兰作者法赫拉丁·木巴拉沙·买尔外鲁狄(Fahrad-Dīn Mubārak-Shah Merwerrūdī)说的很详细。对突厥语来说,用回鹘文代替鄂尔浑文是一种退步。回鹘人离开蒙古草原时,也把摩尼教带到了新疆和甘州。可能摩尼教在更早一些时候,即在回鹘西迁新疆以前,就已在住在那里的突厥—乌古斯或其后继者中传播。这一点似乎也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指出。

10世纪是阿拉伯地理学的古典时期。有许多详述伊斯兰世界和简要记述从伊斯兰地区通过突厥住地到中国的商道情况的地理学著作留存下来。据阿拉伯地理书记载,从里海到中国的广大地区是在三个突厥族的统治下:①古兹(Ghuz)即乌古斯,住在从里海到锡尔河中游一带。②葛逻禄,在费尔干以东,在其境内要走二十天。③托古兹古兹(Tughuzghuz)或九姓乌古斯(Toquz Oghuz),位于葛逻禄以东,直到中国。

上述关于突厥人居住地区的记载,依汉文史料新疆东部已属于回鹘居住的时代。即使对最早记载这条路线的阿拉伯作者依本·霍尔达德别赫(Ibn Hordādbech)来说,我们也怀疑他是否写

于862年,即回鹘西迁新疆的前后。结论是:汉文史料中的回鹘,阿拉伯史家中的托古兹古兹,指的是同一个民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托古兹古兹应读为托古兹古尔(Tughuzghur),即九姓回鹘(Tokuz Uighur)。但现在应放弃此说(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托古兹古兹条下的参考书)。把托古兹古兹读成九姓回鹘,也与阿拉伯史料相矛盾。依本·阿提尔(托林别尔格刊印本,XI,117)谈到西部古兹人源自托古兹古兹。塔拔里(Tabari,Ⅲ,1044)谈到820年后不久,托古兹古兹侵入位于今吉札克(Jizak)和霍占德(Hojent)城之间的奥斯鲁沙纳(Osrushana)省。由此可见,就连当时伊斯兰地区的直接近邻(不仅仅是新疆东部的居民)也被称做托古兹古兹。说明这点的还有一个事实:托古兹古兹人曾被俘虏到伊斯兰地区。土龙(Tūlūn,即 Ahmed ibn Tūlūn,埃及土龙朝建立者的父亲)即为一托古兹古兹人。

依本·霍尔达德别赫并没有亲自到过这些地方,而是使用以 54
前的材料。他和雅库特(Yākūt)一样,都是根据塔明·依本·巴赫尔(Tamim ibn Bahr al-Mutawwa'i)的报导,而后者曾亲历这些地方(Yakūt,Mu'jam,Ⅰ,840 r)。可惜雅库特未说及塔明旅行的时代。根据其书中的其他事实,应认为既不在760年前(当时七河及新疆西部为葛逻禄人统治),也不在9世纪初以后。汉文史籍记载沙陀突厥(他们源自鄂尔浑碑中之突厥,即源自托古兹古兹)曾从别失八里东迁至中国内地。看来,是当别失八里仍住有托古兹古兹人时,阿拉伯人知道了这一地区。并且以后仍使用这一名称呼该地区的居民,而不知道托古兹古兹人已东迁,取代他们的是另一突厥民族(耿按:指回鹘)。

表明托古兹古兹(九姓乌古斯)开始时并不表示回鹘而指沙

陀突厥的，为马苏底（Mas'ūdī，《金牧场》，Ⅰ，页305以下）关于9世纪下半期中国内乱以及托古兹古兹（耿按：汉文史料为沙陀突厥）帮助中国皇帝把这次内乱平息下去的故事。这是一件不仅见于汉文记载，而同时也见于阿拉伯史籍中的历史事件。阿拉伯人把它归之为Tughuzghnz，中国则归之为沙陀突厥。

在塔明旅行（中央亚细亚）时代，托古兹古兹人地方已有祆教徒和摩尼教徒。一般说，前者在农村居优势，后者则在主要城市居优势。显然，后来摩尼教有所发展。阿拉伯人后来说，所有托古兹古兹人都是摩尼教徒。死于869年的阿拉伯作者贾希孜（Jāhiz）说，托古兹古兹在皈依摩尼教之前，曾为一勇敢善战的民族，并且在与葛逻禄人的战斗中，即使在处于少数的情况下，也常常是他们获得胜利。但在皈依摩尼教后，则逐渐失去战斗力。马夸特（《东欧和东亚研究》，莱比锡，1903，页92及95）认为贾希孜这番话是指游牧的回鹘人而言，并认为这点表明蒙古高原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灭亡的消息也传到了阿拉伯人那里。马氏引用的贾希孜材料明显不是指与黠戛斯人的战争，而是指同葛逻禄的战争。也不是指发生在蒙古的事件，而是指发生在新疆的事件。这一点还说明阿拉伯史料中的托古兹古兹早在回鹘人西迁新疆前就已居住在那里了。回鹘人西迁发生在贾希孜死前三年。从贾希孜的记载可以看出，托古兹古兹人已住在那里很久。阿拉伯人在那里接触了他们，并且同其西邻葛逻禄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阿拉伯人在书本史料的影响下，当那里已住有回鹘人时，仍继续认为新疆东部住的是托古兹古兹人。保留在阿拉伯史料中的关于这个族（指回鹘）的少数材料中有10世纪作者马苏底和纳狄木（an-Nadīm）的史料。重要的是，回鹘汗不论对中国皇帝或伊斯兰教萨曼尼朝阿米尔都

能代表其同教人的利益。据纳狄木的记载(《科学知津》,页337),当回鹘汗听到萨曼尼统治者要迫害撒马尔罕城的摩尼教徒时,他命人通知后者说:托古兹古兹地区的伊斯兰教徒远比萨曼尼国中的摩尼教徒为多。如果对那里的摩尼教进行迫害,就将加以报复。因托古兹古兹汗之威胁,萨曼尼朝才停止了对摩尼教徒的迫害。

新疆发现有用波斯语(耿按:应为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汉语写成的摩尼教文献。这就给我们首次提供了依据摩尼教自身留下的文献来研究该教的可能性。在此之前,人们只是从基督教和伊斯兰作者的论辩著作中认识该教。摩尼教像佛教一样,努力于在广大群众中传教。其苦行主义的教义是针对为祆教所神秘化了的阶级系统的,这点特别表现其在萨珊朝时代在伊朗存在的最后形式中。为此,摩尼教文献都写得很通俗,易为下层人民所懂。在当时所有波斯写本中,只有摩尼教文献中所有语词用波斯语书写,不用闪语来源的表意符号。而我们知道,在所谓帕赫列维文(Pehlevi)(耿按:也称中古波斯文)写本中是充满这种表意符号的。这些表意符号也为波斯基督教文献所使用,即许多词读音是波斯语,但书写时则用表意符号代替这些波斯语。同样,突厥摩尼教文献的语言也通俗易懂。突厥语摩尼教文献的代表作"忏悔词"(Chuastuanift),依拉德洛夫的意见,在语言的纯洁方面超过了所有现存的突厥语文献。 56

从该文献我们知道,摩尼教近于佛教,对佛教圣物之亵渎也如对摩尼教圣物亵渎一样,要受到惩罚。这两种宗教的近似及其相互影响也可从术语上看到。为此,很难确定摩尼教和佛教二者中哪一个先在突厥人中传播。burhan 一词,突厥人用来表示佛和佛

像。它在为摩尼教借来表示摩尼教的圣人。另一方面佛教徒借入了摩尼教词 nom 来表示其经书,这个词现在仍为蒙古人所使用。摩尼教徒和佛教徒也像后来的景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他们在突厥人中进行布教时,努力用突厥语创造宗教术语。但这一点有时做不到。在萨满教中已有诸如"神"、"鬼"等词,但表示"天使"这一概念的词则为萨满教所无。为此,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僧侣只好借用波斯语的 firishte 一词。突厥语中无"天使"这个词,这一点也为马·喀什噶里所指出(《词典》,Ⅲ,页 9)。阿拉伯作者不太能区分开摩尼教与佛教。为此,一些作者如贝鲁尼(al-Bīrūnī)说摩尼教传播得很广。另一方面,马苏底明确指出,除托古兹古兹外,突厥人中没有摩尼教徒(《金牧场》,Ⅰ,页 288)。这里托古兹古兹显然是指回鹘人。之后,大概在 10 世纪之后不久,摩尼教在回鹘人中让位于佛教和景教。但缺乏说明这一过程如何和何时发生的史料。在 11 世纪下半期喀什噶里的书中没有证明当时摩尼教仍存在的材料,虽然喀什噶里比别人更好地了解回鹘汗国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是惟一的一个不是根据书面材料,而是根据个人的考察记载中亚的阿拉伯语作者。所以,他不用托古兹古兹称回鹘,而用回鹘(Uighur)这个词。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用托古兹古兹称回鹘只是根据书面传统,而在当时居住在新疆的突厥人中并不存在这个词。

马·喀什噶里时代,回鹘人已不是摩尼教徒,而是佛教徒和景教徒。而其西邻这时已处于伊斯兰教的影响下了。

第四讲

60 但佛教(在中亚)也不是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模仿佛教的

vihāra(毗诃罗)(耿按:寺院之意)产生了伊斯兰教的高等神学院"买德莱赛"(medrese)。这种学院最早见于伊斯兰世界东部边地。之后11世纪时才出现在伊朗的西部和巴格达——哈里发的首府。在佛教的影响下在巴里赫(Balh)及其周围出现了许多买德莱赛。

10世纪时产生的买德莱赛,就现在所知,只存在呼拉珊和河中地。它曾是传播伊斯兰教的强大根据地,萨曼尼朝一反过去伊斯兰统治者的政策,对草原采取了攻势,893年怛逻斯(Taraz或Talas,今之江布尔城)被伊斯兰教势力占领后,该地的大教堂(kirche)被改为礼拜寺(纳尔沙黑:《布哈拉的地理和历史插述》,舍费尔编译本,页84)。这点说明,在伊斯兰教之前基督教在这里已有传播。

粟特人在伊斯兰教之前对突厥草原的拓殖起过很大的作用。当伊斯兰教成为河中地居民的宗教时,由伊斯兰教徒继承了粟特人的事业。这样,在锡尔河下游产生了三个伊斯兰教城市:占德(Jend),胡瓦拉(Huvāra)和羊吉坎德(Yangykent,新城之意,阿拉伯语为al-Qarya al-hadīta,波斯语为Dih nū,突厥语为Yangy kent,Kent一词为突厥人借自粟特语)。其中只有羊吉坎特的位置可以确定,其遗址现称为占坎特(Jankent)。萨曼尼朝占领的怛逻斯城及和平拓殖者建立的羊吉坎特城在中央亚细亚商业活动上占有重要位置。从那里有商道通向额尔齐斯河,通向不见于汉文记载的奇马克(Kimak)人的地方(突厥语应为Kimäk,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Ⅰ,1085页),奇马克人中分出了克普恰克(Qipchaq)部(同上书,Ⅱ,1099页)。

哈扎尔国一直到其灭亡信犹太教。哈扎尔可汗及其贵族约在 65

8 世纪末期接受该教(即当哈龙拉希德 Harūn ar-Rashīd 时代)。

73 可惜只在巴格达编年史(首次见于依本·米斯卡魏希书中,参见《阿巴斯哈里发的崩溃》,Ⅱ,页 181 原文,Ⅴ,页 196 译文。其原始史料,像依本·米斯卡魏希书中其他情况一样,来自已失传的塔比特·依本·希南的著作,那里述及回历 295—363 年间之事)中提到 960 年有 20 万帐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但不见于写成于萨曼尼朝的著作和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中。这一点说明这一史事很不可靠。那里也未说明该突厥族的名称和住地。只是在后来的中亚传说中[其最早变体见于幸而保存下来的 14 世纪初的著作中(贾马勒·卡尔西著作的原文见巴尔托里德:《突厥斯坦》,Ⅰ,页 130 以下),那里又引自 11 世纪的另一著作],说是突厥汗萨土克·布格拉汗·阿不达勒克里木(Satuk Boghra Han Abdakarim)首先率其人民皈依伊斯兰教(此人是 10 世纪末侵占萨曼尼朝并在中亚建立伊斯兰突厥王国,即黑汗王朝的王室成员)。就在这个最古的变体中,关于布格拉汗及其接受伊斯兰教的记载也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后来在中亚广为传播的《布格拉汗传 Tezkire-yi Boghra Han》一书中,这种神话成分就更多了。

74 不知道这个萨土克布格拉汗所出之王朝为哪个突厥部落所建立。在俄国从格里戈里叶夫(Grigoriev)以来,按照该布格拉汗的另一称号称之为黑汗王朝。在欧洲则常使用依列克汗(Ilek Han)这一称呼。但依烈克一词并不经常与汗的称号一起使用。也不是这个王朝的所有汗都称自己为依列克。这个问题在马·喀什噶里的著作发现后仍未能解决。因为马氏写作时,黑汗王朝早已存在,并且他也很少谈及过去的事。

在 960 年后写作的阿拉伯地理学作者也不知道萨曼尼王朝的

东边有个伊斯兰突厥王朝。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知识都来自书本所致。除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给我们留下一个(突厥部落分布的)简单轮廓(葛逻禄住地在古兹和托古兹古兹之间)外,在另一些阿拉伯史料中则情况更复杂。其中有两种波斯文著作保存了下来,一种为回历372=公元982—983年的佚名著作的《世界疆域志》,另一种为公元1040年后成书的嘎尔狄泽的历史著作。这两种著作中的材料也不一致,也和马·喀什噶里书中关于突厥部落划分材料不一致。

从《世界疆域志》和嘎尔狄泽的著作中,我们知道这时一部分 75
按10世纪阿拉伯地学记载为葛逻禄人的住地,已为样磨(Yaghma,托古兹古兹的别部)所占有。样磨占有喀什和纳林河(Narin,锡尔河源流之一)以南的七河地区的一部分(但贾希孜的托古兹古兹接受摩尼教后,在与葛逻禄斗争中常是后者获胜的说法与此有矛盾),黑汗王朝与喀什有密切关系。汗的驻地称做Ordukent("王都"之意,这一点也为马·喀什噶里谈到,见《词典》,Ⅰ,页288)。这样就自然得出如下结论:占有喀什的部族也就是黑汗王朝的建立者。也就是说,是属于托古兹古兹或回鹘一部的样磨建立了黑汗王朝。马·喀什噶里关于这一点谈得不详细,他只说样磨是他那个时代住在更靠北,即伊犁河谷的部族名。马氏还谈到在该河谷尚住有其他突厥族,即土赫色(Tuhsi)和处月(Chigil,同上书,页330)。而这些族依《世界疆域志》和嘎尔狄泽则靠南一些。据波斯作者,土赫色在楚河以北地区,而处月在热海北岸。从那时起被忘记的处月一名,在11世纪时用来指称许多突厥部落。从塞尔柱苏丹马立克沙(Melik Shah)征略河中地的故事中,我们知道人们认为黑汗王朝的军队由处月人组成。按马氏的说法,乌

古斯人称从阿姆河到中国的所有突厥部落为处月。这一点说明处月族在中亚政治上的意义。黑汗王朝可能出自他们。但我们在马氏书中找不到有利于这一假设的材料。他是这样解说处月一词在乌古斯人中含有的意思的:处月城(这里住有该部的一支)位于怛逻斯附近,乌古斯人早就知道这是最靠西的属于东突厥的城市之一。另有两支处月人住在喀什附近两个村子和伊犁河谷,即住在库牙斯(Kuyas)城地区(在蒙古时代,这个位于伊犁河南岸的城市曾因作为察合台及其后继人的首府而有名)。关于葛逻禄,马氏说他们为一游牧部落,人们称他们(也像称乌古斯人一样)为土尔克曼(Türkmen)(《词典》,Ⅰ,页393)。《世界疆域志》及嘎尔狄泽(这里写成哈鲁赫 Halluh)置葛逻禄人于伊斯兰地区的邻近处,即在怛逻斯之紧东边。属于他们的也包括一些新疆城市,其中有Penchul(汉文为温宿,即今乌什 Uch Turfan 附近)。《世界疆域志》一书说,这个城市位于葛逻禄地方,其统治者臣属于托古兹古兹。稍后该地为柯尔克孜人占有(据《世界疆域志》的记载,柯尔克孜人于10世纪已到达现在的住地。但这一点不见于其他史料)。按《世界疆域志》一书所说,喀什位于葛逻禄、托古兹古兹和柯尔克孜地区的交界处。关于葛逻禄往北移动的情况(正如处月和样磨一样)喀什噶里未谈到。但稍后当成吉思汗时代,我们知道伊犁河北已为葛逻禄的住地了。

77 这样,三个突厥部族——葛逻禄、样磨、处月——都有建立黑汗王朝的可能性,而且他们都为马氏所提到,但没有说哪一个比其他两个更近于黑汗王朝。有趣的是:人们把葛逻禄人称为土尔克曼(像称乌古斯一样)。关于这个词(首次出现在10世纪)的来源不清楚。来自波斯语的说法(即 Türk Mānend"像突厥人一样"。

这一说法也见于马氏书中)不一定可靠。不过明显的是土尔克曼人的体型不同于一般突厥人,而更近伊兰人的。

葛逻禄人比起乌古斯人来,更多受到伊兰文化的影响。在接受伊斯兰教前,他们比其他突厥人更接近伊斯兰文化。

12 世纪时,人们称七河巴拉萨衮(Balasaghun)城的统治者(出自黑汗王朝)为一土尔克曼人。这一事实有利于黑汗王朝可能出自葛逻禄部的说法。

关于巴拉萨衮城,波斯大臣尼扎木·阿勒·木勒克(Nizām al-Mulk,与马·喀什噶里同时代)有下列记载:该城早在 940 年已为一伊斯兰教城市,并因该城陷入异教徒手中进行了圣战。

有可能葛逻禄人比样磨人更早些接受了伊斯兰教。当样磨占有葛逻禄人地方后(其中包括楚河谷,巴拉萨衮城应位于这里),其汗也仿效葛逻禄人接受了伊斯兰教。但这一点尚有待于证实。

萨土克·布格拉汗(《伊斯兰百科全书》,Ⅰ,803)为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汗。他为喀什的统治者,其墓在今阿图什。据关于此汗的最古传说,他死于回历 344 = 公元 955—956 年。这一点与突厥人于 960 年接受伊斯兰教的史料有矛盾。而 960 年一部分突厥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记载见于巴格达史家塔比特·本·希南(Tabit b. Sinan)书(作于这个时代左右)中。这一说法(即 960 年)应比年代错误多的、传说色彩重的关于萨土克布格拉汗的传说更可靠些。 78

在 10 世纪,住在锡尔河下游的一部分乌古斯人也接受了伊斯兰教。

第五讲

79 关于喀什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一事,伊斯兰史家未留下任何可靠的记载。关于伊斯兰学者的传说提到一名叫卡里马提(Kalimātī)的神学家,大约在巴格达编年史说有许多突厥人接受伊斯兰教的年代(约960年),曾到过突厥汗廷(见萨木阿尼:《世系之书》,基普纪念丛书,XX,486)。但在关于布格拉汗的传说中并未提到这个神学家的名字(在较古的本子中根本没有提到什么世上的启示者),而是说布格拉汗在一次梦中受到安拉的启示才皈依伊斯兰教的(依本·阿提尔,XI,54)。在另一关于此事的故事中,代替这位神学家的为逃到突厥汗处的一萨曼尼朝王子,他被说成是布格拉汗的启示者。此外,那里有许多显然不符合事实的虚构的名字和日期,虽然这个故事是取自10世纪喀什历史家的未能保存下来的著作(耿按:指阿不达勒加菲尔的《喀什史》,巴氏:《突厥斯坦》,第一册[原文],页131)。

萨土克布格拉汗的驻地为喀什(《伊斯兰百科全书》,Ⅱ,844页以下)。他的孙子布格拉汗·哈龙·本·木萨(Bughrahan Hārūn b. Mūsā,《伊斯兰百科全书》,Ⅰ,803页以下)住在巴拉萨衮城(同上书,Ⅰ,639),并从那里出发占领了河中地。之后,喀什和巴拉萨衮常一起被提到,都是属于黑汗王朝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巴拉萨衮城对黑汗王朝具有意义,但在伊斯兰文献中很少提到它。也没有一个可以帮助确定其地理位置的路线图。10世纪地学家中只在马克狄西(Makdisī)的著作中(《阿拉伯地理丛书》,Ⅲ,27,517)见有此城之名(写成Walāsakūn),但也未指出其方位。《世界疆域志》和嘎尔狄泽都没有提到这个城市。可能巴

拉萨衮城以前叫另一个名字,并在9、10世纪的伊斯兰教地学家的路线图中以这个旧名字出现。作为楚河谷中的主要城市,阿拉伯和中国作者经常提到碎叶(Suyab)城。

关于巴拉萨衮城一词的来源尚不清楚。以前认为来自蒙古语 81
的 balghasun(城市)。此说现已无人支持。是否 bala = "童子"(耿按:如是,balasaghun 则为"童子将军"之意)。在突厥人中该城的另一名字为 Quz -ulush(《词典》, Ⅰ,60,ulush 为村子、城市之意)或 Quz Ordu[5](《词典》, Ⅰ,112)。Ordu 一词尚见于当时其他城名中。关于 quz(耿按:为"山的阴面"之意)一词,马氏在《词典》中未加解释。

巴拉萨衮城属于粟特人所建城市之列。它的突厥化过程在马·喀什噶里时代尚未结束。依斯非加普(Isfījāb)、怛逻斯和巴拉萨衮城居民说粟特语和突厥语。像鄂尔浑碑铭一样,《词典》也称粟特人为 Soghdak。按《词典》作者的说法,他们是来自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粟特地方的人。粟特人穿突厥人衣服并接受突厥人的习惯(《词典》, Ⅰ,319)。依斯非加普(在另一处说是怛逻斯)到巴拉萨衮城之间地区叫阿尔古 (Arghu)。这个名字不见于 82
其他史料。马氏说阿尔古一般指两山之间的隘路。显然阿尔古地区得名是因其位于亚历山大洛夫斯基山(楚河与怛逻斯之间的山脉)和楚—伊犁山脉之间。没有谈到巴拉萨衮城以东的粟特人。马氏时代,阿尔古地区的粟特人当然为伊斯兰教徒。没有谈到是否粟特人在突厥人之前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及他们在语言和衣着上成为突厥人之前,在文化上是如何影响突厥人的。

对新疆非突厥族的原定居民来说,也是这样。据马氏《词典》,他那个时代这些非突厥族居民仍存在,被称作坎加克人

(Kenjek,《词典》, Ⅰ,114)。这个民族不见于其他史料。当时坎加克人已突厥化,但仍保有其原来语言的残余(表现为一些词语和语音特点上)。

10 世纪末,不是从喀什而是从巴拉萨衮城对伊兰伊斯兰世界——萨曼尼王朝边地进行了征略。喀什当时尚不是突厥人占多数的城市。还提到首先是接受伊斯兰教的萨土克布格拉汗的孙子布格拉汗哈龙攻占了依斯非加普或赛兰木(Sayram)城。在赛兰木似有一小的突厥政权或由突厥统治的王朝。992 年哈龙对撒马尔罕和布哈拉进行了胜利的征战,但情况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
83 该二城而退回巴拉萨衮城。同年布格拉汗哈龙死去。但通过九年后缔结的和约,萨曼尼朝在扎拉夫尚(Zarafshan) 河谷以北的所有属地都转入黑汗王朝手中。稍后,999 年黑汗王朝重新占领撒马尔罕和布哈拉。11 世纪初,萨曼尼朝末代统治者虽曾企图重振祖业,但已不能动摇突厥在河中地的统治了。

86 黑汗王朝并未想在阿姆河止步,它接着进攻了马哈木(Mahmūd)的哈孜那(Ghazna)朝。马哈木的历史家关于此事提到一个天启(Hadīt)。那里说突厥人的外貌是小眼睛,扁鼻子(巴氏:《突厥斯坦》,273,据 Utbi 的记载)。这个天启似乎是反对认为突厥人开始不属于蒙古人种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在伊兰地区内与突厥的斗争可能是从伊兰民族传统的观点看待的。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费尔道西(Firdausī)的《王书》(Shāhnāme)。此书写成于萨曼尼朝时代,但在哈孜那的马合木时才为人知道。书中以很大篇幅描述伊兰人与土兰(Turan)人的斗争。从 6 世纪突厥人出现时起,土兰一词就用作突厥斯坦,即"突厥人地方"之意。在这一斗争中虽然土兰方面英雄的名字是纯伊兰式

的,但都被描写成突厥的统治者。这一传统与黑汗王朝有联系,是因为黑汗王朝不仅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伊兰史诗的影响,他们按传说中土兰英雄的名字称自己为 Al-i-Afrasiyab(阿夫拉西雅普之家),尽管这是个非突厥语的名字。我们第一次从马氏书中知道,突厥古代民歌中的英雄阿勒普通阿(Alp Tonga)与阿夫拉西雅普是一个人。马氏在《词典》引用了一些这些民歌并译为阿拉伯语。在译文中他把阿勒普通阿一词译为阿夫拉西雅普(《词典》,Ⅰ,44 等处)。关于阿夫拉西雅普,波斯传说把它与突厥斯坦的某个地方联系起来,阿夫拉西雅普的首府被说成是喀什(《词典》,Ⅰ,288),并说巴楚城(Barchuq)是阿夫拉西雅普建立 87
的。又说英雄 Bīzen 或 Bīzhen 葬于巴楚(《词典》,Ⅰ,318)。据波斯史诗,他因秘密与阿夫拉西雅普的女儿成亲而被阿夫拉西雅普下令扔进井中,并被鲁斯坦(Rustem)救出。显然,费尔道西及其前驱达基基(Daqīqī ,萨曼尼朝的同时代人)在其关于传说的土兰人活动的故事中,是取材于同时代的突厥人生活的。属于这一点的例如有城市和不同突厥民族的名字。尚提到了突厥文字,名叫 hatt-i paighewī。这个 Paighū 词也如其他一些词一样,应为鄂尔浑碑铭中已知的 yabghu(叶护)一词的变形。该称号也为葛逻禄统治者所使用。

征服佛教圣地和阗是和喀什统治者哈狄尔汗尤素甫(Kadyr 88
Han Yūsuf,布格拉汗哈龙之子)的名字有关。在嘎尔狄泽关于和阗的记载中(可能属于黑汗王朝征服该地之前),说那里也有基督教堂和一些穆斯林墓地(Barthold,Otchet,Texte,页 94)。由此可见,远在佛教时期伊斯兰教就已进入该地了。

哈孜那的马哈木朝不仅与穆斯林黑汗王朝有关系。据嘎尔狄

泽的记载,1026 年有两个异教徒突厥汗的使臣到达哈孜那的马哈木那里,并要求联姻(嘎尔狄泽,见 Turkestan,页 286)。可惜未指明该二汗统治的地方。这次出使之事,又见于 14 世纪成书的贾马里丁·依本·木哈纳(Jamāl ad-Dīn ibn al-Mahannā)关于波斯语、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字典中(耿按:据《辽文汇》一,太平四年即 1024 年辽帝虽遣使到阿富汗,带去了圣宗给当地王朝的信件,要求建立友好关系,但未说要联姻)。

89 依本·木哈纳在谈到十二生肖历时引用了医生马外集(Sharaf az Zamān al-Marwazī)已失传的《论动物的习性》(Tabā'i' al-hayawān)一书(耿按:此书已发现,现有 Minorsky 的英译文)。那里说苏丹马哈木从"中国皇帝和突厥统治者"那里收到信的日期是回历 418 = 公元 1027 年。写信的日期为鼠年(1024 年)五月。嘎尔狄泽记使节事在回历 417 = 公元 1026 年。马外集医生说是在回历 418 = 公元 1027 年。鼠年相当于 1024 年或 1036 年。

90 关于黑汗王朝时代新疆伊斯兰教地区的疆界只见于马·喀什噶里的书中,我们知道,新疆的文化区分布在两条主要商道上。北道通向库车和吐鲁番,南道从和阗到罗布泊。塔里木河流入那里。马氏说,Usmy Tarym 是一条由伊斯兰教国流入回鹘地区的大河,并在那里没入沙漠(《词典》,Ⅰ,116)。11 世纪时,伊斯兰教既未达到吐鲁番,也未达到罗布泊。伊斯兰教的北界是库车(《词典》,Ⅰ,339)和布古尔(耿按:今轮台县)(Bügür ~ Bükür,同上书,301),南界是且末(Cherchen)城(同上书,364)。

再往东为回鹘王国,并说其称号为 Kül-Bilgä Han(同上书,358)。但这里马氏使用 kāna yusammā("这习惯称为"之意)一语,这句阿拉伯语表明,这个称号是指过去。至于马氏时代回鹘汗如

何称呼则未谈到。此外,马氏已不知 kül 一词的意义,而把它同 köl 一词联系起来(耿按:古代突厥语 kül 有"光荣"之意,köl 为"湖")。

马·喀什噶里也知道和阗被伊斯兰教徒征服的事。他在其《词典》中暗示了这一点,《词典》在谈到 Jenkshi(也为后来成吉思汗一后裔的名字)一词说,和阗阿米尔叫这个名字,是他使突厥人占有和阗的(《词典》,Ⅲ,279)。 91

《词典》中有许多涉及伊斯兰教徒与回鹘人之间斗争的诗歌(克·布洛克勒曼:《古代突厥民歌》Ⅰ,载《夏德纪念论文集》页1以下)。那里在谈到回鹘人时,总是把他们和佛教联在一起。回鹘文献中表示佛僧之词 toyin 和佛教书籍之词 nom 后来传入蒙古人那里一事,也为13世纪的波斯史家朱外尼(Juwainī)所知。马氏说,nom 一词指任何宗教书,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的(《词典》,Ⅲ,100)。在马氏书中找不到回鹘人信仰摩尼教和基督教的材料。只是从马氏对 bachaq 一词的解释——"基督教的斋日"(《词典》,Ⅰ,345)来看,似表明有基督教徒的突厥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也见于突厥语摩尼教文献中,表示"摩尼教的斋日"(见勒柯克:《摩尼教忏悔词》Chuastuanift)。有趣的是,黑汗王朝对穆斯林伊兰人和异教徒回鹘人都用同一个词——tat 称呼之(《词典》,Ⅱ,224)。关于这个词的来源现在尚有争论。在民族学上它现在用来称高加索操伊兰—突厥混合语的犹太人(耿按:塔特语为一种伊兰语,属伊兰语西支)。这个词在中亚土库曼人中用来指称有农业文化的人(包括希瓦人)。这个词在11世纪也用于这个意义。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词同时用来指称伊兰人和定居的突厥回鹘人。

马氏书中有不少关于回鹘城市的材料：高昌（Qocho）是城名，也是整个地区名（《词典》，Ⅲ，165 及 180）。鄂尔浑文碑铭和回鹘文文献中都提到高昌城，在今吐鲁番的哈喇和卓，遗址为 Idiqut Shahri（“回鹘王陛下之城”之意），为回鹘南部地区的主要城市。北部除主城别失八里（Besh-balyq）外，尚有梭里迷（Sulmy），占巴拉（Jambalyq/Janbalyq），扬吉巴里克（Yangybalyq，新城）三座城市。在接受摩尼教差不多三百年后，回鹘人仍未失去其勇敢的特点。在挽弓善战方面，回鹘人超过其他异教徒（《词典》，Ⅰ，103）。

从马氏书中我们知道，回鹘人称伊斯兰教徒为楚马克（Chumak）（《词典》，Ⅰ，319）。在南俄草原，这个词有车贩商人之意。在回鹘地区，伊斯兰教徒一般代表商人。

马氏在谈到伊犁河时讲了一个故事，说当某汗出猎时，被追赶的野兽一一渡过伊犁河，由此产生了十二生肖（《词典》，Ⅰ，289）。

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写于巴格达。书中谈到他开始写作于回历 466 年 1 月，即 1073 年 9 月。但有两点使人怀疑这个日期：一点是，那里也提到哈里发木克塔狄（Muktadī）。但后者在回历 467 = 公元 1075 年才即哈里发位。第二点是，按十二生肖纪年是蛇年：即为 1077 年。《词典》后的跋文说，他于回历 464 年 5 月初 = 公元 1072 年 1、2 月间开始《词典》工作，经过四次修改和抄写，完成于回历 466 年 6 月 10 日 = 公元 1074 年 2 月 10 日，即在他献给其著作的哈里发即位之前。这个时间上的矛盾不好解释。但抄本很完好且很古，并有具体的日期（回历 644 年 10 月 27 日 = 公元 1266 年 8 月 1 日）。此外，据抄写人说，他是据原作者的原抄本抄写的。不管怎样，作者于 11 世纪下半期写成这一著作是毫无疑问的。

作者未谈到为什么他后来移居巴格达。从书中只知道他曾周游各突厥地区。他是突厥语的专家。他研究了突厥语、土库曼语、乌古斯语、处月语、样磨语及柯尔克孜语。从书中材料中尚看不出其母语是阿拉伯语抑或是突厥语。其著作表明他精通阿拉伯语。但书中几个地方表明他出身突厥。作者以第三人称谈到自己。有时他在名字前加上"此书作者"等语,或简单称自己为马赫木德(Mahmūd)。没有理由怀疑,书中凡是谈到马赫木德的地方应指作者本人。下面这句话是涉及作者本人的:"马赫木德的父亲出自热海附近的巴尔斯汗(Barskhann)城"(《词典》,Ⅲ,308)。巴尔斯汗城的方位以前已确定。嘎尔狄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亚历山大第一远征中国时,他让波斯战士留守巴尔斯汗,答应返回时带他们回家。但后来他经印度返回西方,未实行其诺言。据嘎尔狄泽解释,巴尔斯汗为"波斯汗"之意(Pars + Han)。

关于热海附近的巴尔斯汗,马氏在其书中有两种解释:一为阿夫拉西雅普之子的名字,一为回鹘汗的马夫的名字。后者说明回鹘人曾一度到达热海,并一直到11世纪还有人记得这件事。

在另一处(《词典》,Ⅰ,102)可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喀什噶里不仅出身突厥,而且出自黑汗王朝王室本身。如有这样的句子:"马赫穆德,此书作者说:我们的父辈 Emīr 们被称为哈米尔(Hamīr),而乌古斯人发不出 Emīr 这个音"。又说:"我们的父辈通过战争,从萨曼尼后裔手中夺取了突厥地区。"但也可能这里作者不是谈自己,而又回到前面引用史料中的话,那里说:"Nizām ad-Dīn Isrāfīl Toghan Tegin ibn Muhammad Chaqyr Tonqa Han(尼札米丁……依其父亲的话告我说……)"。他还提到一叫库马克(Qumaq)的艾米尔的名字,他曾一度陪伴过他。

95 上面提到的住在伊犁河谷的部族土赫色、样磨和处月似乎也为伊斯兰教徒。当时伊斯兰教的前哨阵地位于伊犁河北,即在邻近巴尔喀什湖的地区(《伊斯兰百科全书》,Ⅰ,649)。巴尔喀什湖也叫 Täring-kül 或 Taring-köl ("深湖"之意,《词典》,Ⅲ,99)。距湖不远有城名 Iki ügüz,即"双河"之意,因位于伊犁河与另一河牙分奇(Yafynch) 汇合处而得名(《词典》,Ⅰ,58)。但在《词典》所附地图中,牙分奇画在伊犁河南,双河画在伊犁河北。1253 年欧洲旅行家鲁布鲁克(Rubruquis)在伊犁河北经过一 Equius 城。该城可能就是双河的拉丁文拼音。在双河城附近还有一城叫哈木兰求(Qamlanchu,《词典》,Ⅱ,184)。库米塔拉斯(Kümi Talas)城也应在此地区,即在伊斯兰教的边界上。《词典》中所附地图,把它画在伊犁河北岸,但在另一处(《词典》,Ⅲ,177)说该城位于回鹘边界上。再往北流有 Yamar 河。此河似为叶米里(Emil)河[6],即今塔城所在地。并说"这里住有牙巴库(Yabaqu)人"。与牙巴库人名字有关的是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进行的一次战争。说在阿尔斯兰特勤(Arslan Tegin)统帅下四万穆斯林军队战胜了在布格·布德拉奇(Büge Budrach)统帅下的七十万异教徒。在关于记述这次战事的诗歌中提到渡过了伊犁河和 Yamar 河,即叶米里河(?)。又说在这次战争中,拔悉密人站在异教徒一边。马氏能谈到这次战争参加者之一,这说明战争应发生在《词典》编写之前不久。不过参战人数这么多,在游牧地区恐不可能。

马氏说牙巴库人不属于纯突厥部落之列。作者又说,他们除自己的语言外,也会突厥语。拔悉密人也属于这种人(指非纯粹突厥人)。鄂尔浑碑铭告诉我们,拔悉密人是居于新疆别失八里地区的部族。该地后为回鹘所占有。

在非纯粹突厥部中还提到鞑靼人(Tatar)。之后用这个名称(也见于鄂尔浑文碑铭)指蒙古人。一些其他部族也非常可能是蒙古人。这些族被列为非纯粹的突厥人,其中包括牙巴库人。如果是这样,那么蒙古人早在马氏时代就已西面达到其周围为突厥部族的地区了。

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的柯尔克孜人当时被认为是纯突厥人。马氏的话也证实了突厥人被蒙古人从蒙古逐出的事实。于都斤山(Ütükän)在鄂尔浑文碑铭时代曾是突厥汗牙帐所在地。但到马氏时代已是"位于鞑靼草原,距回鹘地区不远了"(《词典》,Ⅰ,123)。统治蒙古草原的最后一个突厥族为柯尔克孜人。据汉文史料,他们在840年灭掉了回鹘汗国。柯尔克孜被逐出蒙古可能与10世纪属于蒙古系的契丹人的强大有关。他们在中国北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朝,并以其名字称这个王朝。现在,契丹(Qitai)这个词只为蒙古人、俄罗斯人和一部分穆斯林所使用,但不为西欧所使用。突厥在西方接受了阿拉伯语指中国的名字:Sin(代替波斯语中的Chin,波斯语中的ch常相当于阿拉伯语的s)。此外,又从东方带来了早见于鄂尔浑碑中的Tabghach一名(耿按:鄂碑中此字表示"中国")。在马氏时代(《词典》,Ⅰ,378)人们已区分开Sin与Masin(波斯语Chin与Machin)。Sin指北中国,Masin指南中国。只是对Masin(在南宋统治之下)使用Tabghach这一称呼(《词典》中写成Tavghach)。Tavghach或Masin也称"上Sin"。Sin作为本义或中部中国被人们按其统治民族的名字称做契丹(Hitay)。作为"下Sin"则指新疆南部地区。显然Tavghach一词尚用作其他意义。由于仰慕中国文化,黑汗王朝也使用Tavghach这一称号。其意义似为"伟大

98

的统治者”。这一称号也见于黑汗王朝的钱币上,阿拉伯语译为 Malik as-Sin(中国皇帝)。

《词典》中也提到了西夏人(Tangut)。他们在 1020 年占有甘州回鹘之地。在 Sin 与西夏之间有一突厥语称作 Qatun Syny 的城市(“王后之像”或“王后之墓”,《词典》,Ⅲ,101,240,据 Ahmed Zeki Walidi,Qatun Sini 一名已见于贝鲁尼的《马苏底法典》一书中)。

总之,从马氏关于一些城市的简短注释中可以看出,他手中有一些未能留传下来的历史材料。例如讲到 Syghun Sämür 一地时,说在那里布格拉汗被毒死(《词典),Ⅰ,343),但未说明是哪一个布格拉汗。

马·喀什噶里书中收集的语言学材料中包括许多优秀的突厥诗歌范例(民间的和书面的)以及许多文化词语。这些材料给我们提供了关于 11 世纪突厥各族的生活以及他们虽已接受伊斯兰教(回鹘除外),但伊斯兰教尤其伊兰的影响尚未对突厥民族传统取得完全胜利时,其精神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的图景。这一讲里不能详谈《词典》中全部材料(可参看克·布洛克勒曼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一系列文章)。下面谈乌古斯部和西突厥时我们还要谈到马氏书中的宝贵材料。马·喀什噶里引用的诗歌属于从伏尔加河到中国边界的广大地区。不易确定哪些是属于这一地区的东部,哪些是属于其西部。

第六讲

102 6—8 世纪突厥汗国后,历史上知道的乌古斯人最早西迁运动为 9 世纪末的皮切涅格(Pecheneg)人的西迁。拜占廷皇帝 Kon-

stantin Porphyrogennetos(他写于10世纪中期)说,此事发生在50年以前。拉施德艾丁(Rashīd-ad-Dīn)和马·喀什噶里都说皮切涅格部属于乌古斯部落。

皮切涅格部很早就已离开其他乌古斯部。9世纪阿拉伯地理 103
学家说,他们在迁移之前就已从乌古斯分出。那时他们是哈扎尔人的东邻,住在乌拉尔(Jayiq)河一带。922年依本·法德兰(Ibn Fadlan)在该地尚见到残余的皮部人。之后,皮部人通过哈扎尔地区西迁南俄草原。

10世纪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Fārābī)是突厥族出身。 105

黑汗王朝使用回鹘文,以后才逐渐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在 108
黑汗王朝的钱币上也铸有回鹘字母的铭文。像后来蒙古时期钱币一样,用回鹘文写汗的名字,虽然名字本身是阿拉伯语的。

中亚和前亚(突厥人)使用的正字法(耿按: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不同。这一点可由乌古斯人不太知道回鹘字母来解释。中亚突厥人习惯在回鹘文中表示所有元音。所以当他们转用阿拉伯字母时,也采用了阿拉伯字母 alif, waw 和 ya 来表示元音。而在前亚的突厥语写本中元音很少表示出,甚至过去时第三人称中的 i 也常写成 d,而不是写成 di。

除东部未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的、有文化的突厥人——回鹘 112
(维吾尔)以外,在西北尚有许多游牧突厥人。他们当时不仅未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甚至不知伊斯兰教为何物。11世纪初克普恰克人从额尔齐斯河那里开始获得很大的发展。关于住在额尔齐斯河一带民族的变化,我们可从它们名称的变化中推知。鄂尔浑文碑几处提到这条河,但未谈到是什么民族住在那里。当时似乎西乌古斯或突骑施可汗的属地一直达到额尔齐斯河。Irtish 无疑

不是突厥语。对于这个词有一些突厥民间的解释。阿拉伯地理学
113 家把奇马克人位于额尔齐斯河一带。这个部族占有乌古斯人以北、西到伏尔加或卡马河(Kama)的广大地区(当时认为卡马河是Itil河,即伏尔加河的上游)。奇马克人分成几个部落,其中有克普恰克和艾买克(Emek)。马·喀什噶里书中不见奇马克一名。据马·喀什噶里的记载,额尔齐斯河一带住有艾买克人(Yämäk, Yimak),他认为他们是克普恰克的一部(《词典》,Ⅰ,273)。

稍后,在与克普恰克的同时也提到康里(Qangly)人。在马·喀什噶里书中康里一词不是族名。那里(《词典》,Ⅲ,280)说康里是克普恰克部中一大人物的名字。此外,关于这个词马氏又说有"大车"之意。从波斯史家巴依哈基(Baihaqī)的著作中我们知道,克普恰克人早在马氏《词典》成书以前很久就已南达伊斯兰教地区的边上,并成了花剌子模的邻人。与克普恰克人南移有关的显然为马氏谈到(《词典》,Ⅰ,317,116)的、关于一名叫Bulaq,或Elke Bulaq的突厥部族。他们曾为克普恰克人俘虏去,只是由于真主的帮助才得救。这里像马氏著作中其他地方一样,又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的暗示。

这一点是可能的:11世纪乌古斯人往西、往南的迁移部分是由于来自克普恰克人的压力,以此可说明阿拉伯地理学家谈到的乌古斯人于10世纪占有在此以前未有人居住的Manghyshlaq半岛的事件。该半岛从此以后直到晚近为土库曼人所占有。之后,他们为从北方的哈萨克人所逐出。十月革命后该半岛属哈萨克斯坦(巴尔托里德氏后来确定土库曼人在16世纪为诺盖人(Nogaier)从该半岛逐出,17世纪后者又为卡尔梅克人所逐出)。

114 11世纪期间发生的民族变动表现在: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

依乌古斯之名称做古兹草原的,现则改称为克普恰克草原了(Dasht-i Qypchaq)。这个地理名称当克普恰克作为一个部族已不存在时,仍在伊斯兰文献中使用。这一点正如当哈扎尔汗国崩溃后黑海仍称"哈扎尔海"(Hazar dengizi)一样。于是,锡尔河上的乌古斯领地及南俄皮切涅格人的领地(他们为乌古斯人所逐出)都转到克普恰克人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康里人手中。结果克普恰克领地包括从东到西的广大地区,这个广大 地区的北部草原也为他们所占有(像现在哈萨克领地一样)。来自北方的民族移动已不再有了。在西方,克普恰克人与俄罗斯人和西欧发生联系,虽然不论前者或后者都不知克普恰克这个词。俄文文献中称他们为波罗未茨(Polovets)。西欧则称之为库曼(Koman)。库曼一词不见于伊斯兰文献中。

关于克普恰克部族,最近有马夸特的天才著作(耿按:指班格 115
和马夸特《东突厥方言研究》一书,柏林,1914)。马夸特认为一些穆斯林作者提到的最东部的浑(Qun)部族属于克普恰克,并且正是(Cun)这个名字在西欧为人们所熟知。与马夸特的推论相反,我们认为不论他所说的从东到西的运动抑或一般说浑部族存在本身都缺乏证据。嘎尔狄泽(Barthold,Otchet,页 86)说,在此地区,即在黠戛斯的东部有名叫 Fūrī 的部族。他们在文化上比黠戛斯人更落后。Fūrī 一词可能为突厥语的 büri(狼)。在马夸特所依据的许多写本中,即在贝鲁尼、阿乌非(Aufi)的著作中,代替 Qun 一词则为 Fūrī。很可能后一写法是可取的(也可读为 Qurī,见巴尔托里德《吉尔吉斯人》,伏龙芝,1927,页 23)。马夸特的下述意见也缺乏说服力;他根据汉文史料说克普恰克人拥有一稍后(即 12 世纪)来自远东的统治王朝。

116 克普恰克人的移动是一个部族缺少政治统一和国家组织,但却占有广大地区的少见的例子。曾有过个别的克普恰克汗,但从来没有一个曾君临所有克普恰克人之上的统一的汗。克普恰克人所占地区当时处于伊斯兰世界之外。在高加索,克普恰克人于12世纪已参加对伊斯兰地区的入侵。

克普恰克汗在南俄有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为其服务,特别是军事方面的专家。就在伊斯兰地区的紧邻处,存在非穆斯林的克普恰克汗国,境内也有一些城市。12世纪克普恰克汗国(12世纪下半期花剌子模人与其建立了关系)的首府为苏赫纳克(Sughnak,遗址为今Sunak-kurghan)。这个地方作为乌古斯地区的城市为马·喀什噶里所提到过。穆斯林史料说得很清楚,住在那里的克普恰克人和康里人(这两个部族常在一起提到,很难分开)只是在12世纪下半期,由于和花剌子模的紧密关系才接受了伊斯兰教。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居住在今哈萨克草原的突厥部族接受伊斯兰教这件事(据依本·阿提尔为回历435年=公元1043年),很难说对在克普恰克草原传播伊斯兰教能有什么大的意义。这里也未提到接受伊斯兰教的民族的名字(像960年那次一样)。他们的游牧地区是:冬天在巴拉萨衮,夏天在伏尔加(Etil)河。尽管地区辽阔,该部族人数要比960年接受伊斯兰教的那个部族人数要少得多。依本·阿提尔说只有一万帐,阿布勒费达(Abū'l-Fidā,托林别尔格刊本,XI,355以下)说甚至仅为五千帐。

从马·喀什噶里书中,我们不能确定伊斯兰教影响在西北达到多远。一般说不清楚他引用的突厥诗歌、突厥信仰观念、风俗习惯、国家政权等属于什么地方和属于什么突厥部族。他在书中引用的诗歌涉及不同地区。其中有关于Qatun syny城与西夏人斗争

的诗,有描写伏尔加河的诗:“依的勒河水奔流,撞击着岩石之脚,许多鱼和蛙在池中,由于河水泛滥,池水是满满的”(《词典》,Ⅰ,70)。

从马·喀什噶里《词典》中看到,除民歌外,在突厥人中也有 117
书面诗歌,甚至宫廷诗。有一处某诗人称自己为王后(qatun)的侍从,并谈到献给她一首诗作为为其服务的表示。这种诗叫做qoshugh/qoshuq,阿拉伯语译为“Qasīde”(颂,《词典》,Ⅰ,314),以此把 qoshuq 同另一种格律诗 tuyuq 区分开。《词典》中不见 tuyuq 这个词。马氏只提到一个名叫久久(Juju)或求求(Chuchu)的诗人,说这是一位突厥诗人的名字(《词典》,Ⅲ,180),但未说明这位诗人出自哪一突厥部落,以及生活于何时、何地。

正如波斯文化未能一下子排除以前的突厥诗歌一样,伊斯兰教也未能一下子排除以前的宗教观念,这时仍崇拜女神乌买(Umai,此词见于鄂尔浑碑文中)。马氏说乌买是儿童在母胎时的保护神,并引用格言说:“谁敬信乌买,谁就得子”《词典》,Ⅰ,111)。

马氏又谈到 yogh 一词,意为“丧礼”(《词典》,Ⅲ,105),指死 118
人埋葬后进行三天或七天的宴会。还存在这样的迷信:两军交战的前夕,双方的地神彼此斗争。战士很怕在战前夜晚从毡房走出,怕被神矢射中,这种神矢叫 chävi。这一或那一神的胜利决定人们之间战争的胜负。还有当人们听到有新生儿时,不是问“生男孩或女孩”,而说:“是生的狼(böri)还是生的狐(tülki)”(《词典》,Ⅰ,359)。还有,在政治术语方面,黑汗王朝与乌古斯,即塞尔柱后裔使用的不同。如处月,即东突厥当时已用 yarlyq“汗令”一词(如后来蒙古帝国所用),而乌古斯人则不知此字(《词典》,Ⅲ,31)。另一方面,乌古斯人用 tughragh(现在 tughra)表示“印”,“手印”。关

于这个字，马氏说："突厥（Türk）人不知此字，我也不知其来源"（《词典》，I，385）。依本·木哈纳（蒙古时代的作者）字典中两个词都有：Tughra 和 Yarlyq 出现在同一页中。我们知道，Tughra 一词后来只为塞尔柱人及奥托曼土耳其人所用，中亚则不知此字。

此外，马氏书中还谈到有关统治的琐事：汗权的外部标志之一为旗帜，有九个旗的汗（Tokuz Tughlugh Han），为最强有力的汗（《词典》，Ⅲ，92）。还有关于非穆斯林突厥汗，即回鹘汗的事：在解释 kamdu 一词时，马氏说，为约四托长（等于两米长，一拃宽的棉布，上盖回鹘汗之印，用作货币，每七年修补、洗净一次，并重盖官印（《词典》，Ⅰ，350，直到最近新疆仍用棉布作货币）。

第七讲

120 马·喀什噶里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黑汗王朝在北方同牙巴库（稍后不再见于历史）部族和在东方与回鹘人斗争的材料，但未谈到应于 11 世纪上半期与西辽（黑契丹）进行之斗争。

122 关于契丹西迁，穆斯林史料比汉文材料要丰富。汉文史料只提到契丹人在辽代末代皇帝兄弟的统率下，通过给予其帮助的回鹘地区迁到中亚。据穆斯林史料，这次进军是以失败告终的。契丹曾被喀什噶尔汗完全打垮。塞尔柱苏丹桑加尔（Sanjar）并把这一胜利报告了巴格达哈里发（原文见巴氏：《突厥斯坦》，Ⅰ，37 以下）。但契丹的另一部分从北路通过西蒙古的进军则获得成功。他们在叶尼塞河上游虽曾遭到黠戛斯人的攻击，但幸而通过了该地区，进而向西南方向前进，并在塔城（Chuguchak）地区（11 世纪时黑汗王朝曾与牙巴库部族在那里打过仗），建立了叶米里（额敏，Emil）城（主要史料为朱外尼的《世界征服者传》，基普纪念丛

书。XVI,2,页 86 以下)。从各方面来看,该地区在 12 世纪时也如 11 世纪时一样应尚处于伊斯兰教影响之外。伊斯兰教北部地区仍如以前一样,为黑汗王朝统治下的巴拉萨衮城地区。

西辽皇帝住在巴拉萨衮城附近,他被伊斯兰教徒和蒙古人称 123
为菊尔汗(Gurhan)。这种称号在此以前以后都未见,来源也不清楚。穆斯林作者说此词有"汗中汗"之意。此词(kür,gür)可能来自古代突厥语的 kür 或 kül。后一词已见于鄂尔浑碑文和嘎尔狄泽及马·喀什噶里著作中,菊尔汗统治的领土辽阔,从花剌子模到回鹘地区。

西辽的官方语言为汉语,同时也带来了汉族的制度。"驸马 124
(Fu-ma)"一词指女婿。Paiza(牌子)用来表示"证明文件"(如后来蒙古一样)。西辽不同于通常的游牧汗国,未实行采邑制(分封制)。据说第一个菊尔汗不让任何人领有多于百骑之兵。但实行属国的内部自治。西辽只取消了巴拉萨衮城黑汗王朝的统治,那里由菊尔汗自己统治。该城市依其居民成分,之后仍为穆斯林城市。在其他占领区,在喀什、河中地,黑汗王朝仍存在。西部的花剌子模,东部的回鹘王国也一如从前。

西辽的建立可能有利于各种文化成分的接近,也可能对非伊 127
斯兰文化成分的西传起过作用。对七河省楚河流域发现的叙利亚语、突厥语景教碑文的背景现在仍不清楚。大多数热海地区的碑文如伊犁河流域的一样,属 14 世纪,即蒙古时代。但楚河流域则有一些碑文属于 13 世纪初,即西辽仍存在的时期。俄国院士 Kokovtsov 比较研究了七河景教碑和吐鲁番发现的文献,发现吐鲁番的景教徒比七河地区的更有教养些,所以应认为东部的(吐鲁番)影响了西部的(七河地区)(《俄国科学院通报》,1909,页 778

以下)。

除回鹘景教徒外,可能回鹘佛教徒也利用这个时期向西扩展其影响,对于西辽时代,我们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材料。但在蒙古统治初期(即1253年),鲁布鲁克在海押立(Qayalyq)城(伊犁河北)曾见有回鹘佛教徒。这些回鹘佛教徒可能早在西辽时即已来到这里。总之,11、12世纪是基督教加强布教活动的时期。我们知道好些蒙古部族这时接受了基督教。不仅基督教史料,同时穆斯林史料也指出西蒙古的乃蛮和东蒙古的克烈部是基督教徒。伯希和的研究(《通报》,XV,1914,页629以下)证明南蒙古的汪古(Ongut)部也为基督教徒。回鹘人也参与了基督教的传布。证明此点的是:成吉思汗在乃蛮处获得了一个回鹘族掌印官,并通过他知道了回鹘字母。说明七河地区的基督教徒为回鹘人的证据为碑文中的计数方法(十一说成"一"加"二十")同于鄂尔浑碑文和回鹘文献。回鹘基督教徒的中心似为吐鲁番东面的Bulayiq(耿按:即现在葡萄沟村)。这里只出土有基督教文献(叙利亚语的、粟特语的、突厥语的,缪勒:《回鹘文献》,柏林,1908,页4)。但七河地区的基督教徒不用回鹘文,而用叙利亚文字母(添加了几个新符号)。

128 布教活动往往与商业活动有联系。叙利亚故事讲到克烈人接受基督教时说(奥培尔特:《传说中的约翰大主教》,页89,据阿布勒法拉基书),克烈汗是从基督教商人那里知道基督教的。

蒙古人从突厥语借用了意为"商人"的Sart这个词。像来自Soghd的Soghdak一词一样,从Sart派生出Sartak一词。再加上蒙古语表示人的字尾-tai,成为Sartaktai。蒙古人用它来指主要为商人的"穆斯林伊兰人"。对蒙古人来说,这个词与其是指特定民族

的人,勿宁说是指特定文化类型的人。成吉思汗称第一个臣属于他的穆斯林王,即七河北部葛逻禄人阿尔斯兰汗为 Sartaktai,虽然葛逻禄人在语言上不是伊兰人,而是突厥人。蒙古人还使用一个与 Sart 同源的词 Sartaghul(或写作 Sartaul)。该词也在成吉思汗时代使用,之后拉施德艾丁用这个词指塔吉克人,依本·木哈纳用来指"穆斯林"。

支票(chek)一词来自波斯语。 130

当西辽时期,也如马·喀什噶里时代一样,伊斯兰教地区最 131
北部也未越过巴拉萨衮地区。不到百年之后,即当蒙古人出现前不久,则提到七河地区北部的葛逻禄和穆斯林阿尔斯兰汗王国以及海押立城。该城的位置现只约略知道。鲁布鲁克在渡过伊犁河不久去阿拉湖(Ala Kul)的路上经过该城。当时的大道似比现在距巴尔喀什湖更近些,因为鲁氏在远处可看到湖面。海押立城和葛逻禄王国出现在西辽时期。葛逻禄王并且是菊尔汗的臣属。在另一城市,即在今伊宁(Kulja,《伊斯兰百科全书》,Ⅱ,1193)西北的阿里马(Almalyq,此城不见《突厥语大词典》,也不见于有关西辽的记载中),在蒙古人出现前不久,由一出身葛逻禄或康里突厥部的匪首(他不是西辽的臣属,而是反对它的)取得了政权。关于该人出身方面的矛盾我们在朱外尼的《世界征服者传》(为研究 12
世纪末 13 世纪初中亚事件的主要史料)一书的不同写本(虽然同 132
样古老)中可以看到。但阿里马的统治者同样是穆斯林。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以前不存在的新的穆斯林王国。当时伊斯兰教往东传播比较困难,那里有文化的回鹘人像一堵墙似地挡住了该教的传播。在蒙古帝国时期,也如马·喀什噶里时代一样,伊斯兰世界的边界在库车以东。只有阿乌非(巴氏:《突厥斯坦》,第一册,原

文,页 95 以下)谈到库车的穆斯林突厥英雄黑泽尔伯克(Hizrbek)因战胜回鹘人而有名。黑泽尔伯克因帮助喀什汗反对其敌人而得到汗的称号。马·喀什噶里时代伊斯兰教在塔里木盆地南部的边界是且末,而在 13 世纪马可波罗时代,罗布淖尔地区的居民已是伊斯兰教徒了。

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突厥人当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亚洲的伊斯兰文化生活。突厥人这时虽在文化上处于阿拉伯—波斯的影响下,但他们从未丧失自己的语言。但阿拉伯—波斯文化对突厥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突厥语也未能成为国家和文化的语言。在最西边,即在小亚细亚,一直到 13 世纪阿拉伯语仍是国家用语。这一点见于 14 世纪在小亚细亚用波斯语写成的一佚名著作中。而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俄国科学院论丛》,XVⅢ,0129)。如已故马克西·凡·别尔辛(Max van Berchem)指出
133 的,但有利于前一点的为金石学方面的材料。关于波斯史诗对突厥苏丹们的影响,可从当时最常用的诸如 Kaihusrau、Kaiqobad 等人名中看到。但也见有纯粹突厥语的名字。这一点清楚说明苏丹们并未忘记自己的突厥出身。这一情况也适用于伊朗的塞尔柱国,那里波斯语成为行政和文化上的用语。在黑汗王朝统治下的突厥斯坦,阿拉伯语常被波斯语从行政和文学领域方面排挤掉。但在 10 世纪萨曼尼朝时代,《布哈拉史》则用阿拉伯语写成。当该书于 12 世纪译成波斯语时,则说明除其他原因外,人们已不愿读阿拉伯语的书了(纳尔沙黑,舍费尔刊本,页 2)。阿拉伯语甚至在神学教学方面也被波斯语所取代。例如有人用波斯语在 Medrese 讲学(萨木阿尼,马尔哥留斯刊本,页 506)。这种情况也见于宗教初级教育上。马吉狄丁·阿不达勒加非尔(Majd ad-Dīn Abd

al-Ghāfir, Nishapur 历史续篇的作者,生于回历 451 年)说,他在五岁时就已用波斯语学习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

但在黑汗王朝,特别在喀什地区,12 世纪下半期时阿拉伯语仍用作行政语言。有一件阿拉伯语的文书由我译成英语发表在伦敦的东方学报上(《〈福乐智慧〉一书中布格拉汗考》,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报》,Ⅲ,Ⅰ,即 151—158,1923;土耳其语译文载《突厥学报》,卷 1)。该文书属于《福乐智慧》写成时的同一个布格拉 134
汗时代。该文书及后来的文书表明,在黑汗王朝,特别在撒马尔罕,虽然居民中几乎无人说突厥语,但也不能把突厥语完全从国家用语中排除出去。如用突厥语的 ulugh (伟大)加在 wazir(大臣)一词上。在 12 世纪末撒马尔罕汗所铸钱币上,甚至加在汗的称号 Sultan as-Salatin(苏丹中的苏丹)上。黑汗王朝诸汗直到王朝灭亡一直都使用突厥语名字和突厥称号,并保持了蒙古草原时代乌古斯和回鹘汗国时代的习惯,即当新汗即位时改变旧的称号,之后就用这个新称号代替自己的名字。这一习惯给历史家带来不少困难,即不易确定,在约同一时间同一地点铸成的钱币是否属于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撒马尔罕,据目前所知,谈不到什么突厥语文学(关于 Hizr han 及其宫廷诗人,见撒马尔罕狄:《四卷书》,基普纪念丛书,XI,46 原文, XI,2,52 译文)。在汗的宫廷中写作的是波斯诗人,他们受到王室的保护。对用突厥语创作文学作品来说,当时喀什的条件比较好些,虽然那里波斯语的影响也已深入并日见加强。晚至 17 世纪,那里仍用波斯语写了一部历史著作,但语法错误很多,这说明波斯语既不是作者的母语,也不是他的日常用语(《论丛》,XXII,313 以下)。

回历462年(公元1069—1070年)巴拉萨衮人尤素甫(他在黑汗王朝宫廷中任侍从官——hajib)在喀什用突厥语写作了一部名叫《福乐智慧》(Qudatghu Bilig)的劝喻内容的长诗,献给当时黑汗王。qut(幸福)一词常用作(在该书许多地方也用作此义)现代的"陛下"之意。这种关于王公义务的劝喻性作品在古代东方(包括伊朗)很流行。这种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讲述关于历史或传说中的事件,作者通过这些来强调或说明某种理论学说。正是这一点恰为《福乐智慧》所缺少。书中没有提到历史人物,其中的Ilig王只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譬喻性人物(正义的化身)。其他人物分别由大臣及其子和兄弟所代表。所以《福乐智慧》一书比其波斯语范本来水平要低得多。

在该书前言中谈到,阿拉伯人和塔吉克人中有许多书,而用突厥语写成的则没有。这一点说明,在接受伊斯兰教后,以前用突厥语写成的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作品被忘掉得多么快。显然,从马·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中已知其存在的伊斯兰突厥诗歌尚未发展为大部头的作品。当时文学作品只能在喀什产生。据马氏说,那里的居民都讲王朝突厥语(Haqani Türkchä),而在喀什附近农村则讲坎恰克语,即指已开始突厥化了的原居民(他们不是突厥人)的语言。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福乐智慧》一书就文体和表达方式上与古代突厥传统有何联系,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同时代的人。《福乐智慧》一书现存三个写本:一个为回鹘文本,1439年写于Herat(耿按:在今阿富汗西北部),两个为阿拉伯字母本。一个在开罗,另一个在费尔干(耿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发现。作者自己是用哪种文字写成的,回鹘文抑或阿拉伯字母?这个问题目前

尚有不同意见(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可能性更大些)。书名本身以及使用 qut 一词表示"尊贵、陛下"之意表明,在喀什伊斯兰教和波斯语的影响也未能把突厥传统从宫廷生活中排挤出去。《福乐智慧》的名称后来也见于蒙古时代。如据说是成吉思汗传下的一部箴言集(《论丛》,XⅢ,015 以下)就是这样叫名的。据 15 世纪作者依本·阿拉普沙(Ibn Arabshah:Fākihat al-hulafā,埃及版本,1315 年,页 184),Qutadghu 也用来指蒙古人使用的回鹘字母。不过那里他错误地把这个词同成吉思汗出身的部落名字搞混了(把该部落名字 Qiyat 误读为 Qattat)。有人认为(波·梅里奥兰斯基,《论丛》,XⅢ,021),至少就其名称来说,布格拉汗的"回鹘语的"《福乐智慧》(Qutadghu Bilig)曾给蒙古人以影响,所以才有成吉思汗的 Qutadghu Bilig 的出现。不过马·喀什噶里《词典》出版后,下面这点已没有问题,就是黑汗王朝的人民并不称自己为"回鹘"。尤素甫也不称自己作品的语言为"回鹘语"。同样,像《福乐智慧》这一充满伊斯兰教精神的作品也不能为回鹘人所接受。当时回鹘人仍信仰佛教或景教,并且之后曾给蒙古人以影响。

从马·喀什噶里的《词典》中看不出他知道尤素甫的作品。136
后者比他开始写作自己的语言学著作早两年完成。已故的哈尔特
曼(M. Hartmann)说,尤素甫和马·喀什噶里的区别在于,前者作 137
品属于宫廷诗歌,而后者则属于民间诗歌传统。这种意见不一定正确。我们知道《词典》引用的诗歌中也有宫廷诗。另一方面尤素甫在自己的劝喻性长诗中也应用了民间的东西。在《福乐智慧》一书的一些地方也如《词典》中引用的民间创作的范例一样,有时用同样的词表达同样的思想。每一个读过《福乐智慧》的人都会想起《词典》中如下的格言:ärdäm bashi—til (道德之首为语

言,《词典》,Ⅰ,281,下)。

《福乐智慧》在当时可能享有一定的影响(尽管保存到现在的写本不多)。说明这点的如在 Saraichik(乌拉尔河口)发现的写有取自该书诗句的陶器。此外,不久前在土耳其发现和出版了时间稍后的同样性质的另一著作:《真理的献礼》(Hibatal al-haqā'iq)或称《真理的入门》('Aibat al-haqā'iq)。作者为阿赫买德·依本·马哈木德·尤格纳基(Ahmed ibn Mamud Yügneki)他用"喀什语"写成他的著作,献给一个名叫 Emir Dad Ispehsālār-Beg 的人。这个
138 作品同样是枯燥的说教,与实际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出版者:纳吉阿色木,伊斯坦布尔,1334 年,2 册。并参见让·德尼:《一回鹘文突厥道德书考》,载《穆斯林世界》,60,1925,巴黎,页 189—234)。《真理的献礼》的发现表明,《福乐智慧》一书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它在突厥文学中开创了一个"喀什"时代。但看来它对以后时期突厥文学的影响不大。

139 那个时代仍保有以前突厥与汉族文化紧密联系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汗的称号中。《词典》收有一已见于西辽的官职的汉名 tayangu(《词典》,Ⅲ,281),该词相当于阿拉伯语的 hajib(侍从官),应来自突厥语的 tayanmaq(支持)。还有已见于鄂尔浑碑文中的 qunchui(公主)这个词,用作"夫人",而 qatun 一词对妇女来说是比 qunchui 更高贵的称号(《词典》,Ⅲ,181)。

《词典》中表现物质文化的许多词中,引人注意的是 ulatu 这个词(《词典》,Ⅰ,122),表示"系在胸前,用来擦鼻子的丝绸块"。我们知道,古代和中古不论在希腊和伊斯兰世界都不用手帕。西欧第一次在 15 世纪当他们与远东中国文化接触后才使用这个东西。而中国从古代起就使用它。在中国的影响下,手帕也在蒙古

人中使用。11 世纪突厥人使用手帕应看作远东文化的影响。

喀什时期以后伊斯兰突厥文化的下一个中心为锡尔河下游地区的花剌子模。

第八讲

不论是 12 世纪作者萨木阿尼(Sam'āni)抑或 13 世纪作者雅库特(Yākūt)都未提到牙色(Yasi 或 Yesi)城(今之土耳其斯坦城),虽然这个地名早在 12 世纪时已存在。谢赫·阿赫买德·牙萨微(Shaih Ahmed Yesevī 或 Yasavī)即生于此地或至少在此地生活过,并在死后葬于此。阿·牙萨微死于回历 562 = 公元 1166—1167 年。据一些材料,他出自赛兰木(Sairam),该地当然不是指新疆的赛兰木(新疆的赛兰木当时尚不存在。它是由 16 世纪赛兰木移民建立的,《论丛》,XVⅡ,0188 以下),而是指位于今奇木肯特(Chimkent,《伊斯兰百科全书》,Ⅰ,891)东面的赛兰木,它也叫伊斯非加普(Isfijab)和 al-Madīnat al-baidā"白城"。该赛兰木已见于马·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词典》,Ⅲ,133)。

阿·牙萨微(他被突厥人称作 Ata Yesevi)似在传播伊斯兰教 142
(特别是其神秘派)于突厥人中起过很大的作用。他用突厥语写成的神秘派诗歌享有很大的声誉,并且一直到今天还有中亚民间诗人模仿他。可惜正是由于其作品的广泛传播,所以其作品的原貌未能传下。现存大量的写本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也改变了其原作的语言。关于阿·牙萨微的情况,我们几乎全靠很晚时代的传说而得知一些。据这种传说,阿·牙萨微有一突厥前驱名叫阿尔斯兰·巴巴(Arslan Baba 或 Bāb Arslan ,我们知道,在中亚阿拉伯语 bāb 有伊斯兰教传教师之意)。阿尔斯兰的儿子满速尔阿塔

(Mansūr Ata)是牙萨微的第一代继承人。牙萨微本人是波斯神秘派僧尤素甫·哈马丹尼(Yūsuf Hamadani)的第三代继承人。尤素甫·哈马丹尼从(伊朗)哈马丹来到突厥斯坦,并在1140年死于谋尔夫(Merv)。他在那里长期作为苏菲(Sūfi)派的教长(Shaih)领导这个教派。据其传记作者阿里·本·胡赛因·卡西非(Ali. b. Husain al-Kashifi)说,尤素甫·哈马丹尼不懂突厥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突厥神秘派的创始人。尤素甫的第二代继承人,也即牙萨微的直接前驱为谢赫·穆罕默·哈三·依本·胡赛因·安达基(Shaih Muhammed Hasan ibn Husain al-Andaqī),此人死于1157年。关于安达基,他的同时代人及朋友萨木阿尼曾留有一些记载,而关于牙萨微则萨木阿尼什么也未谈到,甚至其绰号(nisbe)"牙萨微"也不见于萨木阿尼专讲绰号的字典中(《伊斯兰杂志》,XIV,页112)。

对特别作为突厥圣人阿·牙萨微的崇拜长期存在于锡尔河地区,这一点正如14世纪末帖木耳在其墓上建筑雄伟陵墓所表明的那样。在阿·牙萨微的学生和继承人中有许多是用突厥语写作并带有突厥语称号"阿塔"的,其中一个为哈奇木阿塔(Hakim Ata)或称苏来曼·巴克尔哈尼(Sulaiman Baqirghani)。他的活动与花
143 剌子模有关。像牙萨微一样,哈奇木阿塔也用突厥语写有一部神秘派箴言集子,但不像牙萨微那样用诗歌的形式,而是用散文形式。哈奇木阿塔的箴言也像阿·牙萨微的一样是用通俗语言写成,是为广大群众写的。

144 花剌子模及锡尔河下游及与其有文化联系的城市是蒙古入侵前后活跃的文学和科学活动的舞台。在布洛克勒曼的阿拉伯文学史里有许多在花剌子模及其附近地区写作的作者的名字。据我所

知,君士坦丁堡图书馆所藏写本还有可能扩大这个名单。当然其中大部分是宗教著作,但就是这些著作也不只是对神学者有关,在这些神学著作中,据我所知有花剌子模语的材料。在12世纪花剌 145
子模学者中有像札马赫夏里(Zamahshari)和夏赫拉斯坦尼(Shahrastani)那样具有世界意义的学者。有个名叫穆哈买德·依本·哈依斯(Muhammed ibn Qais)的学者为花剌子模沙扎兰丁(Jalal ad-Dīn)写有一关于突厥语的"大书"(似用阿拉伯语)。这是继马·喀什噶里之后又一部关于突厥语的著作,可惜没有传下来。依本·木哈纳曾引用此书中的两条。突厥人似乎在花剌子模不仅掌握当时那里存在的高度文化,而且应用他们所学到的进一步发展了突厥伊斯兰文学。没有前蒙古时期突厥—花剌子模文学,就很难理解花剌子模以及一般说金帐汗国在蒙古时期在突厥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而这一点现在变得更清楚了。一位来自花剌子模的金帐汗国的诗人于1353年写成的作品[7],是用稍后在帖木儿时代被称作察合台语的文学语言写成的。这部作品不是在作者出生的花剌子模(他的绰号是Horezmi)写成,而是在锡尔河的下游写成(大英博物馆写本编号8193,页312a:Syr yaqasynda"在锡尔河畔",以及阿·萨莫依洛维奇发表在《米尔·阿里歇尔》中的论文,列宁格勒,1928,页17)。诗人花剌子米(像我在君士坦丁堡时所确定的那样)也有前驱。现存库特布(Kutb)的诗篇《胡斯老与谢琳》(写本现存巴黎,古代突厥语写本部,编号:312)不是像花剌子米的作品那样,写于贾尼别克(Janibek)时代,而是献给其兄提尼别克(Tinibek),他当时还是"王子"。由此可知作者写于乌兹别克汗(提尼别克之父)时代,即1340年前。在锡尔河下游,在巴尔乞坎特(Barchkend)城(又名Barchin及Barchinligh),13世纪下半期

有一法学家名叫胡萨米丁。哈米德·依本·阿西木·巴尔琴勒黑(Husam ad-Din Hamid ibn Asim al-Barchinlighi),他能用三种语言写作。据贾马勒·卡尔西(Jamal Qarshi,他认识这位学者)说,他的阿拉伯语著作是"善辩的"(fasih),波斯语著作是"敏锐的"(melih),而他的突厥语著作是"真实的"(sahih)(巴尔托里德:《突厥斯坦》,第一册,原文,页151)。

147 阿里马人贾马勒·卡尔西约在1230年生于阿里马(此人到14世纪初尚在世),但之后主要生活在喀什。他在回历672=公元1273—1274年旅行到巴尔乞坎特,并在那里与胡萨米丁认识(《论丛》,XI,207)。贾马勒·卡尔西的叙述表明,金帐汗国文化尚在13世纪就对突厥斯坦文化发生了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不久以前既不为中亚人所知,也不为欧洲学者所知。16世纪初巴布尔(Babur)认为察合台古典诗人阿里歇尔·那瓦依(Alishir Nawayī)的作品是用费尔干安集延城的方言写成。拉德洛夫1888年(《论丛》,Ⅲ,Ⅰ以下)企图证明巴布尔搞错了,并认为察合台语是一种人为的书面语,它不与任何地方话的口语有关。拉氏还认为,察合台语的来源与东部对西部的文化影响有关,即和从回鹘语(当时尚不知鄂尔浑文碑铭)直到写成于1310年的《圣徒传》(Qisasī enbiya)的影响有关。拉氏认为后者尚用"纯回鹘语"写成。该文学语言在金帐汗国的传布(如属于14世纪末的托克塔米失和帖木耳库特鲁克的敕令语言所表明的),拉氏认为是在14世纪。据他的意见这些敕令是由"熟悉察合台文学语言的"人写的。当时尚不可能认识察合台语只是由于金帐汗国对突厥斯坦的文化影响才形成的,而不是相反。

察合台文学语言没有蒙古的入侵是不可能形成的。

历史家拉施德艾丁把前蒙古时间鞑靼(Tatar)这一族名与住在捕鱼儿海(Buir-Nor)的原来这个词的含义的鞑靼国联在一起,并使其得到广泛传布。现在我们知道鞑靼一词很早以前就已使用(从鄂尔浑文碑,即从8世纪开始)。10世纪时它见于《世界疆域志》一书,11世纪时见于马·喀什噶里的《词典》。从各方面看来,该词一开始就指说蒙古语的部族,从拉施德艾丁和其他材料看来,蒙古语与突厥语分布的界限差不多和现在一样。说蒙古语的有乃蛮人(Naiman),他们占有从鄂尔浑河的西蒙古一直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以及他们的北邻——住在叶尼塞源头(名为Sekiz Muren"八河")的斡亦剌惕(Oirat)人。"八河"一名表明这里蒙古语与突厥语混合了(Sekiz是突厥语"八",muren是蒙古语"河")。斡亦剌惕人以北为居住在叶尼塞河(突厥语名字叫Kem)上的说突厥语的黠戛斯人。额尔齐斯河流域乃蛮部的邻人为说突厥语的康里、克普恰克,可能还有葛逻禄,其首府为海押立。该城不早于12世纪以前建于七河地区的北部。

于是,锡尔河(包括其右岸)地区从费尔干直到咸海(Aral Sea)为花剌子模国之边界。从前属于西辽的其他穆斯林地区(除极北之葛逻禄国以外,它自愿归属于成吉思汗)归属于屈出律(Kuchluk)政权,他为来自东方的乃蛮人的首领,一个景教徒。根据一些史料,他在西辽改宗了佛教。屈出律于1211年篡夺了(西辽)菊尔汗的权力。 155

这时,即在1211—1214年之前不久在阿里马城(它似乎在此不久前出现,在今伊犁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穆斯林小国。这个小国的建立者原为匪徒和盗马贼,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一个王朝的始祖。这个小国一直存在到14世纪初,他一开始就归顺成吉思汗。 156

之后屈出律得到机会在狩猎时捉到他并处死。但其未亡人在屈出律大军围城时守住了阿里马城,直到蒙古援军到达解围为止。屈出律对成吉思汗另一属国——葛逻禄阿尔斯兰汗也未采取什么行动。他集中力量攻占喀什地区。在占领该地区后,实行了该地区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对伊斯兰教的迫害。据说屈出律曾下令让当地穆斯林改穿西辽人的衣服,禁止做礼拜。他在和阗处死了一个依麻目。他让乃蛮士兵住在每个穆斯林家中进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也得不到花剌子模沙的任何帮助,只是1218年当蒙古军队到达后才解除了这种压迫。

157 花剌子模沙这时仍继续进行与异教徒的战争,他把打击的对象转向锡尔河以北地区不够强大、组织也不够好的敌人——克普恰克人。在这里,在依尔黑孜(Irghiz)附近,花剌子模沙的军队与追赶西逃的蔑儿乞(Merkit)人的术赤率领下的蒙古军发生了多少带有偶然性的遭遇战。

第九讲

165 14世纪上半期,花剌子模与伏尔加河地区的联系比与锡尔河地区的联系要密切些,在乌兹别克汗时代同时在伏尔加河地区和花剌子模城市用该汗的名字铸造钱币。而在苏格那克,当时则用另一汗(当然也属于术赤一族)的名义铸造。术赤及其家族的领地开始也包括西辽版图的北部地区:七河地区一部分连同海押立城,以及一般说从额尔齐斯到阿拉库尔、伊犁河及锡尔河的整个地区。1246年普兰诺·卡尔皮尼(Plano Carpini)东来时,术赤的大儿子斡尔达(Orda)住在该地区的东部,距额尔齐斯河不远。西部,即伊犁河与锡尔河之间地方属于术赤的幼子昔班(Shiban)。

穆斯林作者后来把他的名字改为舍依班(Shaiban)。因此16世纪初昔班的后代,即乌兹别克汗国的建立者取了一个与阿拉伯部落名字相同的诗人名字舍依班尼(Shaibani,关于舍依班尼朝可参看巴尔托里德在《伊斯兰百科全书》页294中的文章)。

据阿布勒哈孜(Abu'l-Ghazi)说,昔班从其兄拔都(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Ⅰ,709以下)得有位于拔都自己领地与斡尔达领地之间的地方。他度夏在依尔黑孜奥拉(Ora),伊列克(Ilek)河畔,即一般说在乌拉尔河及乌拉尔山以东,过冬在哈喇库木、阿拉库木(?)以及锡尔河、楚河、萨拉苏(Sarisu)沿岸一带。

阿布勒哈孜,一位17世纪的作者,没有谈到他的史料来源,但一般说他的材料与斡尔达、拔都及昔班的同时代人普兰诺·卡尔皮尼的记载是一致的。昔班的后继人尚在其他地方有过活动。据拉施德艾丁(布洛舍刊本,页117),昔班的孙子是铁列克(Terek)地方戍军的首领。昔班的领地直到15世纪仍在其后继人的手中。其世系(没有太大的矛盾)见于阿布勒哈孜及15世纪佚名历史家的世系著作《显贵世系》中。术赤汗国所属各部分中,以昔班后代所属地区保存的游牧生活方式最多,但就在这里,政权保留在同一汗室成员的手中达200年之久。这在游牧民中是个罕见的现象。由于昔班的继承人受城市文化影响最小,所以能保有游牧人之战斗传统,并因此能在成吉思汗王朝的政权几乎到处完全没落之时,在一个时间里扮演侵略者的角色。

事实上术赤汗国之西部(这里为其次子拔都统治,同时也是 167
他父亲整个领地的最高统治者)在蒙古时代文化有了相当的繁荣。蒙古人住在为其灭亡的伏尔加布勒加尔汗国境内,并满足于收取俄罗斯大公之贡赋,以及在开始时在那里派驻代表。当蒙古

军在1223年从俄罗斯班师回到成吉思汗那里时,路上受到布勒加尔人的包围,受到很大损失。于是1236年蒙古人对布勒加尔人进行报复,一举攻占了布勒加尔汗国并摧毁其首府。但被摧毁的首府又迅速恢复。所有那里至今保存的建筑物及碑文都属于蒙古时代。在一个长时期里布勒加尔城是术赤王朝地区内惟一铸造蒙古汗钱币的城市。从碑文中知道居民在14世纪初尚保有其蒙古时期以前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残留为今楚瓦施语。但他们应逐渐受到克普恰克突厥语的影响。突厥语在这里也如蒙古统治的中亚一样逐渐成为国家的语言。14世纪蒙古统治时期建于伏尔加中游的城市(如喀山),从各方看从一开始就是讲突厥语的。在伏尔加下游,早在拔都时代就建有新的城市。传教士鲁布鲁克在1253年去蒙古的路上,在伏尔加河看到"一新的居民点,为鞑靼人用俄罗斯人和撒拉森人(即穆斯林)居民建成,他们把去拔都宫廷和从那里回来的使节渡过河"。这里指萨拉托夫附近后来以Ukek知名的地方。1254年从蒙古回来时鲁布鲁克提到一新城萨莱(Sarai)。该城为拔都在阿的勒河(伏尔加)上建成。鲁氏曾经过该城。他只说"萨莱及拔都宫廷在河东岸",没有描述该城和宫殿。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在伏尔加河支流的中部,有一前蒙古时期的城市:Summerkent。据说蒙古人曾围攻它达八年之久。

169 萨莱为波斯语,早已为突厥人借入,此词已见于《福乐智慧》一书,蒙古时代一般用来称汗的驻地以及在其周围形成的城市。关于伏尔加河上萨莱城的位置在科学界尚未解决。由于钱币上和一些写本中提到新萨莱,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即萨莱一名是指称两个城市或只指一个城市。据鲁布鲁克的材料,原来由拔都建立的第一个萨莱位于遗址在今色里特列尼(Selitrennyi)村的地方,另一

萨莱与拔都的兄弟别尔哥(Berge)的名字有关,位于察列夫(Tsarev)地方。从那里存留的遗址和发掘时出土文物来看,它在历史上应具有很大的意义。

目前,有人认为(关于金帐汗国的萨莱城可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IV,P. 16 以下)位于色里特列尼地方的不仅为拔都的萨莱,也为别尔哥的萨莱,而察列夫的新萨莱,只是在乌兹别克汗在位时才出现,到贾尼别克时代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此史料上的别尔哥萨莱就指乌兹别克汗时存在的萨莱。现存有回历 710,即公元 1310—1311 年乌兹别克汗即位前铸于新萨莱的钱币。此外,有人告诉我在君士坦丁堡存有一部回历 705,即公元 1305 年写于新萨莱的神学著作。形容词"新"(阿拉伯语为 al-jadid)见于蒙古时代南俄许多城市的钱币上,我们很难认为所有这些都指名字一样的两个城市(一新一旧)。很可能随着城市的扩展,新城区被称作"新城"。

与术赤领地东部地区相反,在拔都和别尔哥后继人领地内,城市生活更发达些。我们见有许多城市铸有钱币。值得注意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钱币型式。根据近年来在萨莱和其他地方的发掘品,人们开始谈论金帐汗国(这是俄国编年史中的叫名,据我所知,该名不见于东方史料[8])的文化,甚至谈论鞑靼人的文化。这个问题尚待长期的研究,直到我们有把握地能说什么民族在哪个城市或者在哪个地方占优势,以及以伊斯兰教和突厥语的胜利而结束的该文化是如何演进的。 170

蒙古成分在金帐汗国不是很大的,突厥语很快就取得了优势,尤其在金帐汗国与蒙古本部中断联系后。拔都以及其他生前的别尔哥都参加决定有关整个帝国的事情,并且为此目的他们都曾亲

赴蒙古。鲁布鲁克1253年谈到整个帝国分为拔都和住在蒙古的大汗蒙哥(Mängü)的两个势力范围。其边界是经过怛逻斯河与楚河之间的地带。穆斯林作家也谈到河中地城市属拔都和别尔哥。1260年后,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后代阿鲁忽(Alghu)的国家变强了,并扩展到从前属于金帐汗国的一些地区。阿鲁忽占有了花剌子模,几年后并从别尔哥手中夺取了讹答剌(Otrar)城并破坏了它。这一地区稍后又重新属于金帐汗国版图。但金帐汗国的汗没能更向东扩展。早在别尔哥统治时(1257—1266年)金帐汗就由蒙古帝国第二号人物变为一独立国家的统治者(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Ⅰ,737"别尔哥"条),虽然只是在下一个汗蒙哥帖木耳(Mängü Timur)在位时才开始以其名字铸造钱币。名义上术赤家族所有其他汗都臣属于金帐汗(包括斡尔达和昔班的后代),但这种从属关系不具有事实上的意义。一些历史家称金帐汗国为兰帐汗国,称斡尔达后继人的领地为白帐汗国,但用的不是蒙古语,而是突厥语Kök(兰)和Aq(白)。但在另一些史料中,兰帐(Kök Orda)一语用来指斡尔达后继人的领地。15世纪初一佚名历史家(关于这部佚名作可参见里奥:波斯语写本目录,页1062以下)甚至说,只是在托赫塔汗[9](1290—1312年)在位时,在他与叛乱的王子诺盖(Nogai,他于1300年被处死)之间的战争后,才分为白帐(在东)和兰帐(在西)的。据这一史料,白帐汗是诺盖的后代。这一点根本不符合史实,并且这表明在15世纪在波斯(佚名作写于此)已不太了解术赤后代的历史。阿布勒哈孜称昔班领地为白帐。除斡尔达和昔班后代的领地外,金帐汗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比成吉思汗其他后代领地要巩固得多的国家。在个别地方也有具有自己的牙帐(Orda)和军队的王子,但他们都承认汗的统治。但

172

从多瑙河到花剌子模并且直到锡尔河下游的整个金帐汗国领地内,已不存在任何前蒙古时期的王朝了。

像其他地方一样,金帐汗国蒙古人也带来了回鹘文,这种文字 173
在此以前很难说为克普恰克地区所知。现存用回鹘文写成的金帐汗国的敕令(jarlygh)属于14世纪末。属于此时期的尚有托赫塔迷失(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IV,P. 874以下)后期的钱币。上面的汗名用回鹘文写成,使用回鹘文只见于在萨莱铸成的钱币,并且在这里也并不完全如此。这些钱币表明,汗的名字有时为蒙古语的,可能还有突厥语的,读成不同于用阿拉伯字母写成的音。如贾尼别克(1341—1357年)的名字回鹘文写成Chambek。据阿布勒哈孜说,蒙古语在15世纪尚使用,但缺乏证据。在金帐汗国没有发现用蒙古语铭文的钱币,而有用突厥语Qutlugh bolsun(万寿无疆)字样的钱币(佚名钱币,且属于较后期)。依本·巴图塔(他曾到过乌兹别克汗的牙帐)在那里只听到说突厥语。在谈到宫廷妇女时,他提到如ulu hatun、kichik hatun(即"大皇后"、"小皇后")等突厥语称号。汗称其来自Sayyid(圣裔)的精神指导人和顾问做Ata(父亲)。突厥语也用于祈祷。在阿扎克(Azak)城,当着依本·巴图塔的面,一位伊斯兰教士为苏丹(即乌兹别克汗)、阿米尔(阿扎克城的阿米尔为花剌子模人)以及在座的人用阿拉伯语作祈祷,然后由他自己译成突厥语。当然这不是在礼拜寺内,而是在宴会上。在诵读可兰经后,人们唱歌,首先唱阿拉伯语歌,然后唱波斯语、突厥语歌。

伊斯兰教的传播比起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勒加尔人的影响来,可能更多地与花剌子模和中亚突厥人的影响有关。当地突厥人——克普恰克人早在前蒙古时期就从两个方面(俄罗斯和西

欧)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蒙古时期仍然存在。这点可从13世纪末的克普恰克语字典(即Codex Cumanicus)看出。内中有伪福音书(Evangelium)和天主教赞美诗的突厥语译文,都翻译得相当成功。这表明传教士有很好的突厥语知识。

汗国内伊斯兰教占优势,所以有原信基督教后改宗伊斯兰教的。汗国内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免征赋税。在萨莱城于1261年当穆斯林别尔哥汗在位时曾建立了一个东正教教区(Orthodoxe Eparchie)。

关于别尔哥皈依伊斯兰教的事,后来有不同的说法。据阿布勒哈孜说,当他已继位为汗时,由于两个来自布哈拉商人的关系而皈依伊斯兰教。另一说法是,当他尚未即位时,由于受到霍占德(Khojend)或布哈拉的谢赫们的影响而接受伊斯兰教。此外,甚至把拉施德艾丁书中关于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扯到别尔哥的身上:说他拒绝吃异教徒母亲的奶。从鲁布鲁克书中知道,别尔哥尚在拔都活着的时候就已成为伊斯兰教徒了。并说在他的牙帐中不用猪肉。不仅汗本人,甚至其妻妾及近侍人也为伊斯兰教徒。他的每一个妻子和每一个阿米尔都有一位依麻目和一位木阿津(喊人做礼拜者),并有教儿童可兰经的学校。但同时保有一些与伊斯兰教格格不入的老的习惯。如不用河水洗衣服和盥洗,埃及使节被告知,他们在牙帐不能洗衣服,需要的话只能偷偷地洗。

176 别尔哥死后,金帐汗国又为异教徒汗统治。伊斯兰教在金帐汗国的最后确立是在乌兹别克汗在位时(1312或1313—1340年)。据依本·巴图塔记载,乌兹别克汗的导师为一"圣裔"阿不达勒·哈米德(Abdal-Hamid)。还有另一说法(大英博物馆所藏写本:《补正》26,190。比较里奥:波斯语写本目录,163以下;巴尔

托里德:《突厥斯坦》,英译本,56 以下,及梅立斯《突厥世系》译本,伦敦,1838,页 232),是突厥斯坦人谢赫·赛依德阿塔(Shaih Sayyid Ata,本名阿赫买德,是葬于塔什干的赞基阿塔的学生)使乌兹别克汗接受伊斯兰教并给他取了个苏丹·穆罕默德·乌兹别克汗的名字。这件事发生在回历 720 年,也即鸡年(1312 年)。同时这里还讲了一个传说,说圣人之后是如何指引乌兹别克汗的臣民来到河中地的,他们在那里依其汗名开始称自己为乌兹别克,而那些不听谢赫话的留在突厥斯坦的,得名卡尔梅克(Qalmaq,"留下"之意)。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还有其他史料(其中包括阿布勒哈孜),说乌兹别克人的名字是来自乌兹别克汗的名字。

15 世纪的历史家常称术赤后代的国家(乌鲁斯)做"乌兹别克乌鲁斯"。在中亚,以后人们把乌兹别克作为部族名与察合台(原为成吉思汗次子的名字)对立起来,后者用来称呼突厥斯坦的游牧民,他们组成当地汗的主要兵力。

第十讲

尽管版图辽阔,但三个王子(指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的牙帐 180
相距不远。术赤牙帐在额尔齐斯河上游。据最早材料,他也是埋葬在那里的。虽然后来说其墓更靠西,在萨尔苏,即在昔班领地内(巴氏:《突厥斯坦》英译本,页 392)。这一说法倒是更适合于蒙古人的习惯,即父亲之牙帐留给幼子。术赤死后,其长子斡尔达在额尔齐斯河。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伊斯兰百科全书》,Ⅰ,页 898,之后为大汗)牙帐靠南边一些,在叶米里河(额敏河)岸,此河注入阿拉湖。窝阔台葬地据拉施德艾丁说,在距额尔齐斯河两天路程的一座高山上,额尔齐斯河一支流就发源此山。

没有史料可以确定窝阔台领地的界限。朱外尼说窝阔台的牙帐(yurt)尚在其父在世时"位于叶米里与库布科界内"(基普纪念丛书,XVI,31)。这是两条几乎发源于同一地方之河流,一个流向西,一个流向东。朱外尼书中谈到察合台的牙帐和领地比较确定些。其牙帐位于阿里马城附近之库牙斯(Kuyas)处。其领地"从回鹘边地直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从其他史料中知道库牙斯和察合台的牙帐都在伊犁河南岸地区。库牙斯作为位于"巴尔斯罕后面"的城市已为马·喀什噶里所提到(《词典》,I,页330),在《词典》另一处(Ⅲ,129)说,整个土赫色(Tuhsi)和处月地区叫哈牙斯(Kayas,或库牙斯)。那里有三个城堡,名为:Sablygh Kayas, Uzung Kayas, Kara Kayas。朱外尼书中称察合台及其最初几个继承人的牙帐为突厥语的 Ulugh Ev "大房子"(在这样早的时期出现牙帐的突厥语名称很有趣)。察合台及其继承人的葬地不明。

这样,成吉思汗三子的牙帐位于从额尔齐斯河上游到伊犁河以南地区的相对小的范围内。

182 虽然一直到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河中地属察合台,但那里由窝阔台委任的马哈木德·牙剌瓦赤(Mahmud Yalavach,驻地在霍占德)统治。之后,回历636即公元1238—1239年察合台不经其弟同意罢掉了牙剌瓦赤,并另任总督。这样,河中地成了察合台的领地(inju)。但据拉施德艾丁说,窝阔台又委任了牙剌瓦赤之子马思忽惕别克(Mas'ud Bek)统治从哈剌和卓、别失八里(即回鹘王国)、和阗、喀什、阿里马、海押立、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直到阿姆河岸的地区,牙剌瓦赤本人则任为大都(北京)的总督,并于1254年死于任上。

183 马思忽惕别克在喀什建立了第二个马思忽狄亚,即以其名字

命名的伊斯兰教高等学府——Medrese,另一个在布哈拉。14 世纪初他的第三个儿子迁居喀什。引人注意的是,这个花剌子模出身的穆斯林商人竟能在历经政治变动后保住其职位,并传给他的后代。在描述当时的新疆地区时,马可波罗把和阗及其以东地区称做忽必烈的领地(玉耳:《马可波罗游记》,伦敦,1875,Ⅰ,196)。但那里又说,喀什附近地区属于"大突厥国"(马可波罗称海都国的用语)。关于莎车(Yarkend),他确定地说是属于大汗的侄子(这里马可波罗错误地指海都)。有趣的是:拉施德艾丁说,回鹘地区在忽必烈与海都交战时守中立,他和双方都保持关系(拉施德艾丁《史集》,布洛舍刊本,页 502)。显然那里仍为亦都护朝统治。亦都护巴尔术(Barchuk)于 1209 年臣属成吉思汗,1218 年参加对屈出律的征伐。之后又参加了征讨花剌子模沙。最后参加了征服西夏。巴尔术死于窝阔台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相继继位。第一个死于窝阔台的寡妇秃剌乞纳(Turakina,1241—1246 年)统治时期。第二个在蒙哥统治时期因被控他要在一个主麻日(星期五)在一大礼拜寺中杀死别失八里所有伊斯兰教徒而被处死刑(详见朱外尼书,基普丛书,XVI,341)。其弟取下了他的首级并继位。没有关于亦都护朝的其他史料。

一方面大汗以海都之领地扩大自己的属地,另一方面中亚蒙古汗国在海都时,以旭烈兀(Hulagu)和术赤的后人的领地扩大自己在南方和西方的地盘。术赤乌鲁斯逐渐失去其东部地区,即锡尔河下游以东地区(虽没有详细史料说明 13 世纪下半期斡尔达后人的住地在何处)。根据拉施德艾丁,斡尔达后人孔奇(Konchi)的驻地更靠西和西北。据马可波罗说孔奇的领地更靠北,那里人们像"野兽"一样生活。孔奇死于海都尚活着的时候,继位的

188 为其子巴颜(Bayan)。
189

14 世纪初中亚尚存在一些前蒙古时期的当地王朝(这一点则与金帐汗国相反)。关于这一点一方面见于贾马勒(艾丁)·卡尔西的著作(写于 14 世纪初),另一方面见于用纯粹阿拉伯语写成的墓志铭。其统治者都带有阿拉伯语 Malik(王)的称号(像前蒙古时期波斯和中亚的藩王一样),有时加上表示高贵称号的 Sultan(苏丹)和 han(汗)。贾马勒·卡尔西提到费尔干的统治者伊勒奇·马立克·沙(Ilchi Malik Shah)。在乌兹坎德存有其子和继承人萨特勒米施·马立克·沙(Satylmish Malik Shah)之墓。他死于回历 665 = 公元 1226—1227 年(墓志见 Protok, Turk Kruzhka Liub. Arch., II)。从名字和称号看,这些统治者为突厥出身。有些名字和称号很古老。如在阿乌里亚阿塔(Auliya Ata)葬有一死于 1262 年的名叫 Baligh Bulge Ulugh Bilga Iqbal Han 的当地王(《论丛》, XII, p. 5)。墓志都是由学者用阿拉伯语写成。贾马勒·卡尔西引用了一个他自己在占德(Jend)作成的阿拉伯语墓志(为突厥圣人卡马里丁·花剌子米·苏格纳基 Kamal ad-Din Horezmi Sughnaqī 之墓而作。此人死于 1273 年)。贾马勒·卡尔西又引证了一距霍占德不远、位于锡尔河岸边的墓上的阿拉伯语诗的波斯语译文。同时他还摘引了献给和阗苏丹孟米施特勤(Munmish tegin,时代不明)的波斯诗:"愿你活的这样长久,啊,沙!突厥人都说:孟米施非常长寿"。后面的词语为突厥语(chāndān bizī ey shāh ki gūiyad Turki "yavlaq qari bolmish Munmish Tegin",参见《突厥斯坦》,俄文版, I ,151 以下)。

说明 13 世纪存在当地王朝的还有中亚各地(如讹答剌)铸造的钱币。这些钱币通常以当地王(Malik)的名义铸造,但不称其

名。未发现以海都、笃哇名字铸造的钱币。而在金帐汗国早在蒙哥铁木耳(Mangu Timur)汗时就以其名字铸造钱币了。但目前缺乏关于由汗直接治理和由以前当地王治理的地区之间界限的史料。

察合台牙帐在阿里马城(耿按:遗址在今伊犁地区霍城)附近。那里由一其创建者自动归顺成吉思汗的当地王朝统治。1253年鲁布鲁克访问了海押立,并在那里停留了12天。他说这是"一座大城,市场上很热闹"。(柔克义译本,页140)。有趣的是这个穆斯林城市中有三座属于回鹘人的寺院。如能发现该城的遗址就好了。可惜其方位也确定不了。在海押立北部,鲁布鲁克来到一居民点,那里居民全是基督教徒,并有教堂,但目前在七河省北部地区尚未发现景教碑文。

在伊犁河之北、海押立之南地区,鲁布鲁克又见有一"漂亮 191
的"穆斯林城市。但居民不说突厥语,而说波斯语(柔克义译本,页139)。他们应为不久前来自河中地南部的移民。总的说来,当时伊犁河北部平原的城市生活已趋衰落。以前这里曾有许多城市,但为了用作牧场大都被鞑靼人破坏了。鲁布鲁克并说这些地方大部分为土尔克曼(Turkmen)人所占有(这里鲁氏可能用此名指一般突厥人)。鲁氏关于该地区文化衰落的话也为汉人常德所证实(常德为鲁氏之同时代人,他在1259年为蒙古大汗蒙哥派往其兄弟旭烈兀处时经过此区,留有《西使记》,英译文见布列特施耐德《中世纪研究》一书)。常德说在以前西辽领地,人口众多并有灌渠,但同时也有许多废址。

贾马勒·卡尔西的《补订》(Mulhaqāt)一书(为他翻译的一本 194
10世纪阿拉伯语字典的附录)中有许多关于中亚城市的有趣材

料。16 世纪作者穆罕默德·海达尔(Muhammed Haidar)曾责备贾·卡尔西偏袒其出生地巴拉萨衮城,说他列举每个城市著名人物时,列举的撒马尔罕人不到十名,而在列举巴拉萨衮人时则多至不可能在同一城市同一时间内有这么多的人才(罗斯英译本《拉希德史》,页 364)。在《补订》惟一写本未发现以前,人们期待发现其他关于巴拉萨衮城文化生活的历史、文学材料。但在发现该书写本后,情况并非如此。那里并未提到巴拉萨衮城。关于该城出生的著名人士也只提到作者的导师夏木西丁·艾尤比·巴拉萨衮尼及其子鲁肯艾丁·阿赫买狄·巴拉萨衮尼(《突厥斯坦》,俄文本,Ⅰ,141)。还提到虎思城(Quz Baliq,同上书,Ⅰ,140),说那里1259 年葬有一阿里马王。这里的巴拉萨衮可能就是马·喀什噶里书中(《词典》,卷 1,页 60 及 112)的虎思斡耳朵(Quz Ordu,此地名也见于 13 世纪汉文史料,参见布列特施耐德书,卷 1,页 18)或虎思乌鲁斯(Quz Ulus)。但奇怪的是贾马勒·卡尔西不用其本名称巴拉萨衮城(这点可从他的导师的名字中看到)。另外,在贾马勒·卡尔西的书中还有一不见于其他史料的地名:Il Alargu。这是察合台汗牙帐的所在地。察合台汗的大臣、商人库特比丁·哈巴失·阿买德(Kutb ad-Dīn Habash Amid)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可从其表示出生地的名字 Il Alargawī 看出(《突厥斯坦》,俄文本,Ⅰ,140)。此人于 1260 年当阿鲁忽(Alghu)在位初年死于阿里马地区一城市并葬于他建立的一礼拜寺内。

195 贾马勒·卡尔西对一些城市(如阿里马、喀什、和阗、霍占德及属于费尔干地区的察失、巴尔赤坎德、占德)都有简单的记载,介绍每个城市以及那里著名的学者和人物。贾马勒·卡尔西生于阿里马(其父生于巴拉萨衮),之后迁居喀什,并到过中亚其他一

些城市。他谈到喀什(当时处于一片瓦砾中)和占德(从前是很大的城市)的衰败,但商业仍很活跃。在谈到喀什时,他说该城遭到朱塔(Juta 或 Jeta)(耿按:指游牧的察合台人)人的入侵,这里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个术语。该词以后在新疆用来表示西突厥斯坦哈萨克(Qazaq)一词的含义,即指离开自己的汗和部落、从事抢掠的游牧民之意。朱塔的入侵是在冬天,未提是哪一年。还谈到喀什地区种地不用耕畜,而只用园艺工具(原文为 kuländ,意为"大斧",《突厥斯坦》,俄文本,页 144)。现在喀什显然不缺乏耕畜。

13 世纪时,虽然缓慢,但突厥斯坦地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 196
在顺利进行着。成吉思汗时代,情况正与屈出律时相反,那些在蒙古占领时活下来的黑契丹人穿穆斯林衣服(布列特施耐德书,Ⅰ,页 29)。现在以前西辽领地内的伊斯兰教徒的状况比曾反抗蒙古人的花剌子模国内的要好些。

屈出律时对于伊斯兰教徒的迫害在蒙古时代没有重演,虽然 197
察合台作为蒙古习惯法的狂热维护者有时也因伊斯兰教徒保持伊斯兰教习惯而惩罚他们。察合台死时朱外尼引用一波斯诗人的诗作讽刺他。诗的末尾说:"这个人们在他面前不敢入水的人,现在他自己沉到大洋中了。"(基普纪念丛书,XVI,228,作者为萨狄德·阿瓦尔 Sadid A'war。但察合台有穆斯林御医,名叫马吉德·艾丁 Majd ad-Dīn)。此外,大商人库特卜·艾丁·哈巴失·阿米德(Qutb ad-Dīn Habash Amid)有很大的影响(据贾马勒·卡尔西,此人为起儿漫人;据拉施德艾丁,为讹答剌人)。他的影响是这样大,他让自己的几个儿子作察合台每个儿子的伴当。人们说他害死了著名学者尤素甫·萨卡基(花剌子模人)。萨卡基除著有当时在伊斯兰世界享有盛名的百科全书《科学的钥匙,Miftāh al-

Ulum》外，尚存有一封他写给其学生穆罕默德·萨恰克里扎达（Mubammed Sachakli-Zade，也为西突厥人）的书信（参见布洛克勒曼：《阿拉伯文学史》，Ⅰ，296）。

关于这个时期突厥斯坦穆斯林学者的科学活动我们知之不多。我们不知木八剌沙（Mubarek Shah）和八剌（Boraq/Baraq）（他们是察合台诸汗中首先皈依伊斯兰教者）的宗教导师是谁。贾马勒·卡尔西说木八剌沙的母亲额儿格涅可敦（Ergene Hatun）也是伊斯兰教徒。海都不是伊斯兰教徒，并依蒙古习惯葬于楚河和伊犁河之间的高山上。

198 说明当时突厥语重要性的史料：拉施德艾丁书中在谈到成吉思汗家族时，同时使用蒙古和突厥语词 yeke noyon 和 ulugh noyon（“大诺颜”之意——译者）。当时伊斯兰教徒尚未试图使突厥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1246 年当普兰诺·卡尔皮尼离开蒙古返回欧洲时，人们交给他一封用“萨拉森语”写给教皇的信（该信盖有贵由汗的印。波斯文原信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伯希和教授说信的日期为 1246 年 11 月，用蹩脚的波斯文写成，说明作者的母语不是波斯语。信的抬头为突厥语，未写贵由汗的名字，而以“大乌鲁斯及全世界之汗的命令”（ulugh ulusnung taluinung han yarlighumuz）开始。信中也见有突厥语词。作者应为中亚突厥族商人，他是用当时通用的书面语写此信的（参见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页 3—30）。

第十一讲

202 14 世纪初窝阔台及察合台系诸王的内乱给中亚地区造成很大的破坏。由于河中地和突厥斯坦具有悠久的城市生活和农业传

统,所以战乱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但北部地区的情况则不同。阿拉伯史家乌马里(al-Umarī,1301—1348 年)引用一个到过突厥斯坦的人的话说:“在突厥斯坦人们只能看到许多废墟。人们从远处看到周围绿葱葱的村庄,但当走近时,则只见一片残垣废墟。居民都是牧民,不事农耕”(《法国所藏东方写本摘译》,XⅢ,第一分册,页 257 以下)。

也先不花(Isan Buqa)的后继人为怯伯(Kebek)(1318—1326 年在位)。他在位对中亚蒙古诸汗逐渐接受伊斯兰文化具有巨大意义。像他的前辈一样,怯伯也为异教徒。他曾迁居河中地,并在纳赫舍普(Nahsheb,卡失卡河下游)附近建一宫廷(Saray)。蒙古人用“卡尔西”(Qarshi)一词表示宫廷。此词早已见于《福乐智慧》和《突厥语大词典》(《词典》,Ⅰ,354,215,376)。这个突厥词显然为突厥人借自新疆塔里木盆地古代居民的语言。

怯伯的另一创新就是以汗的名义铸造大小像波斯银币一样的两种钱币:狄纳尔(Dinar)和狄尔罕木(Dirhem)。一狄纳尔等于六狄尔罕木。像以前一样,也都在诸如布哈拉、撒马尔罕、讹答剌、特尔迷兹等河中地大城市铸造。后来称这种钱币为怯伯钱(Kebeki)。另外尚发现有用回鹘文写突厥语的佚名币,像金帐汗国一样,上铸“福禄无疆”(Qutlugh Bolsun)的字样。但察合台汗国钱币上不用蒙古语。令人奇怪的是稍后帖木耳时代钱币上用阿拉伯字母写蒙古语 üge manu(我的话),等于突厥语 Sözim(《论丛》,VII,366)。 204

怯伯的后继人,其兄弟答儿麻失里(Tarmashirin,1326—1334 年)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更大。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但这个答儿麻失里在冬天于毡房中接见了阿拉伯旅行家依本·巴图塔。

没有材料说明当时察合台诸汗仍会蒙古语。依本·巴图塔说怯伯说突厥语。答儿麻失里接见依本·巴图塔时用突厥语向他祝贺。汗的宗教导师依麻木·胡撒米丁·牙黑(Imam Husam ad-Dīn Yaghī)说波斯语。汗每天早祷后直到日出用突厥语念"孜克尔"(zikr)。依本·巴图塔书中引用的一些突厥语词是由回鹘语借入蒙古语的,并在所有蒙古汗国中使用,如 al tamgha(红印),在波斯有时简写为 al tamghachi 或 nishanchi 或 mühürdār。"掌印官"负责全部文书工作,也懂阿拉伯语,由他充当依本·巴图塔的翻译。

205 这样,突厥斯坦又陷于内乱,直到 1346 年或 1347 年。结果导致汗在河中地统治权的终结以及河中地与东部地区的完全分离。

206 答儿麻失里死后汗的驻地又迁回东部地区。伊斯兰教影响一度削弱。当靖克失(Jenkshi)汗在位时(直到 1338 年,他的钱币也在河中地铸造),天主教传教士得以在阿里马建筑一宏伟的教堂。据一佚名穆斯林人士说,他常和"巴赫西"(bahshi,即佛教僧人)"商讨"商业事宜。但反伊期兰教的精神未能持续下去。早在 1340 年初有一突厥出身的谢赫(为成吉思汗之孙)在河中地即位。这个谢赫(后为苏丹)曾长期为著名布哈拉圣人巴哈乌丁·纳克施班德(Bahā ad-Dīn Nakshbend,1318—1389 年)的精神导师。

207 据古钱学,曾有一苏丹哈里勒·阿拉赫(Sultan Halil Allah)在位。他在布哈拉于回历 742 和 743 年(即公元 1342—1344 年)以其名字铸造钱币。历史家只知有一为牙撒吾尔(Yasawur)之子的苏丹,即合赞(Qazan)汗(也发现有他的名字的钱币)。不能确定合赞和哈里勒·阿拉赫是否为同一人的不同名字。

合赞汗老后,河中地的统治权落入突厥阿米尔手中。前察合

台汗国的东部地区这时在政治上与河中地完全分离。那里有自己的汗和握有实权的阿米尔。后者常扶持一些汗登上汗位。稍后的中亚历史表明,河中地的阿米尔握有实权。他们中产生了如帖木耳这样的出色人物。他建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其后代继承了他的统治(虽然版图有所缩小)。但他们逐渐摒弃了借立傀儡汗进行统治的方法。另一方面在东部,汗则逐渐剥夺了阿米尔的所有权力。这样做的第一个汗为秃黑鲁帖木耳(Tughlugh Timur)。他生于回历 730 年即公元 1329—1330 年,18 岁即汗位(回历 748 年即公元 1347—1348 年)。

察合台汗国最终瓦解的时间尚不能确定。

关于从何时起阿里马在政治上与河中地正式分离,无详细史料说明。1341 年传教士马里乌里(Marignolli)说,他经过阿里马时在那里建一教堂并能自由传教,虽前不久曾有传教士遇害(玉耳:《古代中国闻见录》,卷Ⅲ,页 190),他未举出领有阿里马的汗的名字。继阿里苏丹(Ali Sultan,他是基督教的迫害者,窝阔台后裔王子,穆斯林史料说他是个暴君)之后,统治的为穆罕默德·孛罗(Mahammed Polad)。现在有一枚 1345 年(回历 746 年 8 月)在阿里马铸成、带有穆罕默德名字的钱币。这是现知阿里马铸造的最后钱币。这些汗的名字以后被蒙古人忘掉,以致 16 世纪的穆·海达尔依据蒙古传说说秃黑鲁帖木耳是也先不花之子,但也先不花不可能活到 1318 年以后。

较古史料说秃黑鲁帖木耳之父为笃哇另一子艾米勒和卓。为了消除这一矛盾,阿不勒哈孜说艾米勒和卓(他写作 Il Hoja)又叫也先不花。不论早期史料抑或后期史料都不能说明秃黑鲁帖木耳出于汗族。其母在丈夫死后或据另一说法尚在其夫生前嫁给一阿 209

米尔。秃黑鲁帖木耳在这个阿米尔家长大,并成为他的儿子。说秃黑鲁帖木耳出身于汗族可能是杜格拉特(Dughlat)家族杜撰的。由于东部察合台汗国没有真正的汗的后代,于是他被杜格拉特家
210 族立为汗。
211 除用波斯语写的历史传记(如《胜利书》Zafer-name)外,依帖木耳之命令,回鹘书记官(bahshi)又用回鹘文和回鹘语撰写了一部编年史《汗史》(Tarihi hani)。这是16世纪初一位乌兹别克作者谈到的。他手中显然有这部书的写本(《论丛》,XV,188)。bahshi(来自梵文bhikshu)[40]一词,这里不是指佛教僧人,而指用回鹘文书写文书的书记官。这种官职不仅察合台汗国时代有,就在帖木耳及其后继者时代(直到15世纪下半期)也仍存在。这部书里显然也如佚名的伊斯坎德尔和穆·海达尔所利用的草原传统一样,传说和英雄故事的成分多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
212 蒙古及帖木耳时代的中亚历史家没有写出如拉施德艾丁著作那样的著作。蒙古的《金册》应为中亚所知(这本书在波斯和中国都经过文学加工)。但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点。拉施德艾丁书中对游牧生活的生动描写使得他在突厥人中享有盛名。但小亚细亚的西突厥人对该书的认识要早于突厥斯坦。在突厥斯坦,拉氏的著作和夏拉夫丁·叶孜狄(Sharaf ad-Dīn Yezdi)关于帖木耳的历史书(即回历828年=公元1425年写成的《胜利书》)首次于16世纪初为了乌兹别克汗库奇昆奇(Kuchkunchi)而被译成突厥语(《论丛》,XV,257)。把《乌古斯可汗传说 Oghuz-nāme)与拉氏的波斯文对照一下,人们会清楚看到波斯文为原作,《乌古斯可汗传说》为译作。在一个地方突厥语作者把波斯语写本中的Seng(石头)误看成Seg(狗)。于是“落入水中的石头”这句话变成“落入

水中的狗”了。

像帖木耳王朝说其祖先与成吉思汗祖先有关那样,14 世纪 213
曾领有广大地区(除新疆外,尚包括费尔干、七河以南直到热海)的杜格拉特部(为突厥化了的蒙古部)的代表说,他们的祖先乌尔土布(Urtubu)从察合台汗那里领有这些地区。而拉施德艾丁说,直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杜格拉特部中没出过什么有名气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论在中亚东部和西部都已突厥化了的蒙古部落所具有的意义。历史家未留下关于这两个国家游牧民的氏族组成情况。在个别一些氏族名称中几乎不见以前突厥部族之名。在帖木耳国中提到过克普恰克部,但未见葛逻禄部。回鹘只是作为帖木耳及其后代的突厥书记官所从出的氏族或部族被提到,但未提到他们及其他部的住地。拉施德艾丁只提到成吉思汗分给察合台的正规蒙古军人数是四千人。但 14 世纪在中亚游牧民族中有许多蒙古部族名。这说明之后有许多蒙古人来到突厥斯坦,显然同一部族之人分居于不同地区。常见同一氏族名称既出现在属于帖木耳的氏族中,也出现在属于东部汗国的氏族中。属于这种氏族的也有杜格拉特部。深得帖木耳信任的阿米尔达吾德(Daud,帖木耳姐姐骨咄禄·铁尔肯之夫)就出自该部。巴尔拉斯氏族在东部汗国也有。

值得注意的是,察合台一名只用来指帖木耳国中的游牧民,虽然在东部地区作为察合台汗后裔的诸汗具有更大的意义。东部地区的游牧民称自己为莫古勒(Moghol),称其地区为莫古勒斯坦(Mogholistan)。在中亚 Mongol“蒙古”这个族名一开始就读成不带鼻音,虽然在蒙古语文献中写成 Mongol。住在今阿富汗的蒙古

人也称自己为莫古勒。他们是西迁蒙古人中惟一尚保存自己语言的人。因蒙古人把自己看作是中亚游牧传统的真正代表,所以他们轻蔑地称察合台人为“杂种”(Qaraunas)。另一方面察合台人作为中亚蒙古国家传统的代表称莫古勒人为“盗贼”(Jete)。实际上这个词和15世纪在中亚突厥人中“哈萨克”(Qazaq)一词的含义一样,指脱离其所属国家,并与后者处于战争状态的游牧部落。

我们不知道14—15世纪莫古勒人在语言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是蒙古人,以及莫古勒人与察合台人之间的对立是否为蒙古与突厥之间的对立。有一些材料表明莫古勒人的语言在16世纪初仍为蒙古语。巴布尔说,他们的叔伯父莫古勒人阿赫买德汗(Abmed han)的绰号叫阿拉奇(Alachi)。该词在蒙古语和卡尔梅克蒙古语中为“杀人者”之意(阿·斯·贝魏里基:《巴布尔之书》,Ⅰ,叶11b)。这点可能表明16世纪初莫古勒人尚说蒙古语。

215

但穆·海达尔说,莫古勒人与柯尔克孜人为同一个族。他们之间只是宗教的不同(前者为穆斯林,后者为异教徒)。但阿赫买德汗的后裔按语言来说应为突厥人。他的儿子赛依德汗(Sa‘īd Han,死于1533年)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穆·海达尔把莫古勒人同新疆土著区别开来,他把莫古勒斯坦理解为特别指西到巴尔喀什湖(为莫占勒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分界),东到卡尔梅克领地的地区,其北部边界为叶米里河和额尔齐斯河,南部毗邻费尔干和从喀什到巴里坤的新疆地区。16世纪时莫古勒人被卡尔梅克人和柯尔克孜人从那里挤出,但留在了喀什噶里亚地区(指南疆——汉译者)。依海达尔所说,那里有约三万莫古勒人。喀什噶里亚地区对保存游牧生活方式不利。到17世纪末汗朝灭亡后,莫古勒人很快就消失在土著农民中了,其名字也不见了。南疆地

216

区在语言方面,在游牧民与定居民之间显然早就没有什么区别。11 世纪马·喀什噶里时代存在的坎恰克一名(《词典》,Ⅰ,399 等处)早被忘掉。在莫古勒地区从一开始就没有如在察合台人国内存在的那种突厥人与塔吉克人(或称萨尔特人)之间的对立,虽然生活方式上在东部存在更多的差别,那里的游牧民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少些。

乌鲁斯(Ulus,《伊斯兰百科全书》,Ⅰ,898,指数个部落)所含 217
意义广些(如说术赤乌鲁斯,察合台乌鲁斯等),而 il(伊勒)与 tümen(土曼,显然还有蒙古语的 aymaq"艾马克")也具有同样的含义。"土曼"一词有"多,万"之意,为突厥人借自南疆的土著语言。"土曼"一词比起指游牧民和军队来,更多用来指定居民。海达尔说,在喀什、和阗地区有四个阶级:①土曼:农民;②哈乌秦(Kauchin):军队;③艾马克:游牧民(需要谷物和布匹);④官员及神职人员。土曼一语近代在布哈拉用来指平原居民而与山地居民(Kuhistani)一语相对立。

对城市的憎恨在莫古勒斯坦要比西部要强烈。15 世纪下半 220
期,当帖木耳后裔已因其在撒马尔罕和哈烈(Herat)城的建筑物享有盛名时,莫古勒人的尤奴斯(Yunus)汗由于其臣民的反对不得不放弃住在阿克苏城的想法,虽然后者当时"只是比起莫古勒斯坦来才算个城市"。几年后,当尤奴斯汗占领赛兰木(Sairam)和塔什干并住在那里后(塔什干存有其墓),其子阿赫买德同一部分莫古勒人离开了他。阿赫买德同其父相反,始终是个草原战士。1502 年他的侄子巴布尔看到他时仍是这样。

第十二讲

227 帖木耳后裔时期,突厥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察合台汗国早先已出现了突厥诗歌。托钵僧(Derwish)卡布勒沙(Kabulshah,他在1366年被扶为汗,但不久又被废掉)曾写过诗,他的诗在15世纪仍有名。作为汗他应为成吉思汗的后代。其母语显然为突厥语。所以他的诗歌应为用突厥语写成。帖木耳的拥护者,阿米尔赛非丁·巴尔拉斯(Saif ad-Dīn Barlas)用波斯语和突厥语写诗。帖木耳死后出现了更有名的诗人萨卡基(《伊斯兰百科全书》,IV,87)和鲁特非(Lutfi)。古典诗人那瓦依曾给鲁特非以很高的评价(1927年出版了纪念那瓦依诞生五百周年论文集:《米尔·阿里歇尔》,列宁格勒,1928年,内有萨莫依洛维奇《论中亚突厥文学语言史》一文)。萨卡基在其诗中歌颂了撒马尔罕的统治者、帖木耳之孙哈里勒苏丹(Halil Sultan,1405—1409年在位),之后他更多地
228 歌颂了乌鲁赫伯克(Ulugh Bek)。在他献给乌鲁赫伯克的诗中也谈到作为突厥诗人的他自己:"在产生像我这样的突厥诗人和像你这样的学者皇帝之前,天体还要绕行很多圈。"鲁特非也说自己的诗曾得到乌鲁赫伯克的很高评价。乌鲁赫伯克说他的诗不亚于14世纪波斯诗人赛勒曼·萨瓦基(Selmān Savajī)的享有盛誉的诗作。在沙赫鲁赫和乌鲁赫伯克时代也有帖木耳朝成员出身的突厥诗人西狄·阿赫买德·依本·米兰沙(Sidi Abmed ibn Mīrān Shāh)。他于回历839年即公元1435—1436年创作了《塔阿舒克-纳马(Ta'ashshuq-nāme)》献给沙赫鲁赫。像从作品名称看到的,该诗在某些方面是模仿14世纪金帐汗国诗人花剌子米(Horezmi)的《爱情书》(Mahabbet-nāme)写成。帖木耳王朝末期,

即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巴布尔(米兰沙的另一后裔)用突厥语写了著名的《巴布尔回忆录》。据巴布尔说(《巴布尔回忆录》,见魏尔基刊本,页686),他的堂兄弟巴依松卡尔(Baisunqar,曾长期统治撒马尔罕)也是一位有声望的诗人。15世纪下半期的那瓦依使得所有其他察合台诗人暗然失色。只有那瓦依的作品留传下来,并远在帖木耳王朝境外享有盛事。巴布尔的作品尽管具有很大价值,但只有少数写本保存下来,只是由于欧洲学者的发现才得以未被人们忘掉。

那瓦依是波斯文化的拥护者,他把波斯题材移入突厥诗中。他甚至写有一部古波斯王的历史。他很重视突厥诗歌和突厥语,并在一部书中(写于晚年)努力证明突厥语对波斯语的优越。这一点以前未有任何突厥作家(至少在中亚)谈过。

哈萨克(Qazaq)人是在15世纪由离开阿布勒海依尔(Abū'l-hair)汗的一部分乌兹别克人形成的。吉尔吉斯人不知何时起占有现在的住地——七河南部和锡尔河东部一带。在关于帖木耳和乌鲁赫伯克征战的记载中未谈到吉尔吉斯人。在七河地区他们第一次被提到是在16世纪初。16世纪时吉尔吉斯人常在哈萨克汗的统治下,并与他们一起同领有喀什噶里亚的、业已突厥化的蒙古汗打仗。17、18世纪时,他们一方面与哈萨克人作战,同时另一方面与卡尔梅克蒙古人打仗。后者一度曾臣属于中亚。18世纪卡尔梅克人占有属于哈萨克人的塔什干、赛兰木和土耳其斯坦诸城。 244

17世纪卡尔梅克人占有新疆,那里以前为自称莫古勒的已经突厥化的蒙古汗所统治。莫古勒一名如帖木耳汗国察合台一名一样,非指国中全体居民,而仅指军人阶层。政治条件变化后,该词也像察合台一词在西突厥斯坦一样,逐渐不再使用。在卡尔梅克 245

人和后来在中国治下,新疆的突厥人没有自己的民族名称。各地居民依城市和住地称自己为如喀什人(Kashgharliq)、吐鲁番人(Turfanliq)等。当地的穆斯林统治者采用汉文"王"的称号。此外,从蒙古汗时代以来,宗教领袖——和卓(Hoja,来自费尔干,特别是来自其北部的塔吉克部分)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意义。

246 有人说和卓是新疆伊斯兰教的传播者,但史料上无此记载。相反,伊斯兰教在那里早在15世纪就已确立其统治地位。诸蒙古汗曾狂热地传播伊斯兰教,有时甚至采用强力手段。

在新疆,波斯语部分地用作当地的书面语言。穆·海达尔(在16世纪中期)的著名历史著作是用波斯语写成。按欧洲学者的说法,这是在新疆地区写成的惟一的一部大作。之后他才被译为突厥语。从18世纪起突厥语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书面语,但无有名作品出现。

247 新疆知识界现倾向于称其民族为维吾尔,虽然回鹘人(维吾尔人)的统治从未达到过喀什噶里亚的西部地区。回鹘人的后裔现住在甘肃,信仰佛教,使用回鹘文(这种文字在15世纪后为穆斯林突厥人忘掉了)。

注 释

* 译者按:原书每讲无标题。标题为德译者所加,列于德文译本序言中。

① 鄂尔浑文碑铭因主要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流域发现而得名,为突厥和回鹘的最古书面文献,对研究突厥,回鹘的历史、语言具有重要意义。——汉译者

② 此句见阙特勤碑东面第33行。一般译为“他的甲胄和披风上中了一百多箭”。——汉译者

③ 此处巴氏沿袭欧洲学者的错误,把原为突厥行政区划的突利斯和迟头当成两个突厥部族名。——汉译者

④ 古代库车—焉耆语和古代和阗语。——汉译者

⑤ 汉文史料作虎思斡耳朵。——汉译者

⑥ 这个比附有问题。因 Yamar 河比较大,可行船(《词典》,Ⅰ,75;Ⅱ,5),可能为鄂毕河(Ob)。现突厥人称鄂毕河为 Omar 或 Umar 河。关于此河的位置,《词典》谈得不详细。

⑦ 指花剌子米的《爱情书》。——汉译者

⑧ 我国史籍中一般称钦察汗国。——汉译者

⑨ 托赫塔的蒙古语形式应为 Togtaga,这可从蒙古汗于1305年给法兰西国王的信中知道。

⑩ 巴氏说巴赫西一词来自梵文“bhikshu”(苾蒭)恐不可信。德人冯加班认为此字来自汉语“博士”。——汉译者

高 地 亚 洲

[法]伯希和 著
耿世民 译

译者的话

伯希和(P. Pelliot)为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中央亚细亚历史、语文专家。1906—1909年曾率法国考古队到新疆进行发掘工作。一生中(死于1945年)著述甚多,仅论文即达四百多篇。此小册子原题作La Haute Asie(高地亚洲),为1931年伯氏对法国雪铁龙(Citroen)中亚考察队出发前所做的报告,同年在巴黎出版。书中高度概括地介绍了中央亚细亚两千年的历史,对我们尚有参考价值。个别过时的观点,我已在相关的地方做了按语。这是一篇多年前的译稿(编者注:1978年曾刊布在社科院民族所出版的内部刊物《民族史译文集》第6集),现提供给同好参考。对书中个别不太重要的地方做了删节。

耿世民

1976年6月于中央民族大学

图 1　具有印度—伊兰风格的佛像(斯坦因 1901 年发掘品)

中央亚细亚这一有巍峨雪山、流沙、气候严酷（+40°—-40°）的广大地区（约七、八百万平方公里），只有七、八百万人口。在这一地区，历史上似未产生过什么伟大的文明，前景亦不被看好。半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为什么吸引了这么多的旅行家和学者？蒙古地区使人回忆起成吉思汗的业绩，西藏则唤起人们对巨大山脉和神秘喇嘛教的想像。难道说那里只有幻景和语言的咒术吗？30年来，各大国科学考察队特别在其名字并不十分诱人的新疆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工作。在粗略研究这块如此广大、以前不太为人们知道的地区的现状和历史后，我们知道那里应有一些其他什么更复杂、更深刻的东西在吸引着人们。

*

* *

所谓中央亚细亚，包括三大政治区，它们在地理和人种上大致相当于三个不同的地区：即蒙古、新疆和西藏。

蒙古（约270万平方公里，人口250万左右）基本上为牧区，分为外蒙（在北）和内蒙（在南）两部分，中间为荒漠的戈壁。蒙古人（其语言像突厥语一样，属“阿尔泰语系”）现为佛教徒——西藏的喇嘛教派，但存有古代萨满教的许多残余。1911年当中国革命时，外蒙（17世纪以来属中国）宣布在库伦（Ourga）（按：即现在的乌兰巴托）“活佛”治下自治。从1921年，特别是从1924年后，成为俄国人控制下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内蒙（其重要性小些）则仍属中国。中国在那里的统治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中国属突厥斯坦或称新疆（从1884年改为行省），面积约170万平方公里，人口至多为250万左右，居民大部分为伊斯兰教徒，语言为突厥语。只是在由天山谷地构成的平原上，居民才定

居,从事农业,如肥沃的吐鲁番盆地,伊犁河谷以及塔里木盆地绿洲。塔里木这个面积几乎等于法国的低地,为一向东北倾斜的巨大盆地,北、西、南为天山及喜马拉雅山的西脉所包围(某些山峰高达七千多米),降雨量很少,植物只是在冰雪融化形成的河流处生长。由于气候十分干燥,蒸发快,加之土地的吸收和灌溉用水所需,河水很快就耗尽了,剩下的渗入沙漠。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上的绿洲像两条带子一样,沿着高山延伸。地理上的分割导致政治的分割。历史上塔里木盆地的"诸国"都是地方性的,统一多由外族征服者(汉人、突厥人、藏人)完成。塔里木河长2,750公里,流入罗布泊(Lop-nor),由于河沙淤积,它曾多次改道。(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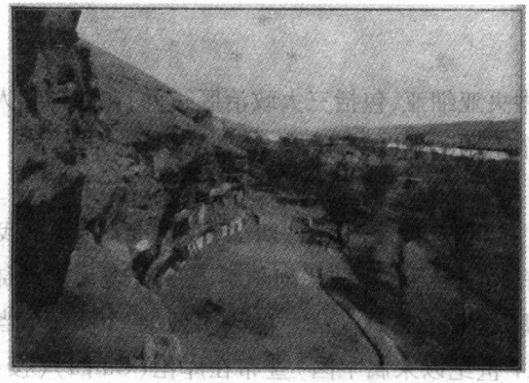

图2 地近新疆的敦煌千佛洞,在左方山崖上开凿,洞中存有大量塑像。

西藏,约300万平方公里,多大山,其中南边(靠印度)的喀喇昆仑山高达8,000米,喜马拉雅山高达8,840米或可能为8,900米(埃佛里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北部和西北部(与新疆接壤)平均高达5,000米。气候酷烈,有的地方盛夏时夜间也

结冰。居民只住在西南部、南部和东部,这里谷地的海拔则降到2,000米或2,500米,出产小麦、大麦,甚至大米、杏、葡萄,如西南部的拉达克,南部的布拉赫马普特尔谷地及东部靠近中国内地的地区。藏族人口约二、三百万,其中六分之五定居。藏语与缅甸语相近,组成汉藏语系的西支,而汉、泰语则为东支。

从7世纪起,藏人成为佛教徒,但为喇嘛教派,并混有当地原始宗教的成分。

*

* *

中央亚细亚位于地中海和印度及中国之间,它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在于它既将上面三个地区分开,同时又把它们联结起来。交通十分不便。北为沙漠分割的无际草原,西面在塔里木盆地和俄属突厥斯坦之间隔有通行困难的峡谷,西南方通路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能通行。南面喜马拉雅山虽有几个缺口,但要穿过通行困难的整个西藏。东面则为可怕的流沙。这三个地区并不像不久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从远古时代起其间就存在过联系,有过相互的影响。不过依时代不同,这种联系与影响的程度不同,但从未间断过。

*

* *

过去流行一些幼稚和错误的说法,说"世界屋脊"是人类的摇篮,人类是凭重力规律下自帕米尔的,梵语(Sanskrit)是世界语言之母,以及什么古人类从没有生活在从印度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一线以东的地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雅利安人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到达印度,在此之前,当地人民和雅利安(Aryen)人本身都

没有文字,文字只是在公元前几世纪时才偶然传到那里。中国只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末期才与西亚和印度有了往来。蒙古利亚只是在其游牧民侵入中国北部时,才于公元后的民族大迁移中进入历史,等等。

现在我们应完全摒弃上述这些观点。

在印度,印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非雅利安文明的出土文物,它们在雕塑艺术方面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使用一种与(前亚)苏美尔(Sumérienne)古文字很相似的文字。对中央亚细亚研究来说,不能忽视这些发现,因为有人认为苏美尔语与"阿尔泰语系"有亲属关系。

中国方面,李桑(Licent)和塔依勒哈尔德·德·夏尔旦(Teilhard de Chardin)神父几年前在河套发现了旧石器用具。最近又发现了北京猿人(Sinanthropus)的残骸(图3)。它介于爪哇(Java)的爪哇猿人(Pithecanthropus)(还很难算作人类)及(西方)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这是欧洲发现的最古人类)之间。这是就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而言。至于新石器或 chalcolithique 人(即细石器或已开始兼用青铜器的人)的遗址在华北已发现有十多处之多。在蒙古、西伯利亚、东西突厥斯坦的许多出土品中,其陶器与西亚和东欧的型制似有联系。青海和中亚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了海贝(cauries),说明曾存在过产品的远途运输交换。既然这些新石器人之间进行了产品和技术的交流,那自然也应有仪轨(pratiques)和信仰方面的相互影响。今后的任务是确定古代世界乃至现在的古文明中新石器时期的共同底层为何的问题。

图3 “北京猿人”头盖骨(右侧面)。注意其突出的眉骨,具有第四纪早期人类发展的特征。其残骸1929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石灰岩化石裂缝中发现。

*

* *

关于中国与西亚的最初交往和蒙古利亚进入世界史的传统看法,现在要加以修正。我们切不要受现在地理名称的欺骗。公元前最末几个世纪中,蒙古利亚可能不是蒙古人的住地,突厥斯坦可以肯定也并非是突厥人的居住地。

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可能还包括第四个千年),在南俄草原和西伯利亚西部无疑有一可能属于印欧系的草原文化,是这些草原部落首先学会了骑马,之后西南传入高加索和伊朗,东南则传入中国。这些草原部落不知文字,是他们创造了可称为游牧民艺术古老的动物纹样艺术,把原先在兽皮或木头上做成的型式移到青铜器上。

公元前几世纪时,上述草原地区为塞人(斯基泰 Scythes)所

占,之后为萨尔马特人(Sarmates)所占。现在一般认为他们是印欧种人,属伊兰系的游牧民。与他们相近的一支后在波斯建立了定居的阿契美尼德(Achéménide)帝国。那时候印欧人种的部落曾延伸到以前人们想像不到的更靠东的地区。近三十年的考古发掘和历史文献都说明,他们不仅曾游牧于整个天山地区,还曾构成今新疆的全部定居民,并曾占有甘肃西南的一部分。

现在很难具体指明,印欧伊兰系的游牧民(或可能为半游牧民)当时在西伯利亚中部和蒙古高原曾延伸到什么地方。公元前2世纪初,在蒙古已有中国称之为匈奴的部落联盟。这个写法是新的。其名字与此不同的写法至少在此五百年前已出现在中国文献中。一般认为匈奴就是民族大迁移时期欧洲人所称的匈人(Huns)。他们不是印欧人种。现在认为匈奴或匈人属突厥(Turc)系,这点几成定论。突厥这个名称虽来源于一个形容词,但尚不能加以解释。匈奴的统治层虽说是突厥人,但不能说匈奴或匈人联盟内部不包括伊兰人成分。总之,中国北部的这个游牧民族很早就已受到伊兰文化的影响。这方面汉文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证据。

中国早已知道用马驾车,但不骑用它。为了防止游牧民的入侵,中国曾修筑了墙垒。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把它联成为著名的长城。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防御。公元前300年左右,中国已采用骑兵对骑兵的办法。为此,把中国古老的长袍、鞋和短剑换成游牧民的长裤、皮带、皮靴子和长剑。之后,经过变化已成为汉人的通常服装和武器了。匈奴人的这种装备又是较早借自古代伊兰人。为此,当我们在公元初中国制的丝织品中看到如萨珊王朝(Sassanide)波斯文物中的疾驰回首拉弓射"安息箭"的战士图案

时，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

* *

依据中国的传统说法，中国是在下述情况下与中亚发生联系的：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西部甘肃有汉人称之为月氏的民族，曾受到匈奴的侵略。（图4）中国皇帝打算与月氏联盟夹攻匈奴。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可是月氏在败于匈奴后，经过新疆迁到了索格底亚那（Sogdiane）（按约相当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之后又迁到大夏（Bactria），到达今俄属突厥斯坦的南部和阿富汗的北部。张骞被匈奴拘留十年后才逃出，到达月氏牙帐。但此时月氏人已安于新居，不欲复仇了。张骞在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留一年，后同他的匈奴妻子和一位同伴回到了长安。张骞这次出使虽未完成任务，但从中亚带回了葡萄和苜蓿。这是公元前126年的事情。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把张骞看作是开辟“西域”之路（即“丝绸之路”）的人。通过这条经过新疆的道路把中国的丝绸运到西亚的提尔（Tyr）和西顿（Sidon）等地。

张骞西域之行确有其事。但我认为这个故事不是像人们相信的那样古老，并且有些被美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包括史前时期的接触或通过中间民族的交换）

图4　新疆于田县官员，为伊兰—突厥混合型。

可能更要往上追溯二百年。人们注意到公元前4世纪中国在哲学、科学等方面似吸入新的空气。早在这个时期,中国文明中已见来自希腊和印度的影响。中国不出产狮子。公元前4世纪他们通过波斯知道了这种动物,当时用的是伊兰语名称。但实际上中国人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知道这种动物了,那时使用的则是印度语的名称。

思想和物产是通过哪条道路借入的?不久前人们只考虑经过新疆的所谓"丝绸之路"。如要去印度,先要绕个大弯子去大夏或翻越喀喇昆仑。现在在西部天山之北,即在伊犁地区发现了属于公元前约四百年的波斯波尔(Bosphore)钱币。人们自然要提出问题:经过天山以北草原的道路及经过戈壁南北的道路是否也是通往希腊的路线?至于通印度的道路,我相信中部西藏在公元初尚未被认识。人们曾错误地把发现从恒河中流经过拉萨去中国道路的功绩归于(希腊的)托勒密(Ptolémée)。实际上这条道要更靠东些,即经过阿萨姆和缅甸高原。这样,亚历山大的地理学记载才能和中国的材料吻合,可能这条道在此若干世纪前就已被使用过。

不管怎样,确定无疑的是:在公元前后,西亚和远东之间已有了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日益加强。首先是强大的汉朝有力量进行对外的行动。之后同样这样做的有唐朝以及蒙古人和满族人。

对于经过北部草原的这条道,如无十五年前外蒙库伦北诺颜乌拉(Noïn-Oula)的发现,我们是毫无所知的。那里发现的墓冢应属于匈奴首领,出土的诸如毡子、皮货等都保存得很好。两块汉文碑说明它们属于公元纪年之初。除游牧民艺术品外,尚发现有丝织品、漆器、汉玉和伊兰风格的装饰品以及应为来自黑海的、希腊影响很明显的织物。这些证明古代有经过北亚把地中海与远东联

结起来的商业。

但是“丝绸之路”毕竟是主要的商道，同时也是艺术和宗教传播之道。

由于各国考古队在新疆发现了大量的壁画、雕塑和死语言的文献，这一点变得更清楚了。在公元初几个世纪，塔里木北部绿洲和吐鲁番地区为有棕色皮肤、蓝眼睛、说一种我们称之为“吐火罗语(Tokharien)”的印欧种的居民所居住。这种“吐火罗语”构成印欧语系中特殊的一支。它在某些方面比起梵语和波斯语来更近于斯拉夫语和克尔特语(celtique)。塔里木盆地南部绿洲则使用另一种印欧语，即属于伊兰语支的(和田)塞语(Saka)。最后还有一种也是已消亡的伊兰语(iranienne)——粟特语(Sogdiane 人的语言)。由于操粟特语民族的商业活动，这种语言成为当时中亚的通用语 (lingua franca)。中国从张骞通西域后就数次派军队到新疆，建立军屯，并于公元前 1 世纪中期正式统有该地。

从中国西部甘肃迁到粟格底亚那和大夏的月氏人很可能也为印欧种人。他们是否讲“吐火罗语”或塞语，并且吐火罗一名(他们带去这个名字并使大夏后来称为吐火罗斯坦)是否从一开始就指现在我们用此名所称之语言，这是个长期争论尚未能解决的问题。但月氏族(另一组印度—斯基泰[Indoscythes]人)应与新疆某些居民有密切的亲属关系。

到达大夏的月氏人 (或 Indoscythes) 曾前进到印度河流域，并继承了亚历山大远征后存在那里的希腊王朝，与波斯，安息(Parthes) 和粟格底亚那的伊兰定居民发生了联系。当源出印度恒河流域的佛教在西北方越过印度边界时，月氏人皈依了佛教。但佛教传到这里已被打上很深的伊兰成分的烙印。这表现在具有

希腊艺术传统和模式的(佛陀)塑像上。(图5)这种伊兰式的佛教和"希腊—佛教"艺术(按:指犍陀罗艺术)通过月氏人传到了新疆。以后,从公元1世纪又传到了中国。从那里再传到高丽和日本。这是世界史上的大事,因为远东(它初次认识佛教要归功于月氏人)现构成释迦牟尼信徒的绝大多数。实际上我们知道,译佛经为汉文的第一批译者几乎都是月氏人,安息人或粟特人,也就是说都是伊兰人。真正印度出身的人只是后期才参加了汉文佛经的翻译工作。艺术史不能忽视希腊——佛教艺术。其影响明显表现在新疆的壁画和雕塑上。伊兰成分稍后为印度笈多(Goupta)艺术的影响所改变。这一点尚见于5至6世纪中国北魏的佛教艺术中。当这些外来成分为中国吸收、融合和再创造时,就成了我们所见的敦煌、云岗和龙门的雕塑了。

图5 敦煌千佛洞壁画,身着当地宫廷服饰的公主,约属公元10世纪。

*

* *

公元前2世纪崛起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游牧帝国的命运是短暂的。不久就分成几个部分。西部匈奴在西部西伯利亚作了长期停留后重新获得了力量,于5世纪成为在欧洲史上叱咤一时的阿提拉(Attila)的匈人(Huns)。而东部或南部匈奴则不断对汉族地区进行掠夺,其中一些部落定居了下来并被汉族所同化。公元3世

纪起，由于边防松弛，中国再次成为贪婪游牧民的猎获物。这时期是北中国各个王朝混乱的时代，而西方的罗马帝国这时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下。

所有这些外族不全都是突厥人（如匈奴那样）。虽然其具体族属我们不得而知（而语言的相同也并不等于人种的相同），但到公元初，位于中国北部的“阿尔泰”系的部族包括下面从西到东的三大组：突厥——他们人口最多、最强、最开化，基本上占有整个蒙古利亚；其次是蒙古人，占有蒙古的东北部和满洲西部；（图 6）最后为满洲的通古斯人（Toungous）。他们都曾在历史上建立过成为中国正式王朝的政权。例如 5 至 6 世纪的北魏。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是属于通古斯系的民族。但实际上他们是操突厥语的民族（按：这一观点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再如后来 10 至 11 世纪的契丹，12 至 13 世纪的女真和 13 至 14 世纪的蒙古人。最后是满族人。从公元初起，北部中国有一半时间是受异族统治的。

图 6　库伦（按：即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蒙古公主戴沙兰（Daichairan）像

继匈奴之后的游牧帝国（也领有古匈奴联盟之地）为蠕蠕（柔然）或欧州人所称之阿瓦尔人（Avars）所建立（公元 407—553 年）。他们可能是侵入欧州的、后为查理曼（Charlemagne）所吞并的阿瓦尔人的祖先。根据语言学上的材料，我长期认为蠕蠕（或阿瓦尔）不是像匈奴人那样为突厥人，而是历史上首

次出现的由操蒙古语族语言的人建立的国家。我还认为他们的亲族(cousins)白匈奴或称哌哒(Hephthalites)(此族于公元500年左右到达了阿富汗并对西北印度进行了侵掠)也是蒙古系的民族。此外,吐谷浑也应为蒙古系的民族。他们于4世纪初迁到甘肃的西南部和青海地区。其王国于公元663年为吐蕃人所灭。我认为是吐谷浑和柔然(蠕蠕)最先使用"可汗"(qaghan)这个称号称其首领的。这个词(或其变化的形式——"汗 khan")后来为突厥和蒙古人所采用。

*

* *

虽然北魏创有文字,但没有留下其语言的任何文献。柔然的情况也是这样。后来,建立北魏的鲜卑人与汉人融合了。柔然后为突厥所灭。突厥原为柔然在阿尔泰山一带的锻奴,于公元551年起来反抗,并取代柔然建立了强大的突厥汗国,首府位于外蒙的鄂尔浑(Orkhon)河近处。

汉文史籍上的突厥一词应为 Türk(强有力之意)这个词的蒙古(柔然)语的复数形式 Türküt 的译音(按:这一说法已陈旧,应为粟特语的复数)。这是"突厥"(Türk)一词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突厥人首先征服了柔然领下的蒙古成员以及所有操突厥语、但不以这个名字称呼自己的部落。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它不仅领有整个蒙古,并扩展其势力于新疆、伊犁、俄属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北部,并且和拜占廷、波斯萨珊王朝以及中国有过使节往还。

自6世纪末起,突厥汗国实际上分为独立的、并经常处于敌对状态的东西两支。建牙帐于鄂尔浑河流域的东支存在较久。它于745年为另一支突厥人——回鹘人(古代维吾尔)所灭,后者于

840—841 年又为同属于突厥系的黠戛斯人(Kirghiz)所取代。之后在蒙古草原再没有出现过大的突厥政权。回鹘人离开蒙古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重新又组织起来。在新疆突厥语逐渐战胜当地印欧系居民的古代语言。(图 7) 西突厥的后代占有俄属突厥斯坦。突厥游牧民曾前进到西部西伯利亚、南俄草原和匈牙利。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详谈这个巨大震力的辽远反响。但应提到 10 世纪在阿富汗建立的马哈木(Mahmoud)的突厥王朝(即哥疾宁 Ghaznévide 王朝)以及小亚细亚的塞尔柱(Seldjoucides)突厥王朝,最后还要提到奥斯曼(Osmanli)突厥人的业绩,他们于公元 1453 年攻下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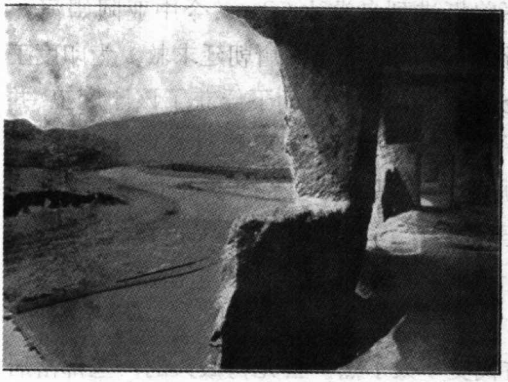

图 7 从莫扎尔河(新疆塔里木河支流)畔库车一千佛洞入口处眺望

突厥汗国因他们留下的碑文而为我们较好地知道。在蒙古高原留有突厥诸可汗的巨大墓志铭,用几种语文写成。其中之一为古代突厥语,用所谓"如尼(runique)"文(它源自粟特文的古老形式)写成。碑文用语质朴,描述了诸可汗的事迹。另外有回鹘人在新疆留下的回鹘文文献,大多为翻译作品。关于回鹘文,人们常说是来自景教徒使用的叙利亚文的"福音体"(estranghelo)。其实这种文字来自后期粟特文。而后期粟特文又源自阿拉美(araméenne)的赛米

特(sémitique)文字。这种文字外形上近于叙利亚福音体文字,但不是来自它。后来的蒙古文、满文又来自回鹘文。就这样,腓尼基人(Phéniciens)发明的字母(它也是欧洲字母的来源)一直传播到了太平洋沿岸。

*

* *

东突厥汗国(蒙古高原)和西突厥汗国(天山及东西突厥斯坦)的灭亡,部分原因是由于游牧民族内部的纷争,但更主要的要归因于中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到6世纪末,分裂达两个世纪的中国又重新统一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唐帝国一个时期曾统有中亚和东亚。唐朝的大军曾挺进到乌浒水(Oxus,今中亚阿姆河)。被阿拉伯人逐出的波斯萨珊王朝的王子向唐朝廷求救。为印度王所怠慢的中国使节在吐蕃随从人员的帮助下俘获了该印度王,并把他带到中国朝廷阙下,但到了8世纪中期,经过长期繁荣后,中国国内发生了危机。为了镇压叛乱,大唐帝国不得不求援于外族雇佣兵(突厥、伊兰,甚至大食兵)。但新的威胁又迫在眉睫,藏族人(吐蕃人)在其历史上首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走出群山,成为中亚政治舞台的主宰。

目前我们对藏族古代史不太了然。公元初藏人的一些部落居住在中国的西部边疆,如甘肃南部和四川西部。当7世纪上半期,其首领松赞干布娶了汉(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这表示西藏以后在双方影响下的演变发展)并皈依佛教时,藏人住在拉萨地区已有若干代了。

松赞干布后的继承人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与唐朝友好的政策,同时逐渐扩大其疆界到中国的西部和新疆。藏族的一支军队曾一

直推进到蒙古并一度进入唐朝的首都——长安。最近发现的一个文献表明,当时西藏人的地理知识曾达到离其本土很远的地方。我这里指的是属于9世纪的一个写本,即为回鹘突厥统治者撰写的一篇报告的藏文译本。写本描述了从高丽到乌拉尔一带的中亚各族。对中国来说,幸运的是吐蕃政权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由于内部的纷争,从9世纪中叶起,藏人又重新退回山区,不再在

图8 新疆和田地区农民,为伊兰—突厥体型。

亚洲军事、政治舞台上起什么作用了。(图8)但西藏人在宗教上取得了成功。在那里形成了佛教的变种——喇嘛教(盛行咒术和

魔法)。喇嘛教比起中国的佛教来更适合游牧民的口味,到中世纪末期,蒙古人也接受了这种宗教。拉萨至今仍是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外贝加尔湖布里亚特蒙古人和伏尔加河下游卡尔梅克蒙古人(厄鲁特)的宗教圣地。

*

* *

佛教是经过新疆传到远东并成为国教的惟一外来宗教。但几个世纪后,其他宗教也经过同一道路传入中国。虽其成就比不上佛教,但也不容忽视。

三种宗教久已不见,即犹太教(judaïsme)、祆教(mazdéisme)和伊斯兰教(islam)。

犹太教,在新疆西部曾发现有波斯语犹太文献。我在敦煌得有约属公元800年的希伯来语的写本,即一本萨马里教团(Samaritain)的祈祷书,它无疑是因商业活动带到中国边地的。9世纪后在广州也有犹太教徒,他们是由海路来的。公元1100年左右在开封府建立的犹太教徒居留地,其教徒也同样是由海路来自印度,并且几乎一直存在到现在。我们还知道17世纪在甘肃宁夏(原文如此——译者)曾有过一个犹太教堂(synagogue)。这里的犹太教徒显然是经中亚来的。犹太教徒在中亚和中国历史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祆教(即拜火教),关于这种宗教的材料更少。穆斯林史料中说它曾流行于吐鲁番的回鹘人中。此外,汉文史料提到有几个火祆祠(temples du dieu céleste du feu),提到Zoroastre,并说它于公元621年传到唐朝首都。我认为祆教从6世纪起已传入中国。但目前不论在新疆和中国内地都没有发现祆教文献。

伊斯兰教是最后传入的。10—15 世纪新疆逐渐伊斯兰化。在那里伊斯兰教圣地往往就是古代的佛教圣地。从 12 世纪下半期起,伊斯兰教已传入中国内地。现有几百万信徒。伊斯兰教在远东的传播似与蒙古时期的军事行动和他们采取的开放政策有关。但其详细历史不太清楚。

另外为摩尼教和基督教。关于这两种宗教我们知道得多些。

*

* *

摩尼教为巴比伦人摩尼于 3 世纪创立的二元论(dualiste)的宗教。其基本教义为善与恶、明与暗的永恒斗争。它们各有其领域和神祇。过去这种宗教传播得很广。4 世纪末盛行于非洲。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曾信该教九年。后摩尼教受到基督教的迫害。稍后该教分为不同的教派。人们都知道阿尔比派(Albigeois)战争的残酷程度。在东方,摩尼教则受到伊斯兰教的迫害。摩尼教并曾传布到地中海世界。以前我们只是从其论敌那里才稍知道其圣典和教义。

摩尼教在其创立后的二三百年间传入中亚和中国。7 世纪时传到中国,并且有几种主要摩尼教文献被译成了汉语。一个意外的事件有利于该教的传播。762 年回鹘出兵助唐平定(安史)叛乱。当他们占领唐之东都(洛阳)时,在那里遇到摩尼教高僧,并将他们带回鄂尔浑河。从此摩尼教被宣布为国教(在此以前回鹘人中行萨满教)。从此摩尼教在中国和中亚的命运与回鹘人连在一起了。因为回鹘的关系,中国给予摩尼教以许多优待,允许在各处建立摩尼寺。840—841 年回鹘汗国一亡,中国皇帝就于 843 年下令禁止摩尼教。845 年开始迫害所有外来宗教。佛教由于根基

深厚,很快就得到恢复。而摩尼教此后再未能恢复到843年以前的状况。但它也未完全灭亡,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像在西方摩尼教受到迫害后曾以Cathares和Vaudois教派的形式残存下来一样,摩尼教的二元论教义曾对中国素食教派产生起过作用。后者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特别是在浙江、福建曾有过很大影响。这种摩尼教徒也曾对中国12世纪的哲学学派起过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也为福建人。两种摩尼教著作于1019—1025年甚至被编入官方的道藏(Canon taoïque)中。几年前新发现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章说明,在13世纪末摩尼教徒在福建仍结合有巩固的教团,甚至到17世纪初仍存在该教的踪迹。

蒙古高原的回鹘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重要的摩尼教碑文。840—841年回鹘汗国亡后,回鹘人又在吐鲁番地区建立了新的王国。德国考古队在那里发掘出各种文字和语言的摩尼教文献(除摩尼教内容的壁画和工笔画外)。敦煌也发现有汉语和突厥语的摩尼教文献。(图9)这些发现也证明13世纪欧洲旅行家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说蒙古人中有"二元论宗教异端"的说法。摩尼教在中亚的消亡早于中国内地。它为伊斯兰教所消灭(如同佛教被消灭那样)。

*

* *

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基督教(其中的景教派或称聂斯托里派)在中亚也曾流行过。

聂斯托里(Nestorius)——君士坦丁堡的大教长——于公元431年为叶非斯(Ephése)宗教会议判处死刑。原因是他主张基督不仅有两种属性,而且具有两种人格,即具有神和人的属性。在

这里我们无需研究聂斯托里在多大程度上要对这一理论负责。只要指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教派拥有这样多的信徒就够了。这一派基督教在地中海地区受到迫害后，在波斯萨珊王朝得到了避难所。从5世纪起，景教教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波斯的国教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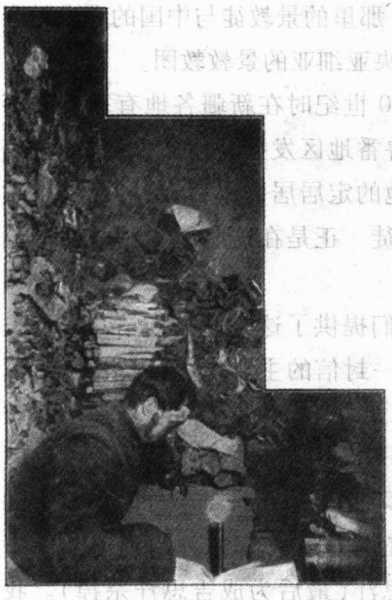

图9 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藏经洞中翻阅洞中所藏写本。此藏经洞约封闭于11世纪，1900年被偶然发现，1907年末为英国斯坦因首次造访，1908年又为伯希和所考查。照片为伯希和氏在翻阅洞中所藏写本时拍摄。

在西方景教得不到发展后，就转而向东方发展。在印度该教合并了自认是圣托马斯（Saint Thomas）信徒的教团，并开始往中亚派出传道士。我们不知道该教何时传入新疆。但现在确知的是（据汉文史料和1623或1625年在西安发现的属于781年的叙利亚文—汉文碑—大秦景教碑）：635年景教教士阿罗本（A-lo-pen）等已到达唐朝首都。三年后皇帝下令为其建寺。781年的碑文详述了一个半世纪中景教在中国所经历的盛衰。我在敦煌发现的文献，特别是其中的“圣三位一体赞”（*Eloge de la Sainte Trinité*），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材料。845年的禁止

外国宗教的敕令给了这个信徒不多、教职人员又多为外国人的宗教以致命的打击。佛教在禁令后又逐渐得到了恢复,摩尼教也改头换面残存了下来。但845年后三百年间,对中国的基督教就不能那样说了。12世纪时,我们在最北方发现它是非汉人的宗教。这时已是蒙古人崛起的前夜了。那里的景教徒与中国的古老教会无任何联系,他们独自重振了中央亚细亚的景教教团。

穆斯林和汉文史料都谈到10世纪时在新疆各地有基督教存在。这次又是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出许多该教的写本,但材料不多。只说明该教在当地的定居居民中存在过,而在游牧民中13世纪时则有更多的景教徒。正是在这些游牧民中我们能考察其传布情况。

所幸,一叙利亚文文献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情。编年史家Bar Hebraeus保存了1009年一封信的主要内容:谋夫(Merv)(在伊朗)(按:现属土库曼斯坦)大司教(archevêque)曾要求景教教长对新入教的突厥族克烈部(Kéraït)在斋戒上要宽大些。这里克烈族名似为第一次出现(如果不是Bar Hebraeus自己加上去的话)。约二百年后,我们知道他们是居住在鄂尔浑河地区的一个大部落。其首领曾帮助过成吉思汗(最后为成吉思汗杀掉)。我们还知道13世纪时克烈部确为基督教徒。关于富有的教长Prêtre Jean("印度"基督教徒的首领)的传说,可能因阿比西尼亚(Abyssinie)王而产生,但当这个故事从西方传到中央亚细亚时就指克烈部的基督教首领了。欧洲旅行家普兰·迦儿宾(Jean du Plan Carpin)(教皇伊诺森[Innocent]四世派到蒙古去的使节)是通过一个克烈部人(即基督徒大臣镇海)和成吉思汗的第二个继承人建立了联系。蒙古两个大汗蒙哥和忽必烈以及旭烈兀(巴格达哈

里发王朝的摧毁者)的母亲苏尔嘎克塔尼(Sorgaqtani)王后也是一个克烈部女人。克烈部并不是中央亚细亚高原惟一信仰基督教的游牧民。(图10)在戈壁以南,即黄河河套东北角住有汪古部(Ongut),其首领也为基督教徒,即马可波罗所称的"乔治王"(prince Georges)。该人后为让·德·孟帖哥儿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后任北京大主教)劝说改信天主教。

图10 敦煌中国新年节日情景

现存的属于蒙古时代基督教的文献不少。从伊犁河谷到北京北部都发现有基督教徒的墓地。但汉人中似没有信奉基督教的。1368年明朝把蒙古人逐出后,基督徒也就不再享受以前外族朝廷给予他们的优待了。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又苟延残喘了至少二百年。当1600年左右耶稣会士(Jésuites)到达时,他们在华北一带尚发现有"信徒"(sectateurs de la Croix)。至于蒙古地区的基督徒克烈人和汪古人,由于东西突厥斯坦伊斯兰化而失去与美索不达米亚景教教长的联系,最后也成为喇嘛教徒了。

一度在中央亚细亚如此活跃的景教,只剩下一些墓志和埋在地下的写本。但关于基督教的记忆尚飘浮在他们的头脑中。当17世纪初 Benoit de Goes 路过新疆焉耆,在当地王的面前与伊斯兰教毛拉辩论时,他惊奇地发现该王尚能认出其祖先的宗教。

*

* *

840—841年取代回鹘汗国的黠戛斯联盟无所建树。蒙古草原又回到部落纷争的状态。这时期在新疆西部和俄属突厥斯坦东北部,伊斯兰化的突厥人建立了黑汗王朝。具有十个世纪佛教文化的当地印欧种居民突厥化了,并很快接受了伊斯兰教文化。10世纪(按:应为11世纪)产生了两部著名的突厥语著作,一为讲统治艺术的书(按:指《福乐智慧》),一为马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chgarī)的《突厥语大词典》。在其东面,佛教徒和摩尼教徒的吐鲁番回鹘王国则继承了鄂尔浑河时代的传统,并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的影响。在甘肃东部建立了半游牧、半定居的、与藏人有亲属关系的西夏(或称唐古特)王国(以后为成吉思汗所灭)。他们根据汉文创制了复杂的文字。三十年前我们只知道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三个碑文和一些钱币。但现在发现了上千册西夏文的文献。用这种文字曾翻译和印刷了全部大藏经。

但这时(中央亚细亚)最靠东的游牧民走出了山谷和丛林,企图建立帝国。在唐亡后持续半个世纪的混乱后,中国重又统一在宋朝(960年开始)的统治下,并延续了近三个世纪。但当混有通古斯成分的蒙古系契丹(原居于东蒙古和西满洲一带)出现在北京平原时,庞大而富饶、但被高度文明的利己主义所腐蚀了的中国击退不了入侵者,在抵抗无效后就把黄河以北地区放弃给了契丹。

契丹人建立了被列入中国正史中的辽朝。辽代最初几个皇帝仍保留着游牧民的气质。其中一个皇帝曾率领骑兵直到鄂尔浑河边——突厥和回鹘汗国的首都。但契丹也像一切征服中国的游牧民族一样,最终为中国文明所征服。契丹人在几代后就汉化了,并创制了一种(实际为两种)文字。这种文字尚未能解读出来。契丹人已失去了往昔的战斗力。宋人利用了契丹的衰弱,并打算和满洲人的祖先(或至少为其叔祖)的女真人一起夹攻他们(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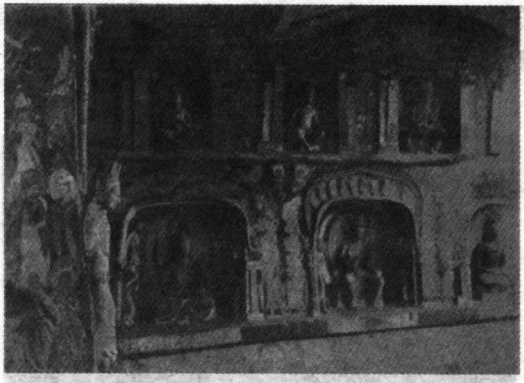

图11　敦煌千佛洞中的泥塑像,属6世纪上半期。

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1115年女真人进入北京。契丹亡于1125年。辽亡后,一部分契丹人在其强有力的领袖耶律大石的率领下,经过整个中央亚细亚,又在今俄属突厥斯坦的东北部建立了黑契丹王朝(西辽)。由于契丹的统治,中世纪对北中国的称呼Cathay(元时契丹的对音)一名,至今仍为俄罗斯人和一些东方民族用来称呼中国。辽亡后,女真人成为被其所征服的土地的主人,

并进攻邀请他们来的宋王朝,占有黄河以北的地区。历史的教训并未被记取。不到一个世纪后,在反对已为定居生活所削弱的敌人时,宋朝重又采取了错误政策:正如他们曾指望女真人能战胜契丹人那样,当女真的北面出现蒙古人时,他们认为自己得救了。

*
* *

成吉思汗的一生无疑是一部全世界所知道的最不可思议的冒险史。他是一个可怜的孤儿,一小部分游牧民名义上的首领。30岁以前他在蒙古草原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建立的帝国在亚洲和欧洲史上曾起了超过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所起过的巨大、深刻的作用。

图12 土木舒克(位于新疆喀什东面)出土的用模子制做的浮雕泥像,有在寺院大火后被烧过的痕迹。

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人的情况我们尚不太清楚。依我的看法,4到6世纪蒙古高原的蠕蠕、青海的吐谷浑和阿富汗的哌哒(Hephthalite)是属操蒙古语的部族;(图12)8世纪突厥碑铭和9、10世

纪的汉文史籍中的“鞑靼”(Tatar)显然为操蒙古语的民族。其住地似为从甘肃的北部到蒙古东部忽伦(Khulun)湖和捕鱼儿海(Buïr)的长城一带。“蒙古”一名,从前只在唐代史籍中出现过一次。重见此名已在12世纪上半期,是作为反抗女真人的一王国的名字出现的。其历史尚不太清楚。当成吉思汗出生时(可能为1155年),这个第一个蒙古国已不存在。

当成吉思汗建立帝国时,关于他的传说已将其出身和早年的事件大大地夸大了。由于其真实性已不易把握,所以历史学家应参考不同文字的史料:蒙文、汉文、波斯文等。其中一些尚未刊布。这些史料几乎没有翻译过或至少没有很好地翻译过。其编年史材料中有汉文、波斯文的。此外,还有《蒙古秘史》(我不久将刊布)。《秘史》成书于1240年,即成吉思汗死后13年。它是最古的蒙古文献,书中的叙述和对话常为韵文或片断的史诗,这有助于背诵。讲故事的人是牧民毡房中最受欢迎的客人。我们也很欣赏这种有草原气息的史诗。但不能对其完全相信。在作了这样的保留后,关于成吉思汗早年的情况,我认为大致如下所述。

未来的成吉思汗的真名为铁木真,于1155年生于斡难河(Onon)上游的营牧地(距外贝加尔现边界不远),其父也速该(Yesugei)为乞牙特(Qiyat)氏族长(该氏族属蒙古族的博尔吉根(Bordjigin)部落。这些蒙古人(狭义上的)与其东南邻人(为也说蒙古语的鞑靼中更为重要的一部分)有世仇。约在1167年,鞑靼人毒死了也速该。铁木真有三个弟弟:合撒尔(Qasar)、合赤温(Qatchioun)、帖木格(Temugé,一个怀抱的小妹妹帖木伦(Temulun)和两个异父兄弟。铁木真父方的亲族在也速该死后趁机夺取了孤儿的家产。但铁木真的母亲额伦艾凯(Œlun-éké)不愿受欺,

毅然带领其子女住在山野,靠野果野味来充饥。这里有一件能说明这个年青蒙古人性格的事情:铁木真为争夺鸟儿,竟用弓箭射死了一个异父兄弟。

其族人原指望铁木真一家会在山林中消灭,但当他们发现这个经受生活磨炼的青年家长将威胁他们的未来时,于是就决定谋害铁木真,他曾被捉住,但幸得逃脱。

铁木真家生活逐渐有所好转,他家现已有九匹马了。他这时讨厌平庸的生活,渴望部落贵族的地位,同时也到了成家的年龄。以前当其父在世时曾给他(当时铁木真九岁)说了翁吉剌惕(Qongrat)部落的姑娘。铁木真要求履行婚约。由于他仪表非凡,其岳父同意了。当铁木真携妻孛儿帖(Börté)回来时已有一幼子(一岁)和一件他岳母按习惯送给他父亲(虽早已死去)的黑貂皮袍。(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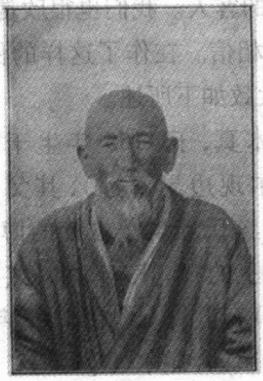

图13 新疆喀什地区伊兰一突厥体型居民

图14 土木舒克地方伊兰一突厥体型居民

后来,全家从斡难河源迁到克鲁连河畔。这里接近土拉(鄂尔浑

的支流)高原牧场,为克烈部王脱斡邻勒(Togroul)的驻地。后者更以王罕(Ong-khan)(khan 也为王之意)一名出名(王罕为女真人稍后赐给他的封号)。王罕是个才能平凡、胆小、残忍但有势力的人。这个"突厥克烈部"已于 11 世纪初皈依基督教,13 世纪时统治鄂尔浑河流域。在关于蒙古来源的传说中,克烈部并不占重要地位。我们很难确定克烈部是受突厥影响大的蒙古部落抑或为正在蒙古化的突厥部。但许多克烈部的称号为突厥语。Togroul 一名比起蒙古语来更近于突厥语。以前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曾服务于脱斡邻勒,并结成"安答"关系。在内外受敌的情况下,铁木真正在寻求支持。由于王罕和也速该的关系,铁木真向王罕求助,并把他岳母送给他的一件黑貂皮袍送给王罕作为礼物。王罕答应帮助铁木真。(图 14)

铁木真又获得了两个忠实的伴当:孛斡儿出(Bôrtchou)和者勒篾(Djelmé)。但考验在等待着他。住在山的另一面的克烈部北的蔑尔吉惕(Merkit)部人(蒙古西北部的突厥——蒙古部族)未忘记以前也速该曾抢走其妻(即铁木真的母亲)的耻辱,要把她再抢回来给原来娶她的篾尔吉惕人。一天早上,他们袭击了铁木真的营地。这时铁木真只有九匹马。(图 15)《蒙古秘史》描写当时的情况说:"铁木真骑一马,额伦母亲骑一马,合撒儿骑一马,合赤温骑一马,帖木格骑一马,别勒古台(Belgutai,活着的另一异父兄弟)骑一马,孛斡儿出骑一马,者勒篾骑一马,额伦母亲怀抱帖木伦。铁木真留一匹马在手边,孛儿帖没有骑乘"(伯氏为表述他的观点,此处译文与一般译文有所不同。——译者)。铁木真全家和他的伴当逃走了。铁木真为了预防万一,手边尚留备用马一匹。他毫不犹豫地把孛儿帖丢下让篾儿吉惕人把她抢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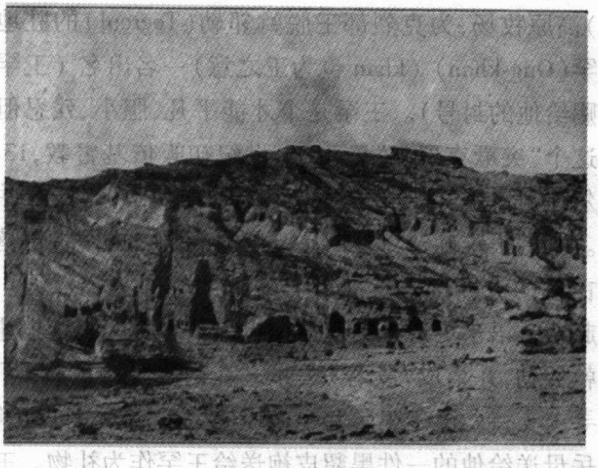

图 15　新疆库车东北方面木扎尔特河谷山腰上开凿的克孜勒尔千佛洞

铁木真登上了圣山不儿罕—哈勒敦(Bourqan-qaldoun)谢天,发誓要复仇。王罕表示支持。铁木真又派其弟去蒙古另一氏族首领札木合(Djamouqa)那里请求帮助。他在童年时曾同札木合结成"安答"关系。札木合未拒绝。最后篾儿吉惕人被战败,铁木真又找到了孛儿帖。不久生下了长子术赤(Djötchi)。铁木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虽然对术赤像对孛儿帖所生其他诸子一样,但传说术赤不是铁木真的儿子,而是篾儿吉惕人乞勒各尔孛可(Tchilgerbökö)之子。

王罕的支持,与札木合的结盟以及对篾儿吉惕人的胜利,大大提高了铁木真在蒙古人中的威信。铁木真也产生了重建蒙古王国(已消失半个世纪)的想法。一些人推动他这样去做,是出于对他的忠心(铁木真很善于用人和保护属下百姓),另一些为以前王族

后裔的人则认为在铁木真的旗帜下自己也可以重振家业。札木合出于忌妒逐渐与过去的“安答”断绝了关系，并开始反对他。最后铁木真被拥立为蒙古汗，称做成吉思汗（Tchingiz-khan）。这个称号的含义尚不能确定。宣布为汗的日子也确定不了。一般说是在12世纪末。虽然成吉思汗此时已满40岁或已超过40岁，但关于这段时期仍有许多空白处。在铁木真结婚、孛儿帖长子出生前对篾儿吉惕人征讨和被宣布为汗之间（不要与后来1206年那次被选为汗混同）应有二十年之久。关于这段时期我们几一无所知。

1198年，王罕与铁木真这两个王子的友谊又有所表现。捕鱼儿海一带的鞑靼人不断入侵女真人已有十年之久。王罕与铁木真帮助女真人夹击这部分鞑靼人。胜利后王罕从女真人那里得到了汉文“王”的称号，铁木真被任为百户长。王罕位于铁木真之上。

图16　画在木护墙板上具有印度—伊兰画风的二佛像画，为斯坦因在一建筑物遗址中发现。

札木合当时比成吉思汗更强大些。他不仅领有一部分狭义的“蒙古人”，而且还领有东南部的鞑靼、篾儿吉惕、贝加尔湖的卫拉特（Oirat）和阿尔泰山的乃蛮部。1201年，所有这些蒙古部在阿尔衮（Argoun）河岸集会，宣布札木合为“菊儿汗”（gur-khan），即“大汗”。这是在此以前已为克烈部，尤其是黑契丹所用的最高突

厥——蒙古称号。(图 16) 于是成吉思汗致力于打破这种联盟。后札木合失势依托于王罕。他成功地离间了王罕与成吉思汗的关系。1203 年成吉思汗突袭王罕牙帐,王罕被杀。这时只有乃蛮部尚独立,保有阿尔泰一带。札木合逃到了那里,并挑起了战争。乃蛮为一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部落。其首领拥有"大王"(Tayang = tawang)的中国称号。这个部族的名字虽为蒙古语(naïman 为蒙古语"八"之意),但其名号则多为突厥语。他们可能为蒙古化的突厥人。乃蛮王无能,最后被成吉思汗攻杀,札木合最后也被擒。依照王例,他被不流血地处死(1204 年)。成吉思汗成了全蒙古的首领。1206 年于斡难河源召开全蒙古大会。成吉思汗正式被尊为大汗。

*

* *

50 岁上,这个乞牙特氏族的孤儿越过东蒙古第一个蒙古王国的边界,重建了古代匈奴和突厥那样的草原帝国。他也像他们一样为邻国的财富所吸引,并为此进行了新的征战。他所过之处白骨累累,到处一片废墟。他是个破坏者。他认为征服周围民族是上帝赋予他的使命。谁反抗他就被认为是反抗上天。同时这位战争之人又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生活简朴。

*

* *

中国北部富于粮丝。两千年来成为中央亚细亚游牧民的掠夺对象。但成吉思汗未走前人的老路。这时女真人已衰落。公元 1215 年蒙古大军进入北京,但留下守将后,成吉思汗班师返回了蒙古。这时中亚在吸引着他。

在乃蛮(1204年被征服)的西南为西辽,西辽又与更远处的穆斯林国花剌子模(在咸海南)接壤。1209年吐鲁番地区的回鹘王国自愿归属成吉思汗(以前为西辽的属国)。为逃来的乃蛮人所统治的西辽不断与花剌子模打仗。花剌子模沙则与蒙古人建立了关系(1215—1216年)。蒙古人希望获得穆斯林世界的产品。但不久花剌子模沙改变了态度。此时花剌子模在征服了阿富汗后正要征讨巴格达哈里发。蒙古人成功地占有新疆后形成了对它的威胁。就在这期间一件花剌子模沙不希望发生的事件发生了:花剌子模所属讹打剌(Otrar)城守将屠杀了所有被认为是蒙古人间谍的商队(1218年)。东方史料和13世纪欧洲旅行家都谈到,蒙古人认为杀死他们的使节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

同年(1218),成吉思汗全力准备征讨花剌子模。1219年成吉思汗到达额尔齐斯河(Irtych)。(图17)1220年蒙军攻入西突厥斯坦。1221年占领花剌子模、波斯东部、阿富汗。花剌子模沙死。但其子札兰丁继续进行抵抗。成吉思汗追他到印度河边。札兰丁跳入水中得救(马把他驮过河)。成吉思汗回师攻占撒马尔罕。公元1225年成吉思汗才回到了蒙古。这时他离开蒙古已有十年了。这期间从高丽回师的蒙古两员大将哲别(Djebé)和速不台(Subötai)为追歼花剌子模沙到达了伊朗北部和高加索。蒙古军队越过了高加索,在亚速夫(Azov)海北迦勒迦(Kalka)地区打败了俄罗斯大公(1223年),并抢掠了克里米亚的热那亚(gênois)人的金库。后经乌拉尔,绕过里海,在长达四年之久的远征后会师于俄属突厥斯坦。

"世界征服者"这时已达70岁的高龄。但他未忘记当他出兵征讨花剌子模时,西夏王违令未派随征士兵的过错。于是成吉思

汗亲征西夏。就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染病死去(1227 年)。数日后西夏国都陷落,全城居民被屠杀,用以吊祭成吉思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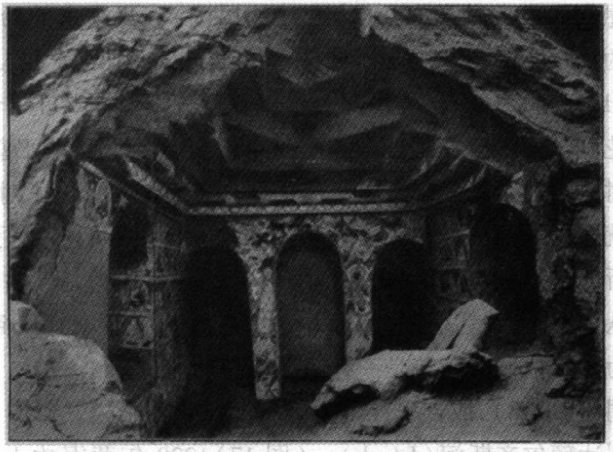

图 17　新疆克兹尔千佛洞洞窟,凿于岩石上,并饰以 7 世纪的壁画。注意其突出部分(挑头)上的异样天花板。

河套的蒙古人说他们是成吉思汗陵墓的世袭守卫者。这只不过是传说。所有当时的文献都证明成吉思汗的尸体运回了蒙古,并葬于斡难河源。这也是他自己选中的安葬之地。但考古学家至今尚未能找到其遗址。成吉思汗不是为杀人而杀人的人,说他嗜杀成性是后来的说法。他的同时代人都说他好。马可波罗说:"他死了……这是个损失。因为他是个贤圣之人。"儒安维尔(Joinville)说:"他保障了和平。"这话听来奇怪,但却是真的。蒙古大军所到之处,用强力恢复了秩序,敉平了地方的纷乱。有半个世纪之久,蒙古人建立的和平统治了亚洲。

*

* *

成吉思汗死前很久就认为,对帝国的建立者来说,最难办的事莫过于继承政权的问题。孛儿帖所生四子都无什么特殊才能。经过熟虑后,他选中了第三子窝阔台(Ogödai)。但窝阔台实际上是在1229年才继位为大汗的。征战仍在继续中。西南方向为高加索和叙利亚,东南方向为中国。1234年灭女真,与宋朝隔长江(Fleuve Bleu)对峙。窝阔台在位时蒙古诸王和大将速不台采取的惊人的军事行动是,经过波兰、西里西里并越过喀尔巴阡山(Karpathes),直到亚得里亚海的进军(1241年)。蒙古骑兵当时优于西方。如这时窝阔台不突然死去(1241年),蒙古大军可能出现在匈牙利平原,并可能继匈人(Huns)、阿瓦尔人、匈牙利人之后留在那里(窝阔台死于酒精中毒。成吉思汗生前规定每月只能醉三次,一次最好,又说最好一次也不醉)。诸王和将军们急于参加选举大汗的大会。于是入侵的大军班师东返。争夺汗位的斗争是如此激烈,窝阔台的继承人——他的儿子贵由(Guyuk)在1246年才登位。教皇伊诺森的使节普兰·迦儿宾参加了登位仪式。贵由死于1248年。三年后政权转入拖雷(Tului ,成吉思汗的第四子)系。这一系有托雷妻苏尔嘎克塔尼(她为基督教徒,为克烈部王王罕的侄女)所生的三个有才能的儿子。

拖雷长子蒙哥(Mongka)1250年被选为大汗,于1251年登位。蒙哥住在蒙古,有时住在窝阔台1235年修建的哈喇和林城(Karakorum)。他曾在那里接待了纪绕姆·德·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代表圣路易 Saint Louis)。(图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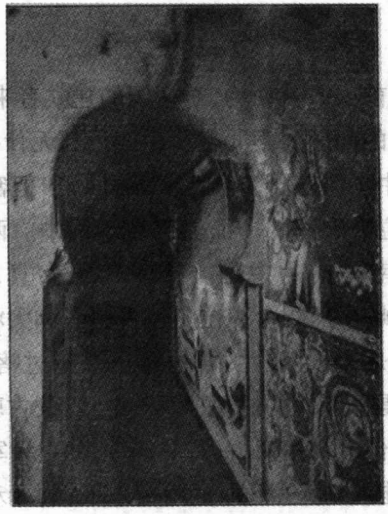

图 18 新疆克兹尔千佛洞一洞中的走廊,内有常见于波斯、阿拉伯建筑物中的马蹄形拱门。墙上壁画为宗教内容。

但西方并未被忘掉。1253 年蒙哥弟旭烈兀(Hulägu)从喀喇和林率军出发,于 1256 年灭伊斯玛利朝(Ismaélites,或称阿萨辛朝[Assassins]),两年后灭掉统治五百年之久的巴格达哈里发,建立了波斯的蒙古王朝——伊儿汗国。它开始时为大汗的属国。另一方面,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系早在窝阔台在位时建立了金帐汗国(牙帐在伏尔加河下游),统治俄罗斯达两个多世纪之久。

到这时,这个横亘于前亚与远东之间的大帝国把目光转向中国——征服宋朝。蒙哥先派其弟忽必烈(Khoubilai)攻云南。从那里蒙古一将军(速不台之子)曾打到河内(Hanoï)(1257 年),又经广西到长沙。忽必烈返回蒙古后又被派去攻打中国。忽必烈渡过长江,直取武昌。蒙哥在攻打四川时死去(1259 年)。忽必烈为

了继承王位返师北方。

*

* *

在此以前,大汗都是在蒙古召集的大会上选出。哈喇和林的蒙古元老派不喜欢忽必烈半汉化的周围环境,而欲举其弟阿里不哥(Ariq-böké)为大汗。忽必烈则与传统决裂,他在中国边地被其将军举为大汗。于是成吉思汗的游牧帝国(其军队的铁骑几踏遍全球)蜕变为中国的定居帝国。中国又一次征服了征服者。之后,忽必烈忙于镇压叛乱的宗王。他对波斯蒙古王朝和金帐汗国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1264 年忽必烈迁都北京。几年后正式改称元朝。蒙古大军越过长江,于 1278 年攻下南宋的京城——杭州(临安)。宋朝在广东又苟延残喘了两年。最后亡于1280 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异民族统治全国。元朝同时扩大其疆界于西藏、朝鲜、安南、缅甸。昨天的游牧民甚至想扬威于大洋。远征日本和爪哇的战事失败了。但这并不妨害他们在亚洲的声誉。忽必烈并曾派人去锡兰寻找佛骨。

忽必烈统治时(1260—1294)是蒙古强大的顶点。他把旧世界的各个部分密切联系了起来。一下子进入文明世界的蒙古人对任何宗教都无偏见,对它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犹太教、白莲教、白云教、基督教、景教、天主教都有代表,并被免除赋税。蒙哥汗曾把不同宗教比做一只手的五个指头,又说他曾说佛教是手掌,但这是佛教徒的说法。这时远东的景教又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总教会建立了联系。罗马天主教也派来了传教士。14 世纪初让·德·孟帖哥儿维诺被任为北京天主教大教长。

商业也像宗教那样得到了好处。这时许多穆斯林商人在远东很活跃。欧洲商人也有代表,其中最著名的为三波罗,他们三人中又以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最有名。他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1275—1292),服务于忽必烈,并留下了这方面的真实记录。(图19)

图19 马可波罗,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在中国宫廷中度过17年。这幅镶嵌画见于意大利热那亚一旅馆,和哥伦布像作于同一时代。人们迄今未见过真正的马可波罗像。

图20 帖木耳(1336—1405),西亚和一部分欧洲的征服者,"大莫卧尔"帝国的祖先。

*
* *

一方面蒙古大汗成了中国的天子。另一方面,在两代人后波斯和金帐汗国的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到14世纪中叶,波斯的

蒙古王朝已是有名无实了。1368 年明朝赶走了外来的蒙古人。返回蒙古草原后,蒙古人仍不时入侵,并在 15 世纪中叶一度俘虏了明朝皇帝。

在蒙古世界的另一端,有人在做重建成吉思汗帝国的美梦。这就是那位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瘸子帖木耳(Témur Leng,1336—1405 年)。帖木耳的家谱作者挖空心思地说他出自成吉思汗系。这只不过说明帖木耳是成吉思汗的崇拜者而已。

帖木耳生于 1336 年。1369 年成为西突厥斯坦的霸主。他度过了三十五年的战争生活,并曾一直打到印度的德里。1402 年在小亚细亚生擒了奥斯曼苏丹巴亚泽特(Sultan Osmanli Bajazet)。当 1405 年帖木耳死于讹打剌时,他实际上已完成了攻取新疆和中国的准备工作。在历史上他几乎可以和成吉思汗媲美。(图 20)关于帖木耳的史料更多些,因为年代靠后些。但帖木耳帝国的寿命也不长。这个普通的穆斯林突厥人未能赢得其臣民对他的狂热崇拜,而他属下的定居民也不能使他像成吉思汗及其最初继承人那样跃马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海的广大地区。别人则利用了他在东方造成的震动:波斯恢复了统一,俄罗斯人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帖木耳后继人(多为有学问的人,有的还对天文学作出了贡献)只满足于统治有限的地域,并处于频繁的阴谋暴乱的威胁下。在帖木耳子孙中又有一位著名人物出现,即其第五代孙巴贝尔(Baber)。巴贝尔青年时历经忧患。在来自北方的乌兹别克游牧人的攻击下,他被迫放弃了西突厥斯坦,在阿富汗站住了脚,1525 年占领了德里(在经过多次失败后)。五年后死去。他所建立的印度"大莫卧儿"(Grands Mogols)突厥王朝一直存在到 1858 年锡

帕人(Cipayes)暴乱时代。巴贝尔的回忆录是东方回忆录中著名的作品。巴贝尔后代中以其孙子亚格伯(Akbar,1556—1605 年)最有名。此人不识字,但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他不信伊兰斯教能为耶稣教所接受,并想创立一种含有印度教、波斯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基础的新宗教。

*

* *

在这期间,新疆和蒙古过着独立生活,组织得不好也不坏。新疆的地方王朝领有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在蒙古草原,霸权从东蒙古人手中转到其西部族人卡尔玛克(Kalmouks)蒙古人手中。卡尔玛克蒙古人建立了最后一个蒙古帝国。它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上半期领有大部分蒙古和新疆。关于卡尔玛克历史,除有当地史料外,还有俄国使节和彼得大帝在波尔塔瓦(Poltava)俘获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瑞典军官留下的材料。退守长城后面的明朝于 1644 年为异族的满族所取代。在满族统治下,中国又恢复了汉、唐、元时对中央亚细亚的统治。1696 年康熙皇帝亲征卡尔玛克人。六十年后,到其第二代继承人乾隆时最终完成了他开创的事业。中国再次统治西面直到帕米尔的广大地区。乾隆皇帝曾令耶稣会士绘制了全国地图,并让传教士画家把其武功画成 16 张大幅画送到法国制版。

1828 年新疆发生了穆斯林的起义,但很快被平定。更严重的一次是阿古柏(Yakoub-beg)的活动。这时中国正困于太平天国之乱。只是由于欧洲人的干涉,清朝政府才得以战胜他们。阿古柏乘机攫取了整个新疆南部地区(Kachgarie)。同时,另一伊斯兰教苏丹国在云南宣布成立。当时许多人认为中国在中亚的统治肯定

是告终了。英国曾两次派使节到阿古柏那里,俄国也与阿古柏订有密约。但奇迹出现了:一位汉族将军(译者按:指左宗棠)自筹粮秣,排除万难,于 1871—1878 年间收复了失地。阿古柏死于 1877 年(可能是被毒死的)。镇压是残酷的,像在云南一样。新疆穆斯林居民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才从这次战祸中恢复过来。同时,中国人温和的统治政策也有助于这一点。但最近的事件表明,那里仍是个多事的地区。

附　录

伯希和考查团的新疆旅程及其考古成果

[日]秋山光和　著
耿世民*　译

前　言

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为团长,瓦扬(Louis Vaillant)、努外特(Chales Nouette)为团员的法国新疆考查团于1906—1908年间考查了新疆和甘肃。关于这次人们称之为伯希和考查团(Mission Pelliot)的情况,以前我们知之甚少。在伯氏之前和之后对新疆进行考古调查的德国勒柯克(Le Coq)、俄国奥登堡(Oldenburg)、英国斯坦因(Stein)等考查队都有各种报告书发表,借此人们得以了解他们考查的全貌,而伯希和考查团则从来未刊布过其考查全貌的报告书。只知道他在敦煌获得大量写本、画卷并对敦煌千佛洞的壁画进行过拍照。

1945年伯氏死后(67岁),在其书斋发现了他的遗物[①]。其中有伯氏考查时的日记和考查笔记。这些遗稿已由专门成立的出版委员会着手整理,准备陆续出版[②]。日本学者秋山光和在1950—1951年留学法国时,得到已故格鲁塞(R. Grousset)先生的帮助,

调查了这些珍贵笔记和存于吉美(Guimet)美术馆中的有关资料。现根据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伯氏资料,撰写这篇概述伯希和考查团的旅程及其成果的介绍,以弥补新疆考古研究史上的这一空白。

先介绍已发表的关于伯氏考查的论著和未发表的资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来论述他的考查过程和取得的成果。

甲　论著与资料

1. 已发表的论著

首先是伯氏等在旅途中寄回法国的有关记述他们一行的旅行报告。其次是伯氏归国后不久在巴黎作的两次报告演说。过去关于伯氏考查的介绍主要是根据这些。这些报告主要是以书信形式寄给派出考查团的组织《国际中央亚细亚考查委员会法国分部》及其负责人色纳(Senart)和高第(Cordier)二人,刊登在有关学会的刊物和伯氏所属法国远东学校校刊上。在法国国内主要是刊布在法国金石学院(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的《汇报》(Comptes-rendus)、法国地理学会的《地理学》(La Geographie)、法国亚洲委员会的《法属亚细亚》(Asie Française)、法国亚细亚学会的《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等刊物上。欧洲著名的东方学杂志《通报》(T'oung-pao)的汇报栏(Chronique)中也转载有伯氏一行的动态。另外,因伯氏是设在河内的法国远东学校的成员,所以在该学校的《校刊》(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eme-Orient)(一般略称为 BEFEO)每期(1906—1910 年)也登有伯氏一行的消息(汇报栏中的《印度支那》、《中央亚细亚》、《中国》部分)[③]。此外,该刊尚发表过伯氏从喀什和敦煌寄出的两篇长的报告:

(1)《喀什北部的三仙洞及特古尔曼遗址》(BEFEO, VI, pp. 255 - 269, 1906);

(2)《甘肃新发现的一所中世纪藏书室》(同上刊, VIII, pp. 501 - 509, 1908)。

伯氏回国后先后作过两次报告。一次为1909年12月10日在法属亚细亚委员会和地理学会联合举办的欢迎会上所作的题为《中亚三年》的演讲,刊在该委员会的《纪要》(Bulletin du Comite de l'Asie Française) 1910年1月份上。同文也转载在《校刊》(BEFEO),X,1910上。第二次为在法国金石学院1910年2月25日的例会上所作的报告,刊在该学院的《汇报》1910年1、2月份上,报告的题目是《伯希和关于新疆考查的报告》。此文也转载在《校刊》第十期上[4]。两者内容大同小异,简单叙述了考查的经过及取得的成果。但由于是演讲,未能详细介绍考古发掘的情况。

之后,伯氏计划刊行考查所得的各种资料的影印本和研究丛书《伯希和中亚丛刊》(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按内容由大小开本的两套组成。作为大开本一套的第一部,计划为敦煌千佛洞照片的影印。会欧战发生,遂中止。到1920年才恢复出版。1924年为止共刊行了六辑。第二部为敦煌所得的粟特语(Sogdian)《善恶因果经》的影印本。这一套书第二次大战后仍继续刊行[5]。此外,作为小开本的一套有各种语言研究专著和原写本影印刊行。但从未像其他国家考查队那样发表过系统的考查报告。关于考古学和美术史方面,只有《敦煌千佛洞》一书[6]。

2. 未发表的资料

a. 伯氏死后发现的笔记(Note)类

(1)日记　大本笔记三册,小本笔记五册。大本笔记一般为

在新疆图木休克、库车等停留时间较长地方使用。小本笔记为随身携带使用的。日记大体从1906年7月15日开始到1908年10月1日结束。这些日记本已由吉美博物馆的列维(Levi)女士整理刊布。

(2)敦煌千佛洞调查记录　写在大张纸片上,详细记录了各洞的构造及壁画等应注意之点,尤其是洞中的题跋和落款都照原文录写(包括汉文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字)。

(3)收集品目录　记在题作《考古收集品》的小本子上。按统一编号登录了从新疆南部图木休克开始的各地发掘品或购得的文物。内容包括每次所得的品目、地点、材料、有无摄影,共1264件。敦煌石室所得品因另作处理,未编入此目。

(4)摄影记录(二册)　由考查团摄影师努外特记录的底片编号、摄影地点等材料。

(5)日程表　为题作《伯希和及瓦扬中亚考查路线图》的数页纸。上面记有1906年8月1日从俄国奥什到1908年5月27日沙州(敦煌)的每日宿营地、标高、地势。

b. 现地拍摄的照片

考查中努外特所摄大量照片的底版现存记梅美术馆照片资料部。其中关于敦煌千佛洞的约400个已印成六大册图录出版。关于其他遗迹的尚未刊布。其中有新疆图木休克、杜勒杜勒—阿库尔、苏巴什、克孜尔、库木吐拉等地千佛洞的照片,对美术史研究极有价值。作为资料交换日本曾得有一套,现存东京文化研究所。

c. 遗迹实测图

考查团的瓦扬主要负责测量制图工作。实际上各遗迹的平面图也出自他的笔下,但不见于伯氏资料中。1951年由日人秋山氏

和列维女士在吉美美术馆的地下仓库中发现。内中有喀什三仙洞(Utch Meravan)、图木休克(Toqquz-Sarai)、库木吐拉(Duldul-Aqur)、苏巴什、哈密等五个地方遗迹的各种平面图。把这些平面图与日记、照片对照,可进一步了解各遗迹的情况。希望法国方面能早日刊布以上各种珍贵资料。

乙 考查过程及其成果

1. 出发以前

1899年完成学业的青年伯希和在他21岁时受聘于开办不久的越南河内远东学校[7]。1900年、1902年伯氏曾先后两次去北京为该校搜购汉文图书。这期间他所写的研究论文经常发表在该校的校刊上。其中以1904年发表的《8世纪末中国到印度两条通道考》一文最有名,曾受到沙畹(E. Chavannes)的赏识,并因此使伯氏对中央亚细亚发生了兴趣。

另一方面,从上一世纪起,世界各国东方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亚洲的腹地。在1899年国际东方学大会上法国的色纳(E. Senart)教授提议成立国际中央亚细亚考查委员会。于是在下一届1902年的国际东方学大会上正式成立了国际中央亚细亚考查委员会,总部设在俄国,各主要成员国设立分部。这样,英国的斯坦因在1900—1901年,德国的格伦威德尔在1902—1903年,日本的渡边、掘贤雄(大谷第一次西域考查队)在1902—1904年,德国勒柯克在1904—1905年等考查队开始了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考古调查活动。

国际中亚考查委员会的法国分部由色纳任会长,高第任主事。伯氏也为该部的成员之一。1905年以该分部为中心,在法国教育

部、金石学院、地理学会、亚洲委员会的赞助下，组织了法国中亚考查团，由伯氏任团长。

伯氏受命后进行了全面的准备工作[8]。他首先选中了当时任军医的、伯氏的中学同学和好友瓦扬，由他担任测量、制图工作兼考查队的医生。努外特任考查团的摄影师。准备工作进行了近一年。1906 年 6 月 1 日伯氏一行正式起程。

2. 出发去喀什

伯氏一行于 1906 年 6 月 1 日从巴黎出发，经莫斯科、奥伦堡（Orenburg），于 10 天后到达俄属中亚的首府塔什干。在等待行李到达的一个月时间里，伯氏抓紧时间学习维吾尔语。后来这一点对他很有帮助。在奥什（现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组成了包括 78 匹马的考查队后，于 8 月 6 日出发去喀什。考查队得到沙皇的优待，派有数名哥萨克骑兵护卫。伯氏一行翻过近四千米高的塔勒狄克（Taldyq）大坂，通过阿赖（Alai）高原，从伊尔克石坦（Irkechtam）进入新疆，于 9 月 1 日到达喀什。

在喀什伯氏一行受到俄国总领事克洛阔洛夫（Kolokoloff）和英国代表马格里（Macartney）的招待。当地中国当局因事先接到北京训令，也多方给与方便。伯氏一口流利的汉语和对中国文化的素养也帮助了他。

3. 喀什附近的考查[9]

三仙洞　　伯氏首先考查了喀什北 15 公里的三个洞窟。汉语叫三仙洞，当地土语叫 Utch-meravan（三富户）或称 Utch mahravan[10]。伯氏等用带滑车的高梯子攀上了位于 108 米高的断崖上的洞窟。三窟并列于北面，入口高 2.7—2.5 米，最深达 5.8 米。各洞都分前后二室。前室开有连接三洞的狭窄通路。中洞后室内壁

中央方形台座上塑有佛的坐像(缺头部),后壁上残有佛像背上的光环,侧壁上残有中国风格僧人的画像。右洞内室中央残有台座痕迹。左洞中未留有任何东西。三洞中都未发现其他遗物。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罗斯基说曾在洞内捡到记有1815年修葺事宜的木牌。另外,中、右洞壁上留有汉语、蒙古语、突厥语的许多题字。其中最古的为1788年。因此伯氏认为三洞的现存样子属18世纪中叶乾隆远征新疆以后。但洞窟本身很古,可能是建于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窟寺。

特古尔曼遗迹　沿三仙洞所在断崖下的恰克马克河往下东二公里处有称作双水磨(Qoch Tegurman)或称特古尔曼(Tegurman)的地方。再往东见有塔址。塔现高约10米。该地尚有其他塔的遗址。塔的西北方约300米处有一长边(东北边和西南边)约70米,短边(东南边和西北边)约50米呈矩形的墙址,为用与塔址同样的土坯垒成。现存墙壁最高达2.4米(西隅)。矩形墙址内堆积有呈起伏状的砂砾。不明是何建筑物的遗址。陶片很多,也见有当地称之为大陶罐(khoum)形的陶器。这种陶器在喀什附近的佛教和伊斯兰教遗址中都有发现。所以不能据此判断遗址的年代。但伯氏偶然在矩型地区内发现写有婆罗米(Brahmi)文字的小板片。据此,矩形的一边和塔本身应属于同一时代。伯氏推测应为附属于塔的僧院。在墙内几处地方进行了发掘,但无特别收获。

汗内(Khan-ui)附近　此遗址在喀什东北方向23公里处汗内村附近。彼得罗斯基和斯坦因推定该遗址属于伊斯兰教以前时期[11],存有双重墙壁遗址。地面上发现许多陶片和玻璃片。伯氏据此处遗物中尤多伊斯兰钱币这点,认为应属于伊斯兰教时期的

遗址。从出土有属于11世纪末的中国古钱来看，可能弃于12世纪左右（可能由于缺水）。彼氏和斯氏可能是据汗内东方、东北方有Topa-tim和Mori-tim两个佛教遗址（窣堵波）才认为是属于佛教时期的。在考查汗内遗址时，伯氏尚考查了东方阿哈什（Aqqach）地方的Qargha-tim处的窣堵波。还考查了汗内东南方Toqquz-Hodjrah（九间房）遗址，推定属于伊斯兰教初期。

伯氏一行在喀什停留一个半月左右，于1906年10月1日去库车。伯氏此次考查的主要目的地原为库车，因南道的和田已为斯坦因在1900—1901年间考查过，北道的吐鲁番也已为两次德国考古队调查过（1902—1903年的格伦威德尔，1904—1905年的勒寇克）。伯氏抵达喀什后才得知库车已为德国人调查过，且收获很大。同时俄国的别列佐夫斯基（Berezovski）正在库车进行发掘。为此，伯氏一行开始想不走现在的大道，而取道通过北方山间的古道（经乌什）。因这条道路欧州人未走过，加之又听说在苏木塔什（Soum-tach）附近有古代城址。但由于山道车辆通行困难，最后决定仍走经过巴楚的现在大道，同时想借此机会调查一下巴楚西图木休克附近斯文赫定说是属于伊斯兰教时期的一处遗址。

伯氏一行经伽师、英吉阿瓦提沿喀什噶尔河前进。在奥尔达克力克（Ordaklik）住了五天。调查了其北面20公里处的废址。此处应属伊斯兰教时期，陶片、玻璃片很多，与前述汗内一样，可能由于缺水废弃于12世纪左右。

10月28日过巴楚，于10月30日在图木休克札营。

4. 图木休克（托库孜萨莱）的发掘

图木休克（Tumshuq）现为仅长有柽柳（tamarisk）的荒地。地面上散见许多陶片和玻璃片。古代应为很大的聚落。在该地西6

公里沿通向巴楚的大道,有一南北走向的高丘,道路从其间的隘道通过。在大路北侧有一台地,即为现在要谈的遗址。在其末端东侧有一群废室,当地称之为托库孜萨莱(Toqquz-Sarai)。台地从西北向东南伸展,在末端处残有伊斯兰教的麻扎(墓地)。伯氏偶然在那里发现希腊佛教式神像断片。于是推定此处先为佛教寺院,后来伊斯兰教徒将其破坏后用作墓地。伯氏马上改变去库车的计划,暂留此地进行发掘。11 月 1 日进行初步发掘后,发现遗址规模比预料的要大的多。发掘工作一直进行到 12 月 15 日,在这里伯氏考查队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所得以塑像类最多,为别具特色的中亚优秀雕塑遗品。过去人们对这批出土品几未曾注意过。此处遗迹应另文详细介绍。

发掘首先从麻扎周围开始,弄清楚了成矩形的中庭(A)及其左右的小殿堂群。A 中庭大小为纵(西北—东南)约 25 米,横(西南—东北)约 29 米,西南侧(左)并排有四间耳房,东北侧(右)也有五间耳房。正面(西北)壁上设有坛(左右小殿堂壁上也有坛)。这些耳房墙上大部分都饰有壁画和塑像。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为伯氏称之为小殿堂 I 的西隅。这里发现有装饰内部壁面的塑像群。在入口(东北面)西侧各塑有三个(左方)和二个(右方)供养人立像。再往前在西侧壁上也同样并列塑有合掌膜拜的供养人像,左侧为女性,右侧为男性。都以碎草和泥造型,上涂白色精土。特别在小殿堂发现大量塑像断片,多为佛、菩萨头部及其他人物,全为犍陀罗风格[12]。同时尚发现许多壁画残片,为此处遗址壁画的上品。(图 1)

在小殿堂 I 的东南,有编号为 R 的殿堂。其次为 J 殿堂。这里也出土有类似小殿堂的塑像和壁画。再次为 S 地。那里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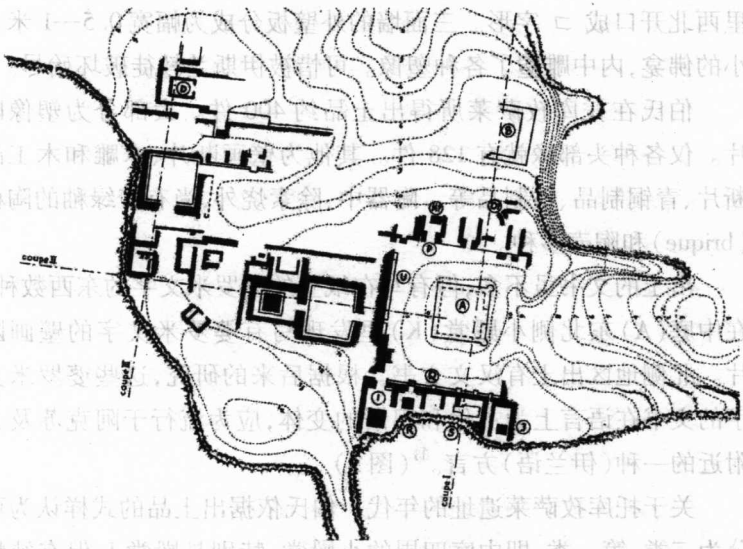

图1　托库孜萨莱佛寺平面图(选自伯希和《图木休克》一卷)

下室,有供上下用的台阶。在地下室中发现许多骨壶。在中庭对面并排的小殿堂中,在K处出土许多壁画断片和几枚五铢钱。在大中庭后面(西北方)别有小中庭(10×11.5米)。在这里发掘出该寺院窣堵波(佛塔)的基部。基坛为方形(每边约4.5米),四周围有佛像。这里佛像衣摺的处理虽仍采用犍陀罗传统,但风格粗俗,同时塑像技术也很低劣。但引人注意的为壁画。佛像背上的光环画在后墙上,边上加有轮和并立长颈鸟,使人想到伊斯兰系统的影响。但从残留在三角形小格子里的合掌童子的姿态来看,伯氏认为应有中国的影响。此外,尚出土有开元通宝。

寺院遗址(B)　　在A中庭东北低处有一成方形的地方。发掘结果表明这里为托库孜萨莱遗址中最具特色的一处遗址。这

里西北开口成 コ 字形。三面墙的外壁板分成为幅宽0.5—1米大小的佛龛,内中雕塑了各种塑像。可惜被伊斯兰教徒破坏殆尽。

伯氏在托库孜萨莱所得出土品约400件。大部分为塑像断片。仅各种头部像就有128件。其他为壁画断片、木雕和木工品断片、青铜制品、铁制品等。陶器中,除素烧外,尚有带绿釉的陶板(brique)和陶壶多种。

出土的文书虽不多,但有写在纸上的婆罗米文字的东西数种。在中庭(A)东北侧小殿堂(K)里发现写有婆罗米文字的壁画断片。北侧地区出土有汉文文书。根据后来的研究,这些婆罗米文字的文书在语言上为古代和田语的变体,应为流行于阿克苏及其附近的一种(伊兰语)方言。[13](图2)

关于托库孜萨莱遗址的年代。伯氏依据出土品的式样认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即中庭四周的小殿堂,特别是殿堂I,保有纯粹犍陀罗式佛教雕刻的传统。又据同时出土有五铢钱来看,可上溯到公元2世纪左右。但根据关于犍陀罗和阿富汗初期佛教雕刻年代的最新研究,可能要稍晚一些,但不迟于公元3、4世纪。第二类为B寺院的浮雕板画(panel)。伯氏认为这里显见有中印度的影响,年代应比第一类要晚些。伯氏后来在《高地亚洲》一书中所附该处出土版画照片说明中定为公元600年左右。近来格鲁塞提出阿富汗fundokistan后期泥像雕刻(属7世纪左右)与图木楚克的泥像很相似[14]。第三类为装饰后部窣堵波的雕刻和绘画式样。伯氏认为这里可看到中国的影响。从出土有开元通宝和材料、技术的粗劣来看,应属于佛教的最后期。尽管关于中国影响的问题尚有商榷的余地,年代上应属于8世纪左右[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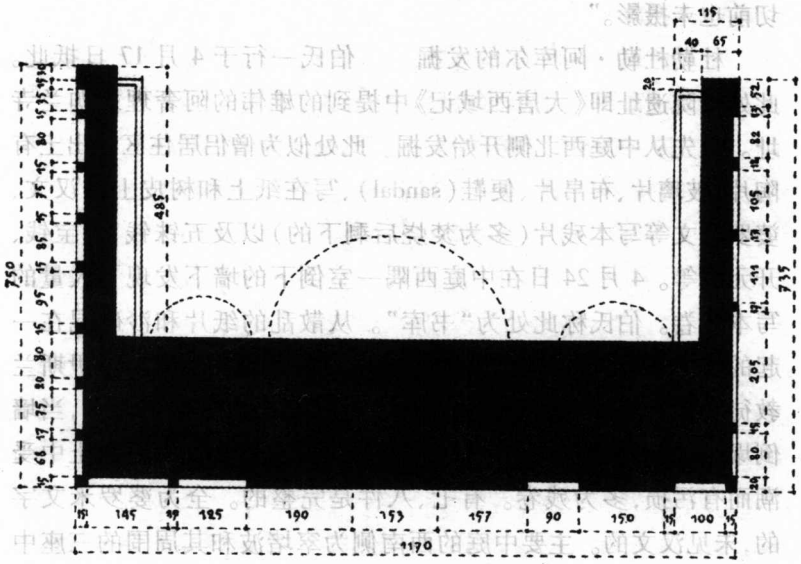

图 2　托库孜萨莱 B 寺殿遗址(选自伯希和《图木休克》一卷)

5. 库车附近的考古

克孜尔和库木吐拉千佛洞　　1907 年 1 月 2 日伯氏一行抵达库车。日记中缺 12 月 29 日到 3 月 25 日的部分。但可从他 3 月 23 日寄回国内的报告(见《通报》,1907 年,页 291 以下)中知道一些情况。克孜尔千佛洞因已为德、日、俄考古队考查过,所以容易发现的已全为他们所得。伯氏只对各洞窟的构造和残留的壁画进行拍照。现存吉美博物馆的底版有 70 多张。

4 月 13 日伯氏一行达库木吐拉。对此处千佛洞壁画他在日记中写道:“德国人破坏掉的壁画比他们切去的壁画更多,而且在

切前也未摄影。”

杜勒杜勒·阿库尔的发掘　伯氏一行于4月17日抵此。此处寺院遗址即《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雄伟的阿奢理式迦兰寺址。他先从中庭西北侧开始发掘。此处似为僧侣居住区。出土有陶片、玻璃片、布帛片、便鞋(sandal)、写在纸上和树皮上的汉文、婆罗米文等写本残片(多为焚烧后剩下的)以及五铢钱、天宝钱、开元钱等。4月24日在中庭西隅一室倒下的墙下发现了大量的写本残卷。伯氏称此处为“书库”。从散乱的纸片和沙砾混在一起的情况来看,可推知此处原为堆积书籍的地方。看来是伊斯兰教徒在放火烧掉寺院之前,先破坏了室内,书籍散乱到墙下,当墙倒塌时,这部分写本才得以侥幸未被烧成灰烬。写本因在土中受潮而有污损,多为残卷。有七、八件是完整的。全为婆罗米文字的,未见汉文的。主要中庭的西南侧为窣堵波和其周围的三座中庭。窣堵波西南侧有七间耳房,这里也出土很多婆罗米文字的残片。中庭西南侧出土有8世纪的中国货币:开元通宝9枚,大历通宝9枚,建中通宝18枚。此外,中央中庭东北侧窣堵波附近出土汉文佛经断片很多。

上述“书库”等处所得婆罗米文字的残卷后经专家研究全为乙种吐火罗语,也即斯·列维研究定名为“龟兹语”的珍贵材料。

作为考古学遗品,此处与托库孜萨莱不同,出土塑像不多,式样也不是上品,但有许多木雕品,特别是小形佛像。

苏巴什的发掘　在杜勒杜勒—阿库尔时,伯氏尚考查了库车地区的Tadjik-qaraoul千佛洞壁画和库木吐拉千佛洞附近的寺院遗址,也得有若干遗品。苏巴什遗址为在库车东北约5公里库车河东西两岸台地上的宏大寺院遗址。伯氏认为是玄奘所记昭怙

厘寺的遗址。两岸附近尚残留有大小数个窣堵波遗址。当时俄国的别列佐夫斯基正在那里发掘。

伯氏在西岸遗址西侧大塔发掘时得若干骨壶和骨盒。有的外面画有几何学纹样、鸟和乐人，十分精致。骨盒中除骨头外，有装入小袋的牙齿、小金片和金箔片数枚、五铢钱四枚（无铭文）。另外，勒柯克也在库车发现骨盒一个，大谷探检队发现两个。此外，在苏巴什西岸遗址中央大伽兰遗址中掘出两千枚五铢钱。并得到回鹘文文书若干。

6. 敦煌千佛洞

伯氏一行于10月9日抵达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时他们听到敦煌发现古写本的消息。于是他们放弃对吐鲁番的考查，于1908年1月11日兼程向敦煌进发。关于伯氏在敦煌千佛洞所获成果，因已为大家所熟知，故此处省略。总之，他从敦煌石室中剩下的一万五千件写本中选出了约三分之一，近五千件，包括全部婆罗米文、回鹘文的写本。藏文方面包括佛经之外的全部东西。汉文佛经中则选了有纪年和有其他特点的部分。

7. 归途

在西安，伯氏又搜购了约三百件铜器、陶器、象牙雕刻以及珍本书籍。1908年10月5日在完成长达两年多的考查后抵达北京。1909年10月24日回到法国。

伯氏收集品中的写本类现存法国国立图书馆。考古美术品分藏于卢浮博物馆东洋部和吉美美术馆。1947年两馆合并后现存吉美博物馆。

1911年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设中亚历史语言讲座，由伯氏负责，时年33岁。

注 释

* 此文为我60年代初根据日本人秋山光和先生发表在《佛教艺术》1953年号上的文章译成(原刊于《新疆文物》2002年1—2期)。原文为日文。

① 遗稿中比较成文的论文目录见韩百诗(L. Hambis)和列维(E. Levy)女士合编的《伯希和文稿》(*Fonds Pelliot*),刊于法国亚细亚协会编辑出版的伯希和追悼录《Paul Pelliot》(1946)卷末。但未提到伯氏的日记。只在同追悼录戴密微(Demieville)所写一文的注中提到发现了伯氏的日记。耿按:最近匈牙利学者若那塔什(A. Rona-Tas)教授告诉我说,伯氏死后,他的夫人曾用他的手稿填充家中的玻璃器皿,后又取出扔掉。这是他的老师勒盖提(L. Ligeti)院士(曾为伯氏的学生)亲口告诉他的。

② 伯氏遗稿的出版工作1949年以来已由法国Adrien Maisonneuve书店在《伯希和遗著》的总名字下刊行。已刊数册。但在第一批预定出版的12册书中,不包括新疆考查的部分。只有敦煌千佛洞考查录计划由荷兰莱登市的Brill书店单另刊行。由于汉字排版的困难,尚未出版。已出版的伯氏遗著有:(1)《蒙古秘史》,1949 (2)《金帐汗国史考》,1950 (3)《真腊风土记》,1951 (4)《中国印刷术的开始》,1953年。

③ BEFEO, VI(1906), pp. 451, 482 - 486; VII(1907), pp. 150, 204 - 209; VIII(1908), pp. 284, 294 - 295, 388; IXX(1909), pp. 402, 817 等。

④ 伯氏的演讲报告早已介绍到亚洲。当时在巴黎的沈兹曾把其要旨译成汉文寄给罗振玉。罗氏将其作为敦煌石室遗书的附录,连同斯坦因等的纪行一起收在《沙漠访古记》中(1910年)。

⑤ 已刊行的有:(1)《敦煌千佛洞》(1920—1924)。(2)《善恶因果经》(1920)。(3)《粟特语文献》(1940)。(4)《粟特语须大拏本生故事》(1946)。关于这套丛书的近来出版情况可参阅吴其煜的文章,载日本《东方学》53辑,1977年。

⑥ 另外,关于伯氏的考查情况尚有下列材料可参考:(1)戴密微《伯希

和中亚考查》(Mission Pelliot, BEFEO, XXXI, pp. 366—374)。(2)《中亚和西藏——伯希和和巴苟氏的考查》,载《吉美博物馆考古通报》,第二辑,1921。前面为伯氏写的关于中亚获得品的意义,后面为 J. Hackin 写的对当时陈列在吉美博物馆主要绘画和雕塑品的解说文字。(3)伯希和:《高地亚洲》小书,概述了中亚的地理、历史,很有参考价值(耿按:有我从法文翻译的汉译文载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出版的《民族史译文集》第六集,1978 年)。(4)瓦扬:《伯希和——考查团的领导》,为 1946 年 2 月 8 日法国亚洲学会举行的伯希和追悼上的讲演。后收入同学会出版的追悼录(《P. Pelliot》,1946)中。(5)戴密微:《伯希和的科学事业及其有关远东的论著》,为 1945 年 11 月 9 日在法国亚洲学会上的报告。内中介绍了伯氏的业绩并附有参考文献,收入同上书中(尚可参阅同书 Filliozat 的悼词)。(6)《伯希和氏 1906—1909 年考查所得敦煌写本和画卷》,吉美美术馆 1947 年出版。内有韩百诗所写的题作《伯希和氏收集品》的解说和关于伯氏考查的简要介绍。

⑦ 为法国东方学研究中心之一。1898 年成立,最初称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团,1900 年改为法国远东学校。

⑧ 关于法国中亚考查团的组织,先有色那 1905 年 10 月 5 日在法国科学院所作的题为《一个考古学的新领域——新疆》的报告。伯氏本人于同年 12 月在法国亚洲学会上也谈到了组织考查团的计划(见 BEFEO, V)。伯氏寄予最大希望的为库车,并打算从罗布泊穿越戈壁沙漠到敦煌千佛洞。再从西安到山西考查大同、龙门等佛教遗迹。后一任务 1907 年由沙畹完成。

⑨ 关于三仙洞遗迹,详见伯氏 10 月 10 日的报告《喀什北特古尔曼的三个洞窟和遗址》(BEFEO, VI, 1906)。

⑩ 关于此处洞窟情况,在此之前 1903 年由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鲁斯基根据其哥萨克卫队长的考查报告撰文发表在俄国考古学会纪要上,文章题作《喀什附近的佛教遗迹》,载 Zapiski Vost. Otd. Imp. Russk. Arch. Ob. T. VIII。1905 年德国格隆威德勒考查队的巴尔都斯也曾进去过。1906 年斯坦因也考查了该地附近,并用望远镜从崖下观察过(Serindia, Chap. Ⅲ, Sect.

IV, p. 82)。外部照片见同书 Fig. 30 。

⑪ 参见《古和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页 79—86。

⑫ 关于图木休克出土的塑像类介绍,早在 1910 年当这批文物入藏卢浮博物馆时,已有照片刊登在《装饰艺术》(*Art Decoratif*)8 月号上(1910)。之后,法国出版的有关中亚美术概论的书中也有介绍,但未进行系统的研究。

再有,关于巴楚楚县托库孜萨莱出土品从未在法国之外展出过,今秋将有该地出土的八件头部塑像在东京展出。

⑬ 韩百诗:《中亚研究》(法国东方学五十年),载"Bulletin de la Soeieté des Etudes Indochinoises), XXVI -4,1951。

⑭ 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De la Grece à la Chine),页 XXXIV, 1948。

⑮ 从此遗址沿大道往南在对面坡地上尚有一寺院遗址。伯氏只在此发掘一日。后来德国 1914 年派出的考古队(第四次)发掘的图木休克遗址即为此处,见勒柯克:《中亚晚期佛教遗迹》,卷 5,页 27。